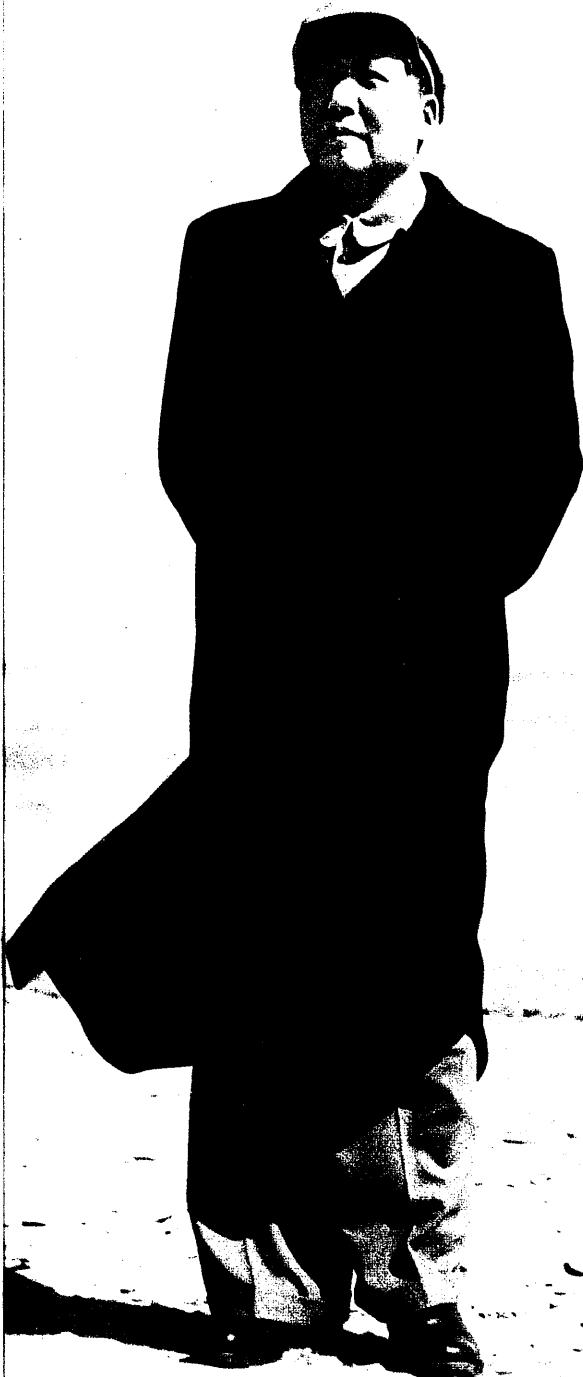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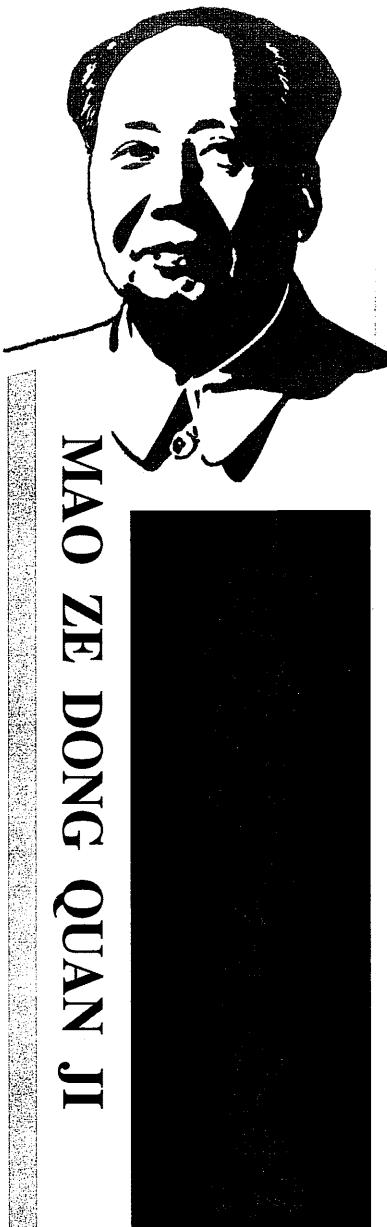


毛澤東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0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编：任 流、崔 刚、宋 志 丽
副主编：张世杰
责任编辑：范宏峰、张颖、杨泽
编 辑：李长富、张瑜原、胡尚硕
孟宪纲、张清斌、马文帅
王中阳、李美艳、赵道公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陈一伟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1
(1945年4月27日)	
关于提议将王明等选进“七大”中央委员会的讲话·····	6
(1945年4月)	
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	7
(1945年5月1日)	
为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给斯大林的贺电·····	8
(1945年5月3日)	
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	9
(1945年5月4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	11
(1945年5月8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	12
(1945年5月23日)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 ·····	13
(1945年5月24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	31
(1945年5月27日)	
给冈野进的信 ·····	32
(1945年5月28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34
(1945年5月31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79
(1945年6月2日)	
在准备南下支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80
(1945年6月7日)	
复罗荣桓电	81
(1945年6月9日)	
致邓小平电	82
(1945年6月10日)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	83
(1945年6月10日)	
愚公移山	93
(1945年6月11日)	
中共不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	98
(1945年6月15日)	
王震王首道部的行动方针	100
(1945年6月15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103
(1945年6月15日)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	104
(1945年6月17日)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112
(1945年6月17日)	
为中国革命死难烈士题写挽词	114
(1945年6月17日)	

挽抗日烈士联	115
(1945年6月17日)	
欢迎七参政员来延安商谈国是的复电	116
(1945年6月18日)	
豫中、豫东日军占领区较利于建立根据地	117
(1945年6月18日)	
致王若飞电	119
(1945年6月18日)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20
(1945年6月19日)	
南下部队应依据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	121
(1945年6月24日)	
给各级党部的通知	124
(1945年6月26日)	
挽李公朴、闻一多联	125
(1945年6月27日)	
复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电	126
(1945年6月30日)	
在延安各界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	127
(1945年)	
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的谈话	129
(1945年7月2日)	
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会谈记录	130
(1945年7月4日)	
和黄炎培谈跳出周期律	137
(1945年7月4日)	

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	139
(1945年7月5日)	
评蒋介石七七演说*	141
(1945年7月8日)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144
(1945年7月10日)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148
(1945年7月12日)	
开辟郑州许昌等地甚为必要.....	150
(1945年7月14日)	
入豫部队的作战方针.....	151
(1945年7月15日)	
在《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上加写的一段话.....	154
(1945年7月19日)	
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王震部会合.....	155
(1945年7月22日)	
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	157
(1945年7月22日)	
评国民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	159
(1945年7月22日)	
争取目前时间创立五岭根据地.....	162
(1945年7月22日)	
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	163
(1945年7月22日)	
关于扩大反内战宣传及建立云、贵、川农村据点的指示.....	164
(1945年7月2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165
(1945年7月23日)	
爷台山战事扩大	166
(1945年7月25日)	
坚决将入侵之胡军打出去	168
(1945年7月27日)	
致福斯特电	169
(1945年7月29日)	
关于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电报	171
(1945年7月30日)	
批转太行区党委关于检讨统一领导问题的报告	172
(1945年7月30日)	
胡军侵占边区问题及我军对策	173
(1945年7月30日)	
对留守兵团工作的分析	174
(1945年7月)	
准备应付必然到来的内战局面	176
(1945年8月4日)	
准备与王震王首道部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178
(1945年8月4日)	
复王震、王首道电	182
(1945年8月4日)	
中央关于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条件给山东分局的指示	183
(1945年8月6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85
(1945年8月9日)	

致斯大林电	190
(1945年8月9日)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1
(1945年8月9日)	
争取一切条件准备对付内战	193
(1945年8月10日)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	194
(1945年8月11日)	
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197
(1945年8月11日)	
华中准备对付内战的部署	198
(1945年8月12日)	
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城市	200
(1945年8月12日)	
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迎接外蒙军及红军	202
(1945年8月12日)	
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203
(1945年8月12日)	
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	204
(1945年8月12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205
(1945年8月13日)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220
(1945年8月13日)	
在战役上须占绝对优势不可浪打	224
(1945年8月13日)	

河南部队目前的任务.....	225
(1945年8月13日)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227
(1945年8月)	
广占乡村不打大城市.....	240
(1945年8月15日)	
关于警察问题致华中局电.....	242
(1945年8月15日)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246
(1945年8月16日)	
华中部队当前任务和作战方法.....	250
(1945年8月16日)	
包围大同和解决太原问题.....	252
(1945年8月16日)	
就去重庆会见问题复蒋介石电.....	253
(1945年8月16日)	
关于赴重庆谈判问题复蒋介石电.....	254
(1945年8月16日、22日、24日)	
学会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避免无把握的硬仗.....	259
(1945年8月18日)	
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毅部.....	260
(1945年8月18日)	
山西国民党军部署及我军作战任务.....	261
(1945年8月19日)	
抽九个团赴东三省.....	263
(1945年8月20日)	

彻底执行上海起义的方针	265
(1945年8月20日)	
动员城内人民起义，配合我军夺取城市	266
(1945年8月20日)	
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	267
(1945年8月21日)	
审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占领大城市方针的指示稿时 加写的一段话	268
(1945年8月22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269
(1945年8月23日)	
目前党的方针及新四军的工作部署	276
(1945年8月24日)	
力求占领许多中小城市	278
(1945年8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	279
(1945年8月25日)	
复王震、王首道电	282
(1945年8月25日)	
复魏德迈电	283
(1945年8月25日)	
和刘伯承、邓小平的谈话	284
(1945年8月25日)	
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国民党进攻	286
(1945年8月26日)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87
(1945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290
(1945年8月26日)	
致林枫等电	294
(1945年8月26日)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295
(1945年8月27日)	
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	311
(1945年8月28日)	
和张澜的谈话	323
(1945年8月28日至9月11日)	
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谈话	332
(1945年8月29日)	
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	341
(1945年8月30日)	
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八项原则性意见	344
(1945年9月2日)	
为民主人士题词	361
(1945年9月2日)	
为庆祝抗战胜利题词	362
(1945年9月2日)	
和大公报记者的谈话	364
(1945年9月5日)	
为中学生卢国琦题词	365
(1945年9月6日)	
在重庆的公开声明	367
(1945年9月13日)	

尽快派人到上海等地办报.....	368
(1945年9月14日)	
复中共中央电.....	370
(1945年9月15日)	
在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	371
(1945年9月18日)	
复中共中央电.....	372
(1945年9月19日)	
为《大公报》题词.....	373
(1945年9月20日)	
为徐迟题词.....	374
(1945年9月22日)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376
(1945年9月27日)	
给柳亚子的信.....	380
(1945年10月4日、7日)	
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	383
(1945年10月8日)	
七律·重庆谈判	385
(1945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00
(1945年10月11日)	
《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	402
(1945年10月12日)	
关于迟滞国民党军北进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405
(1945年10月12日)	

夺取平绥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	407
(1945年10月16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	410
(1945年10月16日)	
东北应坚决阻止蒋军登陆	411
(1945年10月16日)	
致聂荣臻电	412
(1945年10月16日)	
关于重庆谈判	413
(1945年10月17日)	
致王震电	423
(1945年10月17日)	
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	424
(1945年10月17日)	
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425
(1945年10月17日、27日、29日)	
给续范亭的信	430
(1945年10月18日)	
应抽调地方军补充野战军	431
(1945年10月19日)	
目前东北发展方针	432
(1945年10月19日)	
组织一支野战军进行津浦战役	433
(1945年10月19日)	
致陈赓等电	435
(1945年10月19日)	

目前时局及今后六个月的任务.....	436
(1945年10月20日)	
关于山东华中作战问题的指示.....	439
(1945年10月22日)	
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区创造战场.....	441
(1945年10月22日)	
归绥包头大同等必须占领.....	443
(1945年10月22日)	
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歼灭向承德进攻之敌.....	444
(1945年10月23日)	
孤立傅作义部于集宁后再歼灭之.....	446
(1945年10月24日)	
攻占打成一片的几个城市以利野战.....	447
(1945年10月24日)	
东北我军力量的布置.....	448
(1945年10月24日)	
致郑位三、李先念电.....	449
(1945年10月24日)	
迅速组织热河野战军和冀东纵队.....	450
(1945年10月25日)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	452
(1945年10月25日)	
尽快抽调部队海运东北.....	456
(1945年10月25日)	
程子华速去热河准备反击蒋军进攻承德.....	458
(1945年10月27日)	

准备集中全力歼灭傅作义部夺取归绥.....	460
(1945年10月27日)	
致东北局电.....	461
(1945年10月28日)	
和国民党谈判的补充意见.....	462
(1945年10月29日)	
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十一月份必须完成三项任务.....	464
(1945年10月30日)	
赵尔陆即率部兼程至临城地区.....	466
(1945年10月30日)	
致热河分委等电.....	467
(1945年10月30日)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当面之敌然后再打援敌.....	468
(1945年10月30日)	
准备钳制王仲廉可能北援之部队.....	470
(1945年10月30日)	
歼灭霍守义陈大庆李品仙部即是援助华北东北.....	471
(1945年10月30日)	
准备在邹、滕地区打大歼灭战.....	473
(1945年10月31日)	
集中最大兵力歼灭当面之敌.....	475
(1945年10月31日)	
致赵尔陆电.....	476
(1945年10月31日)	
抵抗由营口葫芦岛登陆之蒋军迫其缓进.....	477
(1945年10月31日)	

致周恩来电	479
(1945年10月31日)	
致东北局电	480
(1945年10月31日)	
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题词	481
(1945年10月)	
为李少石题挽词	482
(1945年10月)	
挽范旭东先生联	484
(1945年10月)	
书鲁迅《自嘲》摘句	485
(1945年10月)	
为柳亚子的诗尹瘦石的画联展题词	487
(1945年10月)	
十一月作战部署	489
(1945年11月1日)	
冀中地区动员一切力量破坏铁路	492
(1945年11月1日)	
在山海关锦州地区坚决歼灭北进之敌	493
(1945年11月1日)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 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

(1945年4月27日)

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作，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解放区的军队，已经达到了九十多万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还需要扩大军队到几个九十万。但是我们还没有外援。就是假定将来有了外援，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供给，这是一点主观主义也来不得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还有疑问吗？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现在，让站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部队，比如说两个连，去选择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或者由上面全部供给生活资料；或者不给它或少给它，让它全部、大部、半部或小部地生产自给。哪一种结果要好些？哪一种它们愿意接受些呢？在认真地试行一年生产自给之后，一定会认为后一种办法结果要好些，愿意接受它；一定会认为前一种办法结果要差些，不愿意接受它。这是因为后者能使我们部队的一切成员改善生活；而前者，在目前的物质困难条件下，无论怎样由上面供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至于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

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我们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员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们目前的条件，还只许可我们采取动员制，还不能采取征兵制。动员来的兵要过长期的军队生活，将减弱他们的劳动观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三）增强纪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不但不会减弱战斗纪律和军人生活纪律，反而会增强它们。（四）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大家明白，我们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剩下的不过数万人，而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们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另一个环子是生产运动。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斗争还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地上努一把力。

关于提议将王明等选进 “七大”中央委员会的讲话^[1]

(1945年4月)

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着重个人的责任。

[1] 这是毛泽东提议将王明等8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选进“七大”中央委员会讲话的一部分。

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 烈士纪念碑题词

(1945年5月1日)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给斯大林的贺电

(1945年5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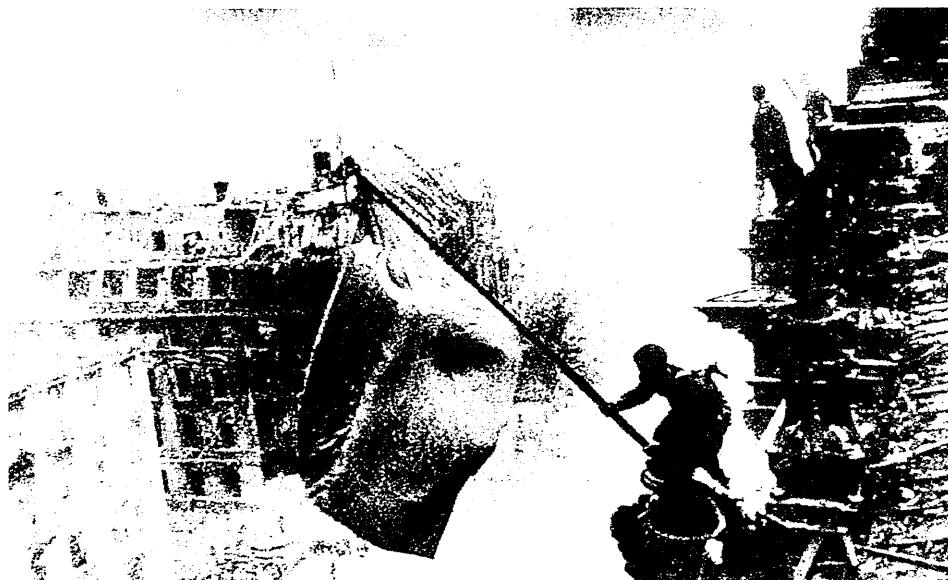
斯大林元帅：

欣悉红军解放柏林，特致热烈的贺忱！

毛泽东

朱德

五月三日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德国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1]

(1945年5月4日)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

(一) 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用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执行。机动办法，或以大部向修铜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

(二) 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区党委组成问题，中央另电通知。(三) “七大”辰有前可毕，会后数日九旅^[2]三千一百人，文旅^[3]二千一百人即可由延出发赴湘。(四) “七大”文件广播你们收到否？

毛泽东

辰支

[1] 这是毛泽东给王震、王首道并告中共鄂豫赣边区区委书记郑位三、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的电报。1945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湘鄂赣军区，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

[2] 九旅，指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该部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于1945年6月由司令员刘转连、政治委员张启龙率领南下。

[3] 文旅，指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旅长文年生。该旅一部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1945年6月由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率领南下。



毛泽东在检阅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 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5月8日)

结论缓一点作，多酝酿些好，小组中有许多好的意见。对中国的斯科比估计得严重些好，蒋介石一定要反共。总之，这次苏联强大了，人民觉悟了，我们党也强大了。同志们强调困难是好的，但结论要多指出光明才好。

[1] 这是毛泽东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 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5月23日)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是理想。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三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二十五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到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1] 5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各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陈绍禹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等意见。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

(1945年5月24日)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三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大会结论等两天就可以做。

第四个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一下。

一 选举的标准

我们要选举一个全党的领导机关，即在大会闭会以后、两次大会之间的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这次要选举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就是说，有两批人要选进中央委员会来。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志，人数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十七年了，这十七年中间，经过三中全会^[1]、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几次的选举，现在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二十五个人。这二十五个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再就是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五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于是就提出：（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可以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这个问题

[1] 三中全会，指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总之，在选举方面有这样三个问题。

关于第一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跟过去历次大会都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大会我参加过三次，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我来讲一点我们党的历史。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

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我们党也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在最近的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现在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委员会主要的成员，是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选举的，六次大会选举的现在只剩下五位^[1]，就是说现在的二十五位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全会选举的。六中全会也选了三位。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呢？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次是六届六中全会，大家知道，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当时如果不克服那么一种倾向，即对放手动员群众这样一条路线不赞成、有所畏

[1] 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关向应。

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缚起来的倾向，如果不赞成放手动员群众，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扩大解放区，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所束缚同时又不脱离统一战线这个原则，那末，今天的局面就不一样。参加六中全会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还不就是这么一批人。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但是，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至于到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的这三年中间，情况就更加起了变化，到七大前作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个变化更大。相信经过七大这样重要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以后，我们党会更加向好的方面前进。我们的这种信心与估计是有根据的。这十年中，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比较顺利，比较内战时期犯的三次路线错误（连张国焘的那一次就是四次）就不大相同。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情况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这些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有信心、有根据断定将来是要好的。如果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该选举，我看就不如采取这样的原则，

即：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去选他。这个原则和不选的那个原则不同，那个原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凡是犯过错误的一概不选举，这是理想。但只确定这一条还不够，还缺少一条，就是说，人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要选举他。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犯错误是不好的，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好的。一定要把这后一条加上，这样才是全面的。这两条一定要结合起来，不然就要出毛病，我们就会丧失好处，就可能产生缺点，甚至可能造成错误。我们只有制定一个很好的选举方法，才可以避免过去的错误。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这就是现实主义，这也是一条原则。这两条原则看起来好像是不一致的，但只有使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才能够办好事情。这才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不完全正确，就搞得不好，就会犯错误。我看没有哪个同志想犯错误，说“我一定要犯错误”。如果对一些同志犯错误这个问题不加以分析，对历史不加以具体的分析，不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那就不行。就是说，如果不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造成缺陷、缺点，甚至造成错误。这一点，是必须向同志们提出来的。对犯过错误的同

志，从感情上是不愿意选的，但从理智上我们可以选。感情和理智这两个东西，现在我们要统一一下，也是可以统一的，就是在理智指导下的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现实主义的方针。过去对陈独秀，对李立三，痛快明了，从感情上说倒很痛快，没有烦恼，但结果搞得不痛快，很烦恼。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你不大来，我就去；你口里有许多闲话，我长了耳朵，这个耳朵听不完那个耳朵听；你说那边窗户开得不够，我就连这边也打开。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所以感情和理智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例子，国际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第一国际时，为着团结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群众，曾经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也曾经同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合作，同马志尼^[1]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这样的榜样，这就告诉我们要避免宗派主义，因为实质上是一个广大群众的问题。那个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有很多的群众，因此要同他们合作，逐渐来改造他们，感化他们。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出去了，意大利民主分子也不干了，但这并不损伤马克思主义，你不干就不干吧！

[1]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派领袖。

中国的和外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党内要尽可能的团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团结、合作。我在报告里已经说了，任何一个同志，只要他愿意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我们就要和他团结起来。我们的团结也是有原则的，就是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决议，要在这样的原则下，和所有同志团结起来。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第二点，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要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昨天傅钟^[1]同志在这里讲了一篇很好的话，我全篇都赞成。在选举上，应不应该照顾山头？应不应该照顾到各方面？我看那个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它有什么坏？清涼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因此，对这些问题要分析，任何一块根据地中，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山头主义。山头主义的情绪，也有各种各样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军就

[1] 傅钟（1900—1989），四川叙永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有不同，一方面军里又有好几个部分，昨天傅钟同志讲了。有一、二、四方面军的区别，还有三军、七军、十军等的区别，因为在各个地方工作，情况不同，关系搞得不好，这就有山头主义倾向，但有些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昨天傅钟同志讲了山内山外的关系，彼此间关系好，山头主义就可以消灭。但许多事情还带着盲目性，工作就做不好，这就要先分析一下。现在我们在这里搬石头，搞关系。现在我们来他一个总结性的办法，把大小石头纷纷搬开，这样关系就会好一点，山头就少了，山头主义也就少了，这样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关系搞好一点，那一半也没有了。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所以不要怕。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发展了，根据地也更多了、壮大了，如果我们去掉盲目性，比较善于处理矛盾，那末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得比较好。

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

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完全避免缺点恐怕也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要它少一点，也可能使它少一点。

我们顾及到前面所讲的第一点，则对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可以选举；顾及到第二点，就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这样，我们的缺点就会少一些。

关于第三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我说的是尽可能的照顾，各方面都照顾得那样周密、完全，就可能是一种凑数，那就不好，完全不照顾也不好。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对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无原则地选他们，他不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我们还要选他们，这是右；但是人家已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还说不要选，就是“左”。对知识的要求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

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我们要完全或者比较完全一点才好，但是再过几年我们的中央又会是不完全的。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1]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因为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也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鉴于过去的中央不完全，再选一个中央将来也还会不完全，因此，我们就要有一个学习的任务。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是不是很高明呢？早两天林彪^[2]同志讲，我们比国民党的某些方面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也有比不过他们的，比如我们就不会驾驶坦克，不会驾驶飞机，不会打大炮。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不完全，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建设上也不完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一个比较完全，搞一个现实主义，再来一个学习。选举中央委员会，就要选有学习精神的人，他不懂得这不要紧，我们选他，让他去学。我们的选举，就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求完全。

总起来讲，我们大会的代表同志们应该有一个希望，希望有这

[1]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2] 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包含有大批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这里不是讲没有犯过错误，而是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也要包含一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今天表示放弃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的同志；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就是出了名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也要包含大批过去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要提拔他们到中央委员会来，把他们提高，因为将来我们还要发展。我们现在有近一亿人口，将来还要发展，很快也许就有两亿人口，也许还要多一些，因此我们现在就要训练领袖，首先要训练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领袖，全党都要拿眼睛来望着它，这就是训练；拿嘴巴哇啦哇啦地讲，这也就是训练；打开窗户，要空气透进来，这也就是训练。我们的中央过去虽然不大，只有二十几个人，也做了事，现在应该扩大一点。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训练领导干部，这倒不是说现在要故意地搞“成名干部”，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还要搞，以便适应发展着的中国革命。这个中央还要包含有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也包含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或者专门通晓某一方面的同志。总之，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包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说，这个新的中央要既能弄通思想，又能团结同志。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就要选出这样的中央。我们的代表多得很，有的同志送给

他一个代表名义他还不要，有许多同志要求不要当选中央委员，这种态度是好的。孔夫子讲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1]不要说什么革命没有胜利就是因为我没有当中央委员，这样说是不好的。我们要慎重地选举，慎重地就职，这样才是好的态度。这样的中央，才能够保证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样的中央，就可以避免或者大体上避免重复历史上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中央，才适合于我们党目前发展的情况及适应于将来的发展情况；这样的中央，才能够给全党同志、全国人民以好的影响。这样一个中央，就是一个缺点比较少的中央，一个比较更有保证的中央，一个使人比较放心的中央。历史的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是这样。

还要解释几个问题：有同志说这样的中央岂不太庞杂了吗？还有同志担心，有一批人难免要落伍、要掉队，就是说要再犯错误怎么办？能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还有人说，这样的选举不大公平，名单规定的人数只有那么多，又要照顾这个方面，又要照顾那个方面，就势必使得有些同志甚至是能力比较强的同志不能当选，这就不公平。

首先，关于庞杂问题。我们党过去就是庞杂的，现在我讲一下庞杂的历史。我们党在大革命的后期是庞杂的，存在着一条错误的陈独秀路线没有被清算。结果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庞杂大革命失败了，是一个不良的结果。革命一失败，使成千成万的人民受了损伤，党也大大地缩小了，被打入了地下。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在我们党内曾经存在盲动主义路线与立三路线，后头虽然清算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而

[1] 参见《论语·述而》。原文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且还有长期没有被清算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与后头的张国焘路线。这种情况庞杂不庞杂？庞杂，而且是路线的庞杂。受了损失没有？受了损失，而且受了很大损失。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已经写了。第三个时期是从遵义会议到七大。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已经结束，但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凡是一个东西不搞彻底，就总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又出了一些乱子。第二段，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时逐步地比较彻底地清算了一次“左”倾路线。以上三个时期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时期不庞杂呢？第一个时期有路线的庞杂；第二个时期有几次路线的庞杂；第三个时期，六中全会以前还有点庞杂，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三年整风以后，庞杂问题解决了，人还是那么多的人——二十五个中央委员。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所以对过去犯过错误、翻过筋斗的人，现在要以新的眼光去看，犯过错误是事实，但说现在还犯错误就不适当。遵义会议以来，十年工夫，六中全会以来，七年工夫，整风以来，三年工夫，逐步改变了过去庞杂的历史，现在比较不庞杂了。一个庞杂，一个不庞杂，有性质上的区别。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区别？是质的区别，性质上的不同。这个质我们要抓到，不抓到这一点就不好。我们要记得这个历史，关于庞杂这个问题不必害怕，再选他们，不会使我们新的中央搞得很危险。

第二，会不会落伍，会不会再犯错误呢？有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代表都一致地欢迎。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希望在大会代表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我看这讲了一个真理，就是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荷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也需要大家帮助的，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大家帮

助，才能进步，才能解决问题。从我们全党现在的情况看，从我们这次大会的情况看，以及从我们过去三个时期的经验、抗战八年中的好的坏的事情和整风中的经验看，都可以证明这一真理。落伍问题、重犯错误问题会比过去少，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更有了保证。那末是不是可以绝对地完全地有了保证呢？也不能这样说，还有落伍的可能，还有再犯错误的可能。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还可能再犯错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更可能犯错误。因为推起车子走路，跌过跤的和没有跌过跤的，会有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不同。推车子没有跌过跤的人要注意，更要谨慎，说不定正是你高兴自满地说“我就没有跌过跤呀”的时候，恰好跌了跤，翻了车。过去跌过跤的人，往往比较稳一些，眼睛到处望，还有站在两旁的人提醒说：“你要谨慎一点，过去跌过跤呀！”他的帮手也多一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比较先进的、中间状态的、比较落后的这样三种情况，现在我也不能写保字，保证我们这次大会绝不选错一个人。现在看来他是好的，将来他又不好了，这种可能还是有的。我们这次要选举几十个人，可能中间有若干人，走到半路上脚痛蹲下去了，这就可能落伍、掉队。过去没有跌过跤、翻过筋斗的，也许这次跌一下，跌过的可能再跌一次。这样的事，世界上还不是有过？老百姓推车子，并不是跌了一次就再也不跌了，搞不好可以跌好几次。所以几十个人中间要一个也不落伍，这个险是保不了的。我们要选举几十个中央委员推车子，载小米，推的推，拉的拉，可能漏掉一些小米，但只要保证明天早上靠得住有吃的就行了。当然这也要谨慎，不然一大堆粮食都翻掉，明天便没有饭吃。同时也不要怕，丢一两颗、两三颗小米也没有什么，我们生产的小米很多，丢两三颗不要紧。如果个把

车夫搞得不好，在八次大会还可以另选，或者在两次大会中间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改选一下就行了。

第三，关于不公平的问题。要照顾各方面，老的里头，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和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两方面，这两方面都要照顾；新的里头，要照顾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即是所谓山头。这种照顾，我在前面讲过，只是尽可能地照顾。知识也是尽可能懂得多一点，但是懂得少一点，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选他。这样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既然老的新的都要照顾，知识又不一定能通晓各方面，我们又不能选举几千几万的中央委员，这就会在选举中使有些在能力上知识上比较好、对党也有功劳的同志没有当选，这岂不是不公平吗？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因为虽然犯了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与没有犯错误的同志有不同，但是我们不选他们，单选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就会有另外方面的缺点，所以一定要选他们。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建议。因为要照顾各方面，就会使得有些同志按他的能力、知识本来可以当选，但是没有被选上，这种情况会有的，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准备。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会有同志说：犯过错误的倒又选上了，没有犯错误的倒选不上；人家知识不及我被选上了，我还不错却没有选上。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在精神上都要有准备。大会闭幕以后，如果有同志对这个选举方针不理解，我们要好好解释，从历史上解释，从历史的经验上说明这个方针。

二 选举的人数

今天要通过选举法，选举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提两回候选

名单，第一回是预选的名单，第二回是正式选举的名单。通过选举法以后，大家就要考虑，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明天或后天主席团就要提出预选的名单。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目字的提议，叫做七十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七十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三个方案，一个是一百人左右，一个是七十人左右，一个是三十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七十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一百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两百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七十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三十个人、四十个人左右太少了，一百个人左右太多了，七十个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团提出这些意见，当然最后还是决定于大家。

这次选举，同志们是要为着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要考虑这是有关全党的利害的，对党、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比较没有利？是完全有利的，是完全为着有利的。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我们要注意没有到会的、我们不认识的同志，如果候选名单里有他的名字，我们就要注意；自然，到了会的也不见得都认识，这就要经过各代表团主任的介绍。这样，我们这次选举，就会选举出一个比较好的（当然是比较的）领导机关，作为指挥中国革命的工具。我们是马克

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⑩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总之，我们大会主席团希望同志们，全体代表同志，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的。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请同志们考虑。

[1] 这是当时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中的一段。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修订的《国际歌》歌词的译文。这段歌词的新译文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 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5月27日)

关于战略指导问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是由日本、我们、国民党三方力量决定的，而我们是处在中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何种形式？我们在抗战开始时搞的麻雀战是进攻的形式，是对的。一九四〇年后我们应退却。一九四〇年冬以后，敌后才转入相持，现在基本上还未脱离相持阶段。后来我们采取更分散的形式——武工队。后来，十大政策那一整套我们学会了，加上太平洋形势的变化，我们又前进了，比一九四〇年发展更大了。今后的问题，要得到技术条件，要准备二十到三十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关于干部问题，新老干部关系、外地本地干部关系发生问题，一般情况下要老干部、外来干部负责。两万老干部团结带领广大的新干部、本地干部、非党干部的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胜败的问题。凡是历史上跌了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历史地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搞工业，不学工业，我们就会灭亡的。这个问题在转变中要讲一下。

[1] 5月27日，毛泽东在枣园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45名、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给冈野进的信^[1]

(1945年5月28日)

冈野进同志：

此件^[2]看了，觉得是一篇好文章。通过它，我了解了日本共产党的具体纲领。我认为，关于没收垄断资本（操纵国民生计者）一条，是非常正确的。这一条，英国、法国的共产党都是如此，中国党也一样。如今，日本党也有了。只有美国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接受这一条。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提出什么，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我颇感怀疑，我想他们是找不到出路的。此点，正待研究。我

[1] 冈野进，即野坂参三。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之后，野坂参三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名为“冈野进”。这封信，是毛泽东针对野坂参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提出的意见。其中，有关日本的天皇制的问题，是人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当时，日本共产党内，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领导人都主张“打倒天皇制”，而野坂参三则主张由日本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废除天皇制。野坂参三在发言稿中提出的观点是“天皇存废的问题，应当在战后尽快由一般人民投票来决定”。毛泽东是了解当时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要求废除天皇制的愿望的，但是，他考虑到战后的日本可能出现实际状况和日本共产党的实力尚不足等情况，认为如果仓促举行公民投票，恐怕大多数人仍会选择继续实行天皇制的。因此，他建议野坂参三把“尽快”二字去掉。从那以后，60年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日本的天皇制，至今也没有废除。

[2] 指野坂参三的文章《建设民主的日本》。

想把你的意见也提供出来。去年出版的白劳德同志^[1]的《德黑兰》一书，你看过了吗？希望你看一看。改日我们一起议论一下。

此外，有几个细微之处，列举如下：

第15页第2行的“新兵与老兵比较多”，是“新兵比老兵多”的意思吗？如是，我想还是改正过来的好。

第31页第5行的“上下级指挥官”的“上下级”三个字，我想还是去掉为好。同页第9行“大小政治家”的“大小”两个字，我想改成“反动”为好。同页第10行的“下层法西斯分子”的“下层”两个字，我想还是去掉为好。同页第11行“思想检事等”的后面，我想还是加上“其中的积极分子”等字为好。现在，因为正处于宣传时期，涉及更大范围是不合适的。到了将来的实行时期，根据大众的发动程度，我想到那时采取更灵活的对策是有利的。

第37页第10行的“尽快由一般人民”的“尽快”二字，我想可以删去。这个投票问题，到那时，究竟是早一些有利，还是晚一些有利，应当看情况决定。我推测，让日本人民不要天皇这件事，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以上，请斟酌。然后，请送给博古^[2]发表，并交广播电台播送。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1] 当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

[2] 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1945年5月31日)

同志们！我的结论讲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三个问题。

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条方针里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说的组织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就是说的总司令、指挥官；“打败日本侵略者”，就是说的敌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说的目标。

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昨天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手是我们自己的，放不放在我们。谁不叫我们放手呢？有许多人，其中就有蒋介石。现在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三十条政纲中有一条是“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比如军事的统一，那就是要我们把军队统统交给他们，不要八路军、新四军。这个斗争早

就有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1]，就是不让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2]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就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内战时期我们放手了，但又过了一点，没有把放手发动群众同冒险主义相区别。在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就是这条路线，这次大会只是批准这条路线，并对这条路线有所发挥。如果没有过去多年的经验，我们的大会不可能作出肯定这条路线的决定。放手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而不是冒险。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放手而不冒险。这一个方针一直到全国胜利都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压力很大，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束缚手足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如此。第二国际一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第二国

[1]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指广东省会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3月20日，蒋介石谎称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所谓中山舰事件。

[2] 汪精卫，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主席。初期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其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的面目逐渐暴露。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分共”决定，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1938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际违背这一方针，崇拜自发论，一切听其自然。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联共党的领导下，先打倒沙皇，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后打倒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要宣传这条方针，肯定这条方针。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和我的报告^[1]，都是贯穿着这个精神，坚持这条方针。阶级不消灭，我们的这条方针是不会取消的。由于各个阶段情况不同，政策会有变化，但总方针是不变的。至于如何实行这条方针，这须要根据周围情况及其内部联系来决定。

一 国际形势

我在报告中这样说：“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这一看法到底对不对？世界是不是会倒退？“倒退”这个问题，报告中也讲到了，说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作另外的一种估计，报告中的某些基本点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地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苏联和各

[1] 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样就要经常斗争。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但是，说苏、英、美三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客观实际上不存在。现在有两个客观实际，我上面说的不是按照反动派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而是按照苏联和世界人民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苏联和世界人民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说现在反苏反世界人民的大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英、美资产阶级内部，有一部分反动派要干，一部分不愿干，一部分是想干而不敢干。旧金山会议可能无结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绩而散。苏联在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三种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圆满；（2）无结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们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下次再来；（3）最坏的结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现在看来，第三种可能性不大，第一、第二两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三种情况发生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推翻了，这是不是说英、美就要组织反动派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进攻苏联呢？也不能作这样的结论。莫洛托夫^[1]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声明说得对，他说即使这次会议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也不能建立，我们要努力争取建立，这次搞不好将来再搞。他的这个话是包括对整个世界情况的估计，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国人

[1] 莫洛托夫（1890—1986），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是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苏联代表。

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资产阶级内部不统一，不是完全反苏的，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的。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结束了一半，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即使旧金山会议这次搞不成，也不能说就永久搞不成。在宣布欧洲胜利的那天，斯大林说，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斯大林说得对不对呢？很对。在欧洲，战争时期过去了，和平时期到来了。斯大林的判断是根据整个情况说的。苏联是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列宁曾经讲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在十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1]这是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同志们，一九四一年德国进攻苏联，是不是二十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时，斯大林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现在是胜利了。苏联的胜利是从在莫斯科打胜仗开始的，不是从斯大林格勒^[2]才开始的，没有莫斯科的胜利，也就没有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苏联红军的旗子已经插在柏林，列宁的话讲灵了。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现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的古书上没有资产阶

[1] 参见列宁《〈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新的译文是：“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匪恐怖的苦难。”（《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2] 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

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按照列宁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将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至少在几个文明国家同时胜利。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列宁根据新的情况，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话又说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也讲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从十月革命起，资本主义缺了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再一夹，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夹掉。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就装上木脚来走路。你们说这剩下的资本主义，是比过去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

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现在英、美各国的通讯社和报纸，专为一些小问题咬住不放，吵闹不休，令人看起来很觉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就是“蚀大本，算小账”。第一次世界大战失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失掉一只脚，现在却抓着一根头发死也不放。本钱蚀去了，不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国本身也打得五劳七伤，这表示资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们不抓小辫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用意。世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言论，其作用在于：（1）阻止苏联及欧洲人民力量的发展，在苏联及欧洲人民面前，抓着小辫子讨价还价。（2）调动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给自己撑腰。要找人撑腰，就不得不唱些适合于反动派的调子，才能调动那些反动派，团结那些反动派，作为自己的基础。（3）压制革命人民。丘吉尔^[1]发现他处在欧洲人民包围之中，处在英国人民包围之中，所以要唱一点反动调子，压压人民。由此看来，我们便可懂得，旧金山会议争论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将来东方问题还要争论的。这些争论，好比做文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他们还有两只脚未砍掉，还可以走路，还不甘心，所以有争论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争论反倒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波兰问题的小辫子也抓不了几天了。苏联没有挂牵，所以能主动。英、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动的，英国原来

[1] 丘吉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苏联，把苏台德区等送给德国，但是它雇佣的希特勒这个“劳动力”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顿，打得哇哇乱叫。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原是出钱雇“劳动力”去打苏联的，送铁送汽油给日本，也就是出工钱的意思。日本就在边界向苏联挑衅，从美、英拿工钱，把工钱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才对日本宣战，英国并与苏联签订有效期为二十年的《同盟互助条约》，美国与苏联签订在反侵略战争中互相援助的协定。资本主义的主动性，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十九世纪上半世纪还有一点，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便昏庸腐朽，变成帝国主义，即处于被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是被迫打的，没有计划的。对南斯拉夫，他们不承认，后来又承认了。现在对波兰也不承认，将来还是要承认的。现在他们不承认中国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

资本主义是向下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一九二八年繁荣期间，美国的生产总值为六百万万美元，现在，有人说是一亿三千万万，有人说是一千八百万万，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是一千五百万万到二千万万。如果说过去六百万万是两个指头，那末现在若为二千万万就差不多是七个指头。它的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所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了。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

这次旧金山会议，即使搞不成，第二次旧金山会议还是会要来的。因为世界情况需要它。关于建立反苏堡垒线，英国保守党是有这种企图的，从前是以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的这道墙壁，现在被苏联拆掉了。若它再搞这一套，那就回到张伯伦^[1]那里去了，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英、美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败日本后，两只手都要做生意。

总起来讲，第一次大战以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没有了，不稳定就经常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的，大概是十年八年一次，是有规律的有周期性的。这次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他们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可能稳定下来，但不是长期稳定，其中包含着危机。

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

[1] 张伯伦（1869—1940），英国保守党领袖，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内阁首相。他推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入侵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既成事实”，实行妥协。

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二 国内形势

第一，《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第二，三个大会。去年九月民主同盟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目前

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正在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个大会如果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大会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实际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报》上都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大会^[1]，同志们可以去看。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有一点特殊，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上面这两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民党现在更虚弱了，更惧怕了，他们的党员中想要加入其他政党的人更多了。但这个赌咒发誓，在现在这个时代往往是不行的。一个党不是靠党员个人的思想自觉，而是靠赌咒发誓，它的事情就大不妙了，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国民党大会的性质与我在《论联合政府》报告里所说的一样，没有多大变化，还是法西斯主义。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国民党里也有旧民主主义者，这些人虽然赌了咒，还是可以和我们联合的。

有的同志问，我们这个《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发表后，对于国民党的大会以及在外面起了何种影响？最近我们才收到报告，是起了影响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了三万份，每一个《新华日报》的读者都能看到，有些平时不看《新华日报》的人这回也看了，有人一晚上没有睡觉看完了这个小册子。蒋介石是很不喜欢

[1] 1945年5月30日、31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新华社评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该报社论《评国民党大会各文件》。

的，他说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之耻辱，大概他们那个大会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国民党的最大耻辱。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他们要打内战，要消灭我们。但是在他们的很多代表中这个小册子是发生了影响的，说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别看国民党有几百条，但没有办法。他们大会的宣言是事先就起草好了的，我们这个报告一发表就把他们那个大会给打乱了，原来准备开十天会，五月十五日就结束，后来拖到二十一日才闭幕。他们想驳我们又不好驳，想重新起草宣言又不大好写，现在发表的那个宣言不晓得是哪位先生重新写成的。我们这次大会在他们大会之前开幕是好的。他们有些东西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的，比如，关于少数民族问题，他们现在也不得不讲民族问题了，我们来了一个减租减息，他们就搞了不止一个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政策纲领。

第三，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十六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第四，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十七条：

第一条，外国大骂。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不是说几小块，也不是说统统占光，而是被他们占去几大块，他们要打内战“收复失地”。在十年内战时期，他们就曾经占去我们几大块，这次我们还要准备被他们再占去几大块。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千万军队。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军队，准备被搞掉二十五万，还有二十五万。这二十五万是什么？原来五十万是伸开的手掌，这二十五万是握紧的拳头，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

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1]，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第六条，爆发内战。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八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意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2]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

[1]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城濮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楚军占优势。晋文公令晋军退却90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打击，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1]，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你九十年不承认，一百年不承认，将来到一百零一年，你就一定得承认。因为我们的政策正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散得最厉害的是一九二七年，还有散得多的是内战时期，有组织的党员只剩下三几万。在不好的情况下，党员中有一部分悲观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压散了，也无非就是这样，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中国革命是长期的，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二十四年了还没有胜利，还要搞下去，还要牺牲许多党员和军队。党内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的问题，不仅要对我们大会、中央、中央局，还要对区党委、地委这些领导机关都讲清楚。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天灾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帮忙。最近得到报告，华北、华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今年我们边区没有收成，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要讲节省，从中央起都要讲节省，准备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华北、华中许多地方都要准备这一条。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有天灾经济是困难的，没有天灾经济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我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有的同志问：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怎么办呢？现在日本法西斯作战是寸土必争，看样子是不会撤的。但我们要把事情往坏一点想，即使长

[1] 语义出自宋代张载《西铭》：“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江流域的日军统统撤到华北，难道我们就呜呼哀哉了吗？中国抗战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横行不了多久了。敌人集中华北，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假如这件事出现了怎么办？我们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这些办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有准备，以防万一。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不要以为不会发生意见分歧，上述困难一来，许多情况出现，就可能产生党内意见的分歧，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如果我们准备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没有准备，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中国革命是长期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他们还料不到我们的困难来得这样早，就是料得到也没有办法，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困难我讲了十七条，下面讲我们一定要胜利。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掉吧。党员中间的动摇分子，他们在革命热闹的时候来凑热闹，在困难的时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们开欢送会。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1]，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些经验很好。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

[1]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二十四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三 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上面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现在讲第三个问题，关于党内思想政策问题，这里面又包括若干个问题。

(一) 领导问题

《解放日报》昨天发表了一篇苏联人华西里也夫写的文章，叫做《论科学的预见》。这篇文章我们很久以前就翻译过来了，这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几个月写的，所以文内没有讲到关于这次大战的情况，但是可以从中看到对于这次大战也有预见。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1]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

[1] 参见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原文是：“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

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比如，大城市是一个大东西吧，国民党加帝国主义是大东西吧，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总叫国民党是“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我们也曾看错过，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于是产生轻敌观念、速胜论。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

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十个、八个也不是很关键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点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就属于这种预见。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感觉不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农村，还是在关内。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

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只不过几十年。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到一九〇三年整整六十年，地球上的俄国才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叫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内出了一个派别，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然后全人类才找到新的方向。六十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普及，没有去实现，六十年以后，才产生了这样一个派别，后来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行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十一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三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四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一九〇三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〇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

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1]。“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我们的同志过去不大想问题，这要怪过去的领导不提倡想问题。脑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这个器官专门做一项工作，就是“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2]，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这次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回到各个地方去，要告诉每个同志，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等等。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

[1] 参见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

[2] 参见《孟子·告子上》。

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民主集中制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我跟他交谈过，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别的同志也赞成。我想可以叫做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放手”这两个字，还可以再斟酌一下，这是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党历来就讲民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我们党历来也是讲集中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集中得不恰当或者集中不够。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统一。

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

同志们！我们党是最公平的，最讲道理的，大多数的人是公平的，大多数的人也知道要集中，他们也要求集中。我们党内的同志是有这个觉悟的，他们不会不懂得集中，也不会妨碍集中。当然，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也是有的，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批评它，指出这些思想是不好的。现在我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同志懂得高度集中的必要了。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我们的党员有意见要在组织里面讲，不许在组织外面讲，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还有在组织以外讲的，那是闲话，这也是事实。我不是提倡小广播，不是要大家在七大以后去大搞小广播，我是说小广播是存在的，哪一年也有一点，我们要去听，去收集材料。这些材料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正确的收集起来，错误的也收集起来，都把它当作原料。我们现在是开工厂，七大就是开政治工厂，我们中央也是开政治工厂，这个工厂没有原料怎么行呢？原料贫乏制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我们还要登广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登广告就是为了要收集原料，为了使我们的政治工厂的原料多一些，其中包括小广播这种原料在内。如果我们扩大民主，把小广播合法化，把“黑市”变成合法的，原料就会多起来。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胜利，就要

失败，就要被消灭，所以没有集中不行。但是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三) 干部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性质，现在是一个农民问题，将来是一个全国人民的问题。从内战时期开始到今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农民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应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二十年至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现在如此，将来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关系问题。我们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问题，远的不说，就讲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提出的宗派主义倾向，就包括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些问题在内。这两个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个别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这个问题是从农业地区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因为我们长期活动在农业地区，因此是农业地区的长期的、普遍的问题，或者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

了。白区工作也是这样，“钦差大臣”一到哪个区域，那里的工作就跟着垮台。这个痛苦大不大？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红军和苏区光了一大块，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质量更好，质量提高了。

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在内战时期是有一个路线问题，那末在抗战时期总没有一个路线问题了吧，可是这个问题还是发生。华中、华北我没有去过，在边区我就亲自见过，我也亲手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好。这个问题得出的教训深刻得很，因此值得提出来讲一下。一九三六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二十六军，后头是对待红二十七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军队里面也是一样，总是说地方对不起军队，提起这些事来，他们可以说出几十条。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服，但是很难说服，这个问题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没有系统地分析和系统地解决问题。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

确的也不是科学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干会议^[1]我们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说服了同志们。高干会议以前，我们没有系统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说服同志们，这个责任在我们。经济问题也是一样，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干会议才系统地说明了。

现在高干会议已开过两年多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军民关系是不是彻底好了呢？我看还没有。在座的有许多是边区的军队同志与地方同志，我想大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做这样的结论是有害的。说有很大的进步，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好，至少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努力才能解决。华北、华中、华南的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与地方的党和政府的关系，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也至少需要两三年的努力，并且要抓得很紧，才能解决。稍一抓得不紧就容易动摇，因为我们军队的同志两只耳朵经常听到的是地方对不起军队、老百姓对不起军队这些话。对这个问题，也要有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解决。在军队里头，有军事工作人员，有政治工作人员，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外来的，有本地的，都有一个同地方、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所以，军队的负责同志要下决心，首先是军分区的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团长以上各级负责同志要下决心，要看清楚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将来要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容易经常动摇的，决心是不容易下的，所以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经常说服我们的同志，一次说服不了，二次再说，要经常讲。要告诉大家应当怎样去做，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有许多事的确是地方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也有不对的，如果不讲这一条，军队也不服气。但是，问题解决首先从哪里做起？首先应该从军队做起。军队又从哪里做起？首先从军区、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做起。要有坚定的原则，要多听地方同志的意见，因为地方同志的话你们很难听得到，他们也难得有机会讲。我就有这个经验，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什么陕北人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为什么陕北红军不编一个师？说什么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学问不好。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些都是闲话，对这些话我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说张国焘的学问比我好呢？就是因为批判张国焘路线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三八五旅的旅部打电报给留守兵团司令部反映这些情况。我说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张国焘路线了。那个张国焘路线好不好呢？我说当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他们从另一方面想，张国焘没有整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就整了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所以张国焘的学问就好，毛泽东的学问就不好。我是不是也承认了这一条呢？我承认了这一条，必须要承认这一条。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说我的学问比张国焘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这些原因，要解决问题。

我们军队的同志，老干部是主要的骨干，这里强调“主要的”三个字。在将来，再过二三年，抗战初期入党的干部，有些就要参加到骨干中来了。现在有许多力量是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抗战以后的干部领导的，这是好事，但是主要的骨干还是老干部。现在北伐时期的干部不到一千人，内战时期的干部不到两万人，时间越长老干部就越少，新干部就越多，这是自然规律，后面的要接上来。军队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的问题，我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已经讲到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老干部即抗战以前的干部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六中全会时我就讲过，老干部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这个估价是很高的，这个估价是反映了人民的意见，也是全党的估价。老布尔什维克是领导的骨干，严格地说，我讲是重要的领导骨干。

所谓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军队与农民的关系。忽略了这一点是不行的，就要犯错误，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原则，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军队每到一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我们如何，地方党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他们都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要采取原谅的态度。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每一个军分区、每一个军区应该采取更严肃的态度。对自己要严格一些，这样才是对的，应该如此，也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现在我们的很多部门、很多机关，距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人民的军队呢？是，而且早已经是人民的军队了，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缺点，还需要加倍努力。

我们的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首先是我们军队的负责同志应该说明这个问题。没有系统的说明，下面的干部战士就不信

服，他觉得你说的总是老一套。所以，我今天要讲清楚这一条。少奇同志、总司令^[1]已经讲了，要学会善于当骨干，就是说要善于当先生，要学会教授方法，这个教授方法要经常讲。要经常存一个心，就是总怕对不起地方，如果我们出了错误，就允许地方同志批评我们，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2]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3]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还多得很。

在干部问题上我还要简单补充几句，就是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各个方面军，各个军团，各个军队，都一样的光荣。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在解放区工作的同志，都一样的光

[1] 指朱德。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3]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荣。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党务工作、文化工作，从事这五大门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的光荣。不能说某些部分特别光荣，另外一部分就不光荣。过去我们有盲目性，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要承认各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光荣，对于各个部分都要加以照顾，不要有一点态度不好，欺负任何一个部分，看轻任何一个部分。在这方面，凡是过去搞得不对的都要承认错误。今天，当着大会代表们的面我再讲这样几句，就是凡是我们做的对不起人的事情，不论是我亲自做的还是别的同志做的，都应该承认错误，并且加以改正。军队的同志，地方的同志，凡是过去我们没有搞好的，估价不适当的，让你们怄了气的，我们都应该承认错误，修正错误。

还有技术干部，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漏掉了，今天补充一下。有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例如做通讯方面和经济方面带有技术性工作的干部，对做各种技术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军队里面的、政府里面的、党组织里面的，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承认他们有功劳，全党同志要看得起他们，过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后要搞好。

(四) 整风、审干、锄奸问题

这次整风、审干、锄奸工作是有成绩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我是党校校长，整风在党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缺点与错误；第二部搞得比较好，进步了。以后整风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这种进步的方法去办。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

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后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1]，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

[1] AB团是1926年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月起，赣西南根据地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1]，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认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九条方针^[2]并不是一

[1] 湖西地区即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3省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1939年8月至11月间，边区内错误地开展肃托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先后被逮捕，受审查，有的被错杀，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这是一起重大历史冤案，1940年至1945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作过多次处理。198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2] 九条方针，参见《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九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

（五）准备转变问题

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比如，我们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这也要有准备，具体的步骤交给中央军委去办。各位同志回去后要告诉各个地方，就是要开始准备，这个问题朱总司令已经讲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

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东北的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六）关于政治路线

我们大会给了我们一个检查全国工作的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就可以检查全国的各种工作。

关于政治路线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几句：在八年抗战中，就

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某些地方、某些时间、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过错误的。我这里不讲错误的大、中、小，也不讲或者是路线的，或者是严重的原则的，或者是个别问题上的，所有这些错误都在内。第一、第二这两方面合起来就完全了，忽略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对的。

(七) 关于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也可以照上面的方法来讲，就是就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时间、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错误的。这个“某些”究竟是指哪些，今天说不清楚，还要大家研究。

(八) 我们党能不能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这个问题我想要看情况来决定，或者能领导，或者不能领导，有时候能领导，有时候不能领导。比如对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希特勒就不能领导，又如对汪精卫就不能领导，他们要打倒我们，你还能去领导他们？对蒋介石来说也要按情况来决定，他在抗战初期有过进步，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将了他的军，那也是对的。这是叫领导还是叫影响呢？我说这是叫影响，我们对于他有了影响。但是后来他就闹别扭，开了一个五中全会，要消灭我们，这就不能说是我们去领导他。所以，要看情况来决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

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我们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共同领导”这个提法怎么样？我说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比如现在的旧金山会议，哪个会出来说我领导你们，谁也不会讲这句话，还不是说五大国共同领导。克里米亚会议也是三大国共同领导。所以不在话怎样说，而是要看怎样做，领导者怎样领导。从前同孙中山合作时，我们说在孙中山领导之下，其实是共同领导。抗战初期，我们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个话错了没有呢？我说没有错。因为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中国当时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是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于不讲了，改为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把他那个政府改组一下。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但是，过去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问题就在这里。

（九）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

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

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十)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

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他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十一月份。

这里还要讲一个党外合作的问题。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

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十一) 党性与个性问题

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1]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

[1]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两句诗，参见龚自珍《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整风中有党性，也有个性；生产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军事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政府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

(十二) 理论工作问题

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

[1] 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我们还应经常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外国党的宣言、纲领一类文章，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

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1]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十三) 实事求是问题

第一，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第二，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2]，就是要大家学习

[1]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曾为复社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作《鲁迅先生全集序》。

[2] 参见《列子·汤问》。

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 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6月2日)

美国现在定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

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1] 6月2日，毛泽东在枣园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准备南下支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6月7日)

这次有两个旅，还有很多干部，要到前方去，这是关乎中华解放的问题。

我今天代表全党向你们赠送的礼物就是“由小到大，一定胜利”。你们这次出去，能不能胜利，决定于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好坏和政策的正确与否。你们要同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有了正确的政策就到处无敌。

[1] 这是毛泽东在准备南下的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和警备第一旅营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18日，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警备第一旅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南下。

复罗荣桓电^[1]

(1945年6月9日)

来电^[2]悉。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1] 这是毛泽东复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2] 罗荣桓5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说自己的病未痊愈，准备来延安治疗，山东分局的工作请中央决定，或暂时指定一代理书记。

致邓小平电^[1]

(1945年6月10日)

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安开会。

[1] 这是毛泽东致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

(1945年6月10日)

一、今天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同志们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三十四名；他们也参加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末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会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在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之后，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团说，希望注意选举，要选能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到中央来。这个方针，主席团已经提出过了，我在这里也代表主席团作过报告，各个代表团也讨论酝酿了好几天，昨天同志们选正式中央委员就是按照这个方针选举的。那末，为什么这位同志在昨天选举之后还要提出这个意见呢？他的意思是说，有些候选人并不知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若干缺点和错误，但是在长时期中证明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我们不要因为他不知名甚至有若干缺点错误而不选他。我认为这位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二、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1]同志得了二百零四票，不足半数，没有当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几句话。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2]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3]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

[1]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3人军事领导小组。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944年因伤病复发离职休养。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2]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1931年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3] 顾作霖（1907—1934），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

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却是他的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1]、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

[1] 洛甫，即张闻天。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1]，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

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

[1]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病未能参加会议。他在1945年4月17日和22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谈到对待党的批评和自己的错误应采取严肃态度。信中说：“党严肃的检讨过去历史问题，每个个人也应严肃的对待自己。”“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的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若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病中脑力不济，思路前后不连续，故写得零乱。是否妥当，尚乞指示。”这两封信毛泽东曾批示印发七大代表。

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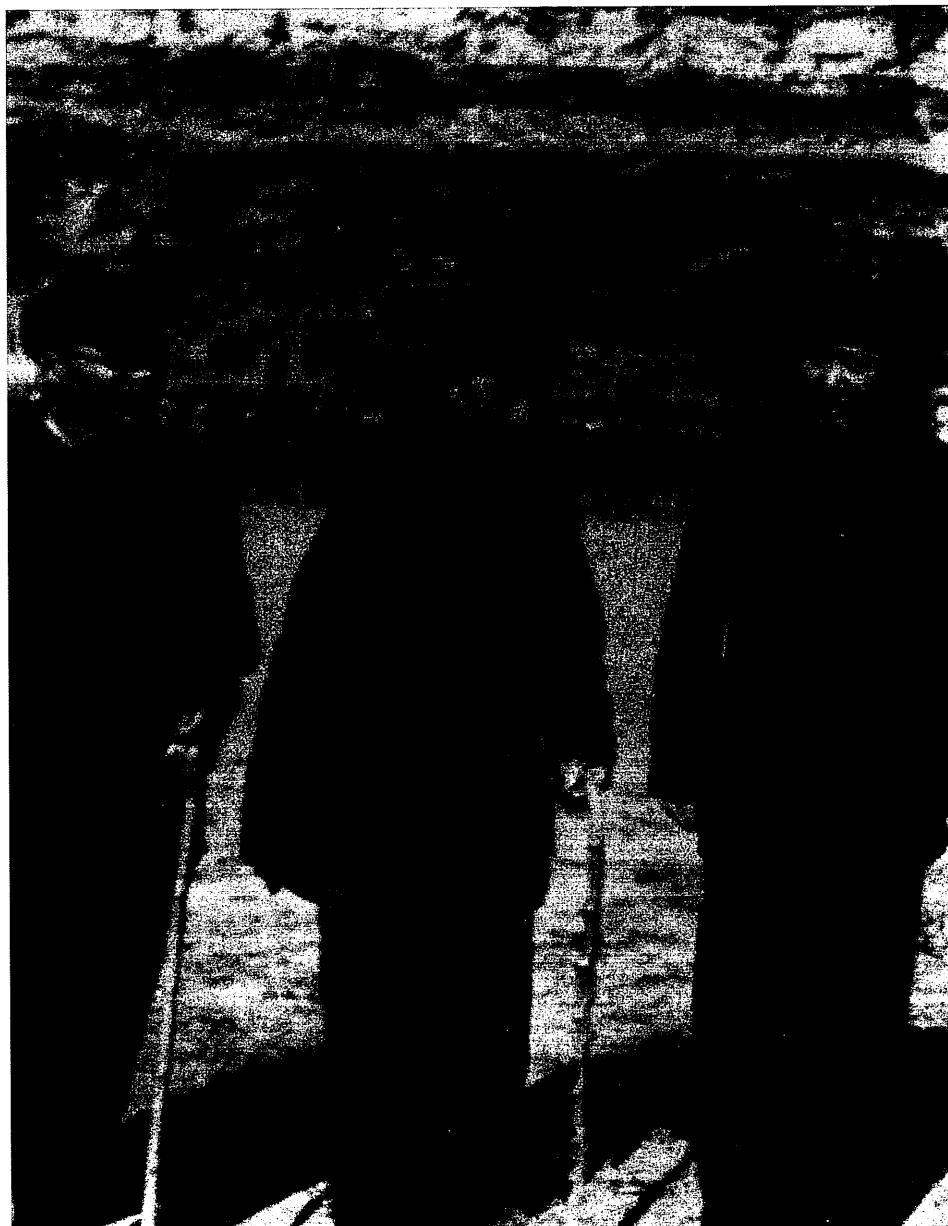
1945年，毛泽东和周扬在延安。



1945年，毛泽东和朱德、叶剑英在延安。



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扬在交谈。



1945年，毛泽东和林伯渠、吴玉章在延安。



1945年，毛泽东和黄华在延安。



1945年，毛泽东和张经武在延安观看文艺演出。

愚公移山^[1]

(1945年6月11日)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1]。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

[1] 愚公移山的故事，参见《列子·汤问》。原文是：“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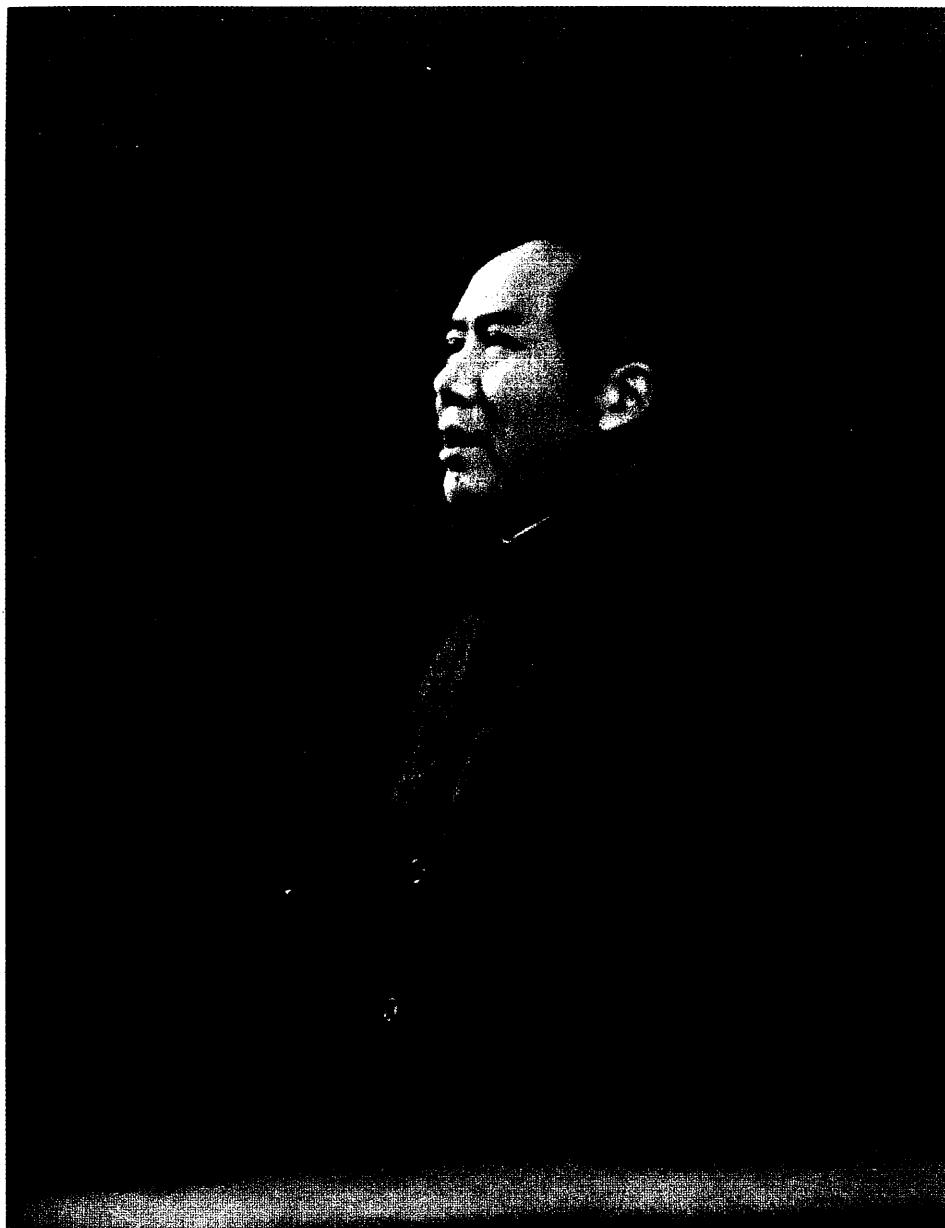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2]。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

[1] 赫尔利（1883—1963），美国共和党人。他在1944年11月底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1945年11月被迫宣布离职。1945年4月2日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中，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参见《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2]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7页）。

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中共不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1]

(1945年6月15日)

【新华社延安十六日电】新华社记者就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七月七日召集新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是否有人出席一项问题，询问中共中央负责人，承其答复如下：

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今年七月七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2]战胜日本侵略者；并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在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几次谈判之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至于恢复团结与建立联合政府之一些起码的条件，例如取消镇压人民的自由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答记者问，刊载于1945年6月17日《解放日报》。

[2]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的法令，取消特务，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承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撤退包围与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等项，不但一项也不愿实行，反而变本加厉，增强了破坏团结与破坏抗战的反动措施。（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仍和过去的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至今没有合法地位。即就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而论，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并非中共自己所推选。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在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国民党政府此种对待中共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而如果这样做，就将铸成大错，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就会爆发。很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根据上述各项理由，中共方面已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

王震王首道部的行动方针^[1]

(1945年6月15日)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2]：

此次作战^[3]虽有牺牲，亦有胜利，你们数月来在湘鄂边行动是有成绩的。惟王陵基^[4]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地小，已处被动。今后方针，不外（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如取第二项方针，又有（一）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二）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南进，留小部配合张体学^[5]创造湘鄂边区，等候张启龙文年生^[6]等。南进时之目的地又有两项：（一）以三个月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湘鄂赣军区司令员王震、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委书记兼新四军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王首道的电报。

[2] 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区委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5年6月6日至7日新四军湘鄂赣军区部队与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的战斗。

[4] 王陵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

[5] 张体学，当时任新四军湘鄂赣军区副司令员。

[6] 张启龙、文年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和第三支队司令员。

左右时间一直进至湘粤边，在赣州、韶州^[1]、梧州、桂林、衡州^[2]五点之间创造游击区及根据地，与广东部队靠拢打成一片，启龙、年生等亦以八个月左右时间进至同一地区，建立南方局面，并准备被隔断；（二）你们进至衡宝地区^[3]创立根据地，张启龙率九旅后续^[4]亦进至此区，而以文旅进至湘粤边与广东打通，亦须准备被隔断。以上各项方针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考虑电复，以便决定。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南洋战区由英国负责，美军不打广东，故日寇放弃南宁，缩短防线，巩固粤汉^[5]，并东攻三南^[6]、河源。美军由欧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望根据此种前途考虑见复。

军委

已删

[1] 韶州，旧府名，即今广东省韶关市。

[2] 衡州，旧府名，即今湖南省衡阳市。

[3] 衡宝地区，即今湖南衡阳、邵阳（旧为宝庆府治）地区。

[4] 指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1945年6月编为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南下。

[5] 粤汉，即粤汉路，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6] 三南，指江西南部虔南（即今全南）、龙南、定南三县。

（2）首道。
主攻方向：此次作战仍以南进为主，兼有侧翼，重点
用在湘江沿岸，行动迅速而猛烈。①先至陵墓集中
对齐，进而向左迂回，从小正变大纵队，分多路前进，不
外①乃在坝地里打；②向南发展。如取节
二项方针，又有①沿湘江右岸而进，兼有道自
湘江南部在坝地；②向南发展主力③(2)
(大多数)南进，部分小部配合沿岸等④(2)进湘
鄂边区⑤是保卢南进，与⑥(2)上崩之间南北以

故而能放棄南京，宣佈暫時滅華，中國更無立政
三處南河原軍向東撤退，須要時間。凡美決策，
當在明年夏初以後，我們尚有二至半年時間，
可以利用，茲此則將發生變化。

有兩項：(一)八三月份左右時間一直進至湘
贛並在韶州、梧州、桂林、衡陽等三省交界處
西線擴充至廣東、廣西等地，並向南部擴展
並打麻將破龍爭虎鬥以八九月份直至
同一地區，建立新局面。

並半島被隔斷；（二）直至衡寶地區創立廣東地。鴉片戰爭後，亦至此處，而以文廣、直至湘粵邊境，並直逼湖南、湖北，從而隔斷了以上各處的交通。究以何故？宜稱本門考慮，以便鑑定。固而整不形勢，有利因②利害，則更甚矣。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王震、王首道等电的手稿。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 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6月15日)

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我们拟发表谈话，举出三项理由，而以第三项为主，意思是说如果不开国民大会我们还可参加参政会。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讨论是否参加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 追悼大会上的演说

(1945年6月17日)

同志们：

今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延安人民的代表联合在这里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个战线上所牺牲的人。这些牺牲者，有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中间，有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有做各方面民众运动的同志，有做政权工作的同志，有做党务工作的同志，有做技术工作的同志，从很高职位的到火夫、马夫、战斗员、工人、农民都有。就是这样两部分人，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团结起来同我们的敌人斗争。就是这样两部分人组成的队伍，开头是不大的，后来慢慢发展，到现在是相当大了。开头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个方向，至于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确，那是在长期奋斗中得到的，是从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众的流血牺牲中得到的。这一次我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路线、纲领、政策。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少数个人的头脑里想出来的和发明的，而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奋斗的结果，取得了经验，才形

成我们现在七大的决议案和文件。

中国有两大敌人、两座大山压迫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另一座大山就是封建主义，外国的压迫和中国的压迫，压得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不能抬头，破坏了我们的生产力。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帝国主义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侵入中国。现在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打了八年，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就已经有十几年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敌。中国内部的反动派，实际上是跟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来压迫中国人民的。这些反动力量还很大，它们压迫全中国人民，束缚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其不能发展。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没有独立，那就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民主，那就还是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哪还有什么统一？在国民党里面有民主派，有反动派，现在掌权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派，他们所说的统一中国，就是要使中国继续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继续成为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家，不要独立，不要民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能解放。我们现在的抗战还没有胜利，还要努力，要团结全国人民做很大的努力，才能战胜我们的敌人。但首先阻碍我们团结起来的，就是国民党的反动派。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经过了好几个阶段

的。太平天国之前，有反对英国侵略的广东平英团，后头有太平天国革命，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带着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和民主主义的性质。这些运动的目标，在要求独立、要求民主这一点上跟我们是相同的。在这几十年的斗争中都还没有共产党，这些斗争是由别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因为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彻底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者毫不动摇地始终如一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国民党是发生了变化的，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是不同的，前者是奉行革命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后者是退步的走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也只有共产党才能不动摇，彻底地干下去，不怕死多少人，不怕牺牲。从一八四一年平英团在广东起义反对英帝国主义起，到现在一九四五年已经有一百零四年的历史了，在这一百零四年中，中国人被杀的有多少，被关的有多少，已计算不清了。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在二十四年里，单共产党人就死了几十万，革命民主主义者跟我们一道反对外国的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成百万地牺牲了。反动派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就采取杀人的办法，以为屠杀会使革命者退却，可以停止或缩小中国的革命运动。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一切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他们杀人越厉害，革命队伍发展就越大。我讲这是成正比例的，是一条规律，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反动派的希望和企图是他们杀人越多革命队伍就越小，但是希望和结果是两回事。

从国民党的历史上也可以证明上面所说的规律。清王朝和外国帝国主义曾经压迫国民党，是把国民党压迫小了还是大了呢？最后还不是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国民党拿帝国主义、

封建势力曾经用来对付他们的办法来对付中国人民，压迫共产党、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我说他们这就错了！他们的队伍开来得越多，他们自己就会变得越小，而我们的队伍就会越大。这是我们从几十年的历史中得出的一条结论。日本帝国主义杀了很多，难道它是越杀的多越大吗？希特勒也是杀了很多，难道他是越杀的多越大吗？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反动派，只要他们杀人越多，他们自己的力量就会越小，而革命的力量就会越大。

我们建设的党是东方的共产党，我们建设的队伍是东方人民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英勇奋斗的。想用杀人、压迫这一套来缩小我们，来消灭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几十万的共产党人、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起来继续战斗。拿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时期来说吧，头一个时期发展到五万多党员，一巴掌被打散了，剩下的很少；第二个时期我们发展到三十万党员，又被打散了很多，剩下的也是很少；到抗日战争中我们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至于军队，同志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没有红军，要说有就是明朝朱洪武^[1]起过一次“红军”，他们打的旗子是红旗。有的人以为红军这个名称一定是外国来的，我说不一定，你就只知道外国的事情，中国祖宗的事情就不知道。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屠杀人民，中国又产生了红军。这个红军是在先进政党领导下的，开头数目很小。我经常和一些同志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是古书《庄子》上讲

[1] 朱洪武，即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明朝的建立者。1352年参加郭子兴部起义军。起义军以红巾包头和红旗为号，故名红巾军，亦称红军或香军。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都南京，国号明，年号洪武。同年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统治。

的^[1]。“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中国革命力量现在“巨”了没有呢？在一八四一年，广东平英团的力量有好几万人，他们的口号是反对英国的侵略，但那时的人们没有料到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后代将来会怎么样。孙中山搞出一个辛亥革命，也没有料到有五四运动，没有料到又产生了共产党。我们的前人没有料到世界会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更没有料到中国会进步到有共产党领导的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队伍，同时他们也没有料到中国革命会这样长还没有胜利。他们那时在敌人压迫面前只是开始起来反抗，至于下文如何，我看是还没有考虑成熟。不像我们现在开七大这样，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我们的前人没有预料到这些，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那时还没有革命的社会科学、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我们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人，看清楚社会前途的人，我们比他们进步，我们要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八四一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平英团现在没有了，太平天国也没有了，义和团也没有了。但是平

[1] 参见《庄子·人间世》。

英团以后出了一个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以后出了一个义和团，义和团以后出了一个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出了一个共产党，因此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革命力量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可能被消灭，弄得不好就会被敌人消灭，被敌人屠杀，甚至可能几十万地被他们消灭，但是跟着却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我看见过这样的家庭，同志们一定也看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反动派杀掉了父亲，他的儿子，三个四个，甚至七个八个，还有女儿，统统加入共产党，统统跑到延安来了。所以，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队伍反而扩大了。

我们今天开大会，我们是有信心的。烈士们是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同志们，现在同死难烈士他们进行斗争的那个时期是不同了，在两年到三年内中国要起变化，或者变得很坏，或者变得很好，总之是要起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要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反动派又想要把我们打倒，把中国人民打倒，下决心要把中国一切人民的民主力量、革命力量统统消灭。那时或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全国就是黑暗的，延安也是黑暗的，中国像沉到大海里去了，每天都是夜晚不见太阳，黑暗得很，要再过上几十年恐怖日子。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样子，那就是把黑暗势力压下去，把拿刀子杀人的人压下去。中外新闻记者们去年来延安的时候，问了我一些问题，就包括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但如果谁拿刀子杀人，要来杀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对付。我曾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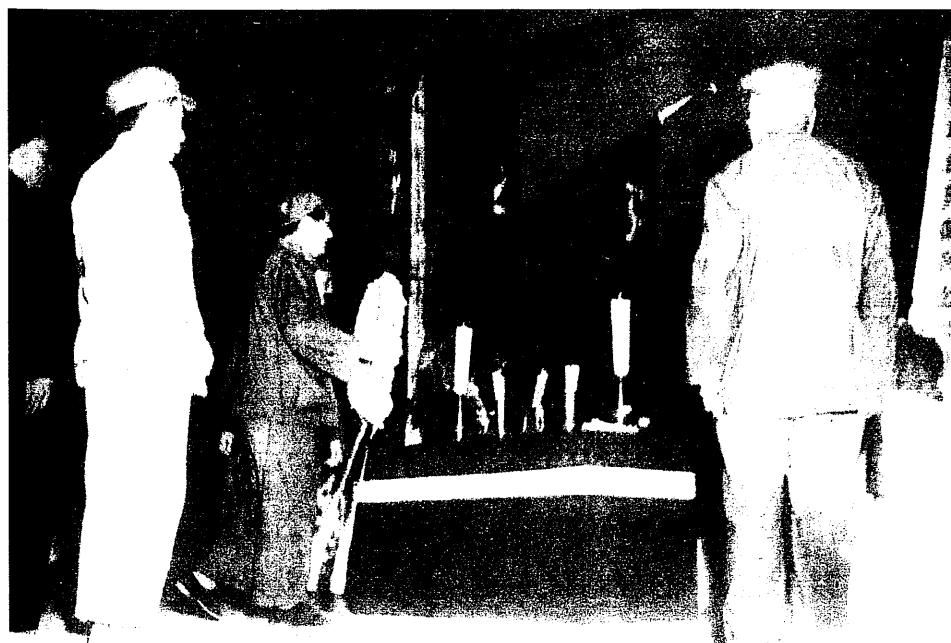
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同志们，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很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朋友，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同我们共产主义者需要更懂得团结，更懂得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懂得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就更能团结，人家就打不散我们。同志们要注意，将来是一定要打的，因为他们已经有准备了。现在，他们实际上是同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互相配合要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一切革命力量他们都想统统消灭。但是结果将像我在七大闭幕词中所讲的，革命一定要胜利，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来延安的美国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给你开一张支票，你回到美国去，将来再见面时还是这些人，因为中国是人民的。这是一种前途。中国是反动派的，这是又一种前途。现在美国政府赫尔利^[1]所实行的政策是反动的，是赞助中国反动派的。现在我们党有清醒的头脑，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一定能胜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这个光明的中国是烈士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成功就牺牲了，但是他们给了我们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开追悼大会纪念他们，革命也还没有成功，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成功。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变为人民的中国，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我们全党团结起来，解放区一千万的人民团结起来，沦陷区及其他区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团结起来，这个目的就一定能达到，不达到目的是不停止的！

[1] 赫尔利，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1945年6月17日，延安各界及中共七大代表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



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等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 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1945年6月17日)

百年以来，特别是自共产党成立后的二十四年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为了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前仆后继的斗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便是在这种伟大的斗争中牺牲了，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国的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的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起来继续革命，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中国今天的广大人民抗日民主运动，一千万人民的解放区，一百万的人民抗日军队，一百二十万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七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纲领，就是那些几百万的民主主义者与几十万的共产主义者先烈们的鲜血所创造的，就是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结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更懂得如何团结，如何奋斗了，中国一定是人民的，中国一定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一个独

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一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四年来，一切革命先烈们的志愿，一定要胜利地实现。

为中国革命死难烈士题写挽词

(1945年6月17日)

死难烈士万岁。

挽抗日烈士联^[1]

(1945年6月17日)

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
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

[1] 1945年6月17日，中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毛泽东代中共中央敬献的挽联。

欢迎七参政员来延安商谈国是的复电^[1]

(1945年6月18日)

褚慧僧、黄任之、冷御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已巧

[1]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人公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这是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

豫中、豫东日军占领区 较利于建立根据地^[1]

(1945年6月18日)

河南区委：

根据来电，伏牛山似非敌占区，胡宗南^[2]必用全力来争，我党在伏牛山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可能性似甚小，而比较利于建立根据地之豫中、豫东广大敌占区尚未开辟，因此请你们考虑根本部署问题究竟以何者为宜。大约日寇溃败国民党反攻仅有一年至一年半左右时间，我党如丧失这个时间则将难在河南立足。再则国民党对日寇采取避战政策，对我党取坚决作战政策，其战斗力决不可轻视。请根据这一形势考虑电复。对高树勋^[3]及其他杂牌部队必须争取其中立，对任何国民党部队必须坚守自卫立场。

中央

巳巧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河南区委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3]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新八军军长。

河南区党委：根据^急伏牛山附近敌情，南京方面用劲早，先在伏牛山建立翠园根据地的可能似甚小，而比较利於①建立根据地之点在于豫东广大地区尚未開闢，因此请你们考慮根據豫东問題究竟何以為宜。大约因这次失败国民党反攻策有一年半左右时间，如果如喪失这个时间则只能在河南立足。再则国民党对淮海人民政策，对共产党堅決作不政策，其战斗力决不可輕視。请根据立形势考慮電復。对烏梅熟及各地新辟即隊必须爭取其中立，对任何国民党部队必须堅守向隅立場。中央已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河南区党委电的手稿。

致王若飞电^[1]

(1945年6月18日)

复七参政员电^[2]请你抄送。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1] 这是毛泽东致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毛泽东和周恩来6月18日复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参政员的电报。电报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6月19日)

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这次国民大会开不开得成，蒋介石下决心的时候是在十一月。不开的好处是大家不合法；开的好处是蒋介石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

王明同志写信给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一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全会议程、中央分工、解放区代表会议决议。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南下部队^[1]应依据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

(1945年6月24日)

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

(一) 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二) 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有利的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

(三) 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紧迫，而在湘中衡、宝、潭、醴^[2]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

[1] 南下部队，指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和张启龙、文年生率领的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南下支队于1945年3月下旬占领湖南平江县，公开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2] 衡、宝、潭、醴，指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湘潭、醴陵。

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1]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这一方针和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但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四) 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文后续部队^[2]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在以三南^[3]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州、道州^[4]、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以永明^[5]、灌阳、恭城为中心之湘桂边区（如有敌伪军占据），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6]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唯一的直接的依靠是你们内部的团结，是你们自己的正确的军事政策与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如果你们在这些政策上犯了大错误，那便要接受失败的结果，这一点必须预计到，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

[1]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等抗日武装。

[2] 张，指张启龙（1900—1987），湖南浏阳人；文，指文年生（1906—1968），湖南岳阳人。他们率领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于1945年6月18日从延安出发南下。

[3] 三南，指江西南部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三县。

[4] 道州，今湖南省道县。

[5] 永明，今湖南省江永县。

[6] 五岭，是位于广西、湖南、广东、江西4省（区）边境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的总称。

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

(五) 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虚心，力戒骄傲，十分谨慎，力戒浮躁，十分团结，避免并逐步消除可能的意见分歧，在情况许可条件下实行委员会的民主讨论，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然后坚决执行之。

(六) 现在大局有利于我，只要党内能团结，不丧失时机，在政策上不犯大错误，我们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中央给你们的伟大任务的，希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中央

六月二十四日十六时

给各级党部的通知^[1]

(1945年6月26日)

一切七大文件，包括各种报告及党章，均须在报纸上发表，文件长的分段登载，或出特刊，使党员与党外人士均能阅读。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级党部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挽李公朴、闻一多联^[1]

(1945年6月27日)

继两公精神，再接再厉争民主；
汇万众悲愤，一心一德反独裁。

[1] 1945年6月27日，在延安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参加了大会并敬献挽联。这是毛泽东写的挽联。

复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电^[1]

(1945年6月30日)

三先生拟来延赐教，无任欢迎，何日命驾，乞示行期。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复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电的主要内容。

在延安各界欢迎全国慰劳总会 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

(1945年)

我们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我们要站定自己的立场，决不能与敌人的口号混同起来。我们的口号是要处处与敌人对立，决不能有丝毫与敌人混同，一切与敌人相同的言论都是助敌张目的滥调，任何人想要肩起敌人的口号而又言抗敌，那只是欺人之谈，残酷的历史将给予严厉的证明。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的谈话^[1]

(1945年7月2日)

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1] 1945年7月2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杨家岭会见褚辅成等6参政员，听取他们说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这是毛泽东和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会谈记录

(1945年7月4日)

来延安六人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

- 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
- 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之建议：

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与壮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战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出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

1. 公开的。
2. 平等的。
3. 自由的。

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像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三月一日蒋介石说：“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咨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既然如此，不知道我们的委员长为什么又向参政会“聆取”起“意见”来了。按照委员长的说法，中国境内是并无任何“可以咨询民意的负责团体”的，参政会不过是一个吃饭的“团体”而已，今天的“聆取”，于法无据。可是不管怎样，只要参政会说一声停开那个伪造的“国民”大会，就说违反了三月一日的圣旨，犯了王法，也算做了一回好事，积了一件功德。当然，今天来评论参政会，为时尚早，因为参政会究竟



1945年7月，毛泽东在机场欢迎国民参政会6位参政员到延安。



1945年7月，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到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5年7月，毛泽东和国民参政员在延安机场。



1945年7月，毛泽东、朱德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延安。



1945年7月，毛泽东出席迎接国民党参政会各民主党派参议员到延安访问的宴会。



1945年7月，毛泽东设宴招待参政人员。



1945年7月，毛泽东设宴招待参政人员。



《宴请》(中国画)

和黄炎培谈跳出周期律^[1]

(1945年7月4日)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 毛泽东请黄炎培等人到家里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延安考察感想，黄炎培坦率讲到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盛衰周期律，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这是毛泽东关于跳出周期律问题和黄炎培谈话的一部分。



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1]

(1945年7月5日)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做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1]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这是毛泽东写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王真先生
正月廿二日
至嘉定之次
游南湖。其水
甚清，岸之草木
亦佳。湖中之花
皆已谢，惟有
数株未落。予
甚爱之。故题
此幅以示君。
并录予近作
一首于后。
王真先生
正月廿二日
书于上海

毛泽东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的手稿。

评蒋介石七七演说*

(1945年7月8日)

空空洞洞，毫无内容，是昨天蒋介石讲演的特点。稍为异样的，是他忽然讲起“容忍”来了。但是，我们记得，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对他的将领曾经说过：“大家要拿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想快刀斩乱麻的办法，用快刀斩乱麻的人才来做事，本着硬干快干实干的精神来消灭土匪……你们既是我的部下……就要有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和能力，我做上官的一定要做快刀斩乱麻的上官，做部下的一定要做快刀斩乱麻的部下；我就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统帅，现在要找一般快刀斩乱麻的将领，我们现在总要勇敢进取轰轰烈烈地来干，要知道，革命就是那么一回事！”在那年蒋介石讲的不是“容忍”，而是八个“快刀斩乱麻”。到了昨天，蒋介石却讲了四个“容忍”，所以显得异样。但是，蒋介石真的对于中国人民忽然“容忍”起来了吗？事实是最好的证据。去年今日，蒋介石用来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六十余万。今年今日，这个数目增加到了将近一百万。现存的国民党全部军队，包括地方系在内，总共不过一百五十万左右，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用来包围与进攻解放区，这就是蒋介石的容忍。在蒋介石统治区，政治犯一个也不放，人民的自由一点也没有，特务如麻，贪污成阵，这就是蒋介石的容忍。对于吴开先、方先觉等日寇使者，则大批收容之，对于庞炳勋、孙殿英等叛

国将领，则大批放纵之，这就是蒋介石的容忍。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内广大党员的不满，也表露出来了。五月间开的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的六百多代表中，因为痛恨蒋介石的专横不法，竟有二百多人要求退党，就是明证。在昨天的讲演中，蒋介石还夸称他从前说的话如何灵验。可是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对请愿学生们说过：“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我蒋中正之头，以谢天下。”一九三四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精神讲话”时，他又说：“日本人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请问这些话是否也灵验了呢？蒋介石昨天又说什么“今后一年为收获战果的一年”。按照蒋介石及其一群的作法：一切依赖美国，那么中国人民在今后几年之内可以看到，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将被拖进实际上的殖民地地位，这将是一个确实的“战果”。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赫尔利之流与中国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分子蒋介石辈，结成了甜蜜的伙伴，大批的武器加黄金装备了蒋介石，据说是为打日本。但是明眼人早已看清楚了，其结果不会是别的，只会造成中国的内战。因为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赫尔利之流，拼命要保存蒋介石的独裁制度，把中国人民的民主力量看成眼中钉，这个反动政策如不改变，中国绝无不爆发内战之理。目前蒋介石一切军事布置的重心都是为了打内战，“容忍”二字仅仅是准备内战的词令。内战一起，蒋介石统治的中国，还能逃脱殖民地命运吗？不错，美国的这样一部分统治人物，除了保存蒋介石独裁制度、企图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以外，确实还要打倒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一点，我们和美国政府之间，并无异议。可是，六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实质上是一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我们希望一切善

良的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中的开明人物，充分地注意这一点，并迅速起来加以纠正。否则，美国人自己造成的后果，将不但对于中国人民是不利的，对于美国人民也是不利的。说到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可以说已达容忍的最高限度。直到现在，中国人民还同意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给蒋介石留下一个位置，其目的在于使他获得机会革面洗心，将功赎罪。但是，实在说来，蒋介石早已没有资格当一个全国性的领袖了。除了一小群中国人加上一小群外国人还要他之外，广大人民早就愿与蒋介石偕亡，叫他作“蒋该杀”了。虽然如此，中国人民还是愿意给他以革面洗心的机会，这就是一种极端的容忍态度。在中国只有这一种容忍是真的。蒋介石的所谓“容忍”，不过是准备内战的别名而已。中国人民应该提起警觉，反对外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勾结一起，制造反民族反民主反人民的内战，并用一切方法制止之。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与解放中国人民，这种警觉是决不可少的。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

(1945年7月10日)

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七月七日在重庆开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数二百九十名的参政员中，出席的仅有一百八十名。蒋介石在开幕时说了一通话。蒋介石说：“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可使诸君得以充分的讨论。政府准备以最诚恳坦白的态度，聆取诸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也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原来这位帝国主义者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的腰这才敢于在今年元旦的演说^[2]里稍稍硬了起来，至三月一日的演说^[3]而大硬，说是一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还政于民”。在蒋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2] 这是指1945年1月1日蒋介石的广播演说。他在这个演说里，对过去1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进攻面前的溃败一字不提，反而大肆诬蔑人民，反对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所拥护的关于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及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并且以准备召开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国民党御用的“国民大会”，作为反对人民的挡箭牌。

[3] 这是指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说。

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像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三月一日蒋介石说：“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咨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既然如此，不知道我们的委员长为什么又向参政会“聆取”起“意见”来了。按照委员长的说法，中国境内是并无任何“可以咨询民意的负责团体”的，参政会不过是一个吃饭的“团体”而已，今天的“聆取”，于法无据。可是不管怎样，只要参政会说一声停开那个伪造的“国民”大会，就说违反了三月一日的圣旨，犯了王法，也算做了一回好事，积了一件功德。当然，今天来评论参政会，为时尚早，因为参政会究竟

拿什么东西让委员长“聆取”，还要等几天才能看到。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自从中国人民群起反对之后，就是热心“君主立宪”的人们也替我们的君主担忧，劝他不要套上被称为猪仔国会的那条绞索，谨防袁世凯来找替死鬼。因此，我们的君主就此缩手，也未可知。然而我们的君主及其左右，是决不让人民轻易获得丝毫权力而使他们自己损失一根毫毛的。眼前的证据，就是这位君主将人民的合理批评，称之为“肆意攻击”。据说，“在战争状况之下，沦陷区域势必无法举行任何普遍的选举。因此，在两年以前，国民党中央全会乃有于战事结束一年以内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定。若干方面，当时曾肆意攻击”，以为迟了。及至他“鉴于战事的完全结束为时容或延长，即使战事结束后各地秩序亦未必能于短时期内恢复，所以主张在战局稳定之时即行召集国民大会”，不料那些人们又“肆意攻击”。这样一来，闹得我们的君主很不好办。但是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三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毛屎坑里去。就叫做“肆意攻击”也罢，任何这类的欺骗，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攻击掉，决不容许保留其一丝一毫。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是欺骗。有无国民大会是一件事，有无起码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可以暂时没有前者，不可以不立即实施后者。蒋介石及其一群，既然愿意“提早”“还政于民”，为什么不愿意“提早”实施若干起码的民主改革？国民党的先生们，当我写这

最后几行时，你们得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总算不是向你们“肆意攻击”，仅仅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也不应该吗？难道你们也可以置之不答吗？你们得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愿意“还政于民”，却不愿意实行民主改革呢？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

(1945年7月12日)

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坚持反动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从它在十八年前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内战为生活的；仅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中国本部这样的时机，才被迫暂时地放弃全国规模的内战。但从一九三九年起，局部的内战又在发动，并且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政府在其内部的动员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目前国民党政府一切军事布置的重心，并不是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向着中国解放区“收复失地”和消灭中国共产党方面。不论是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或是战后的和平建设，这种情况均须严重地估计到。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去世了，赫尔利得意忘形地回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一种必然的趋势，难道还看不清楚吗？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统一的不可阻止的势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勃兴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究竟是否改变和哪一天改变，今天我们还不能说什么。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开辟郑州许昌等地甚为必要^[1]

(1945年7月14日)

请刘邓^[2]商彭滕^[3]拟复。由冀鲁豫调得力人率大部西渡，负责开辟郑州、许昌、郾城与新黄河间广大地区，甚为必要。

毛

[1] 这是毛泽东在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余克勤等关于开辟河西的意见给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和副参谋长杨立三的电报上写的批语。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3] 彭滕，指彭德怀和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

入豫部队的作战方针

(1945年7月15日)

河南区党委：

(一) 我军入豫后，在对敌作战、发动群众与建立党政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你们的领导是正确的。

(二) 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占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1]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2]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准备一切条件，在一年之后对付胡宗南^[3]大举进攻。如果不能利用时间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此点必须预先想到。

(三) 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要希望中央及太行、太岳再给你们以军力、财力及干部之援助。向一切负责

[1]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河南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洪水阻止日军进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贾鲁河再流入颍河，在安徽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1940年，改道的黄河又分流入涡河、西淝河、芡河、北淝河，并分别注入淮河。黄河改道后流经的这些河道当时统称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修复，黄河复归故道。

[2] 指李先念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五师。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干部明确地说明上述任务，及依靠你们自己协同河南人民解决一切问题，不靠任何外援，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四) 完成上述任务，当然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必然会遇到种种内部的与外部的困难，对于此点你们应有充分的预见与精神准备，然后采取各项谨慎的坚决的适合情况的步骤，执行各项正确的军事政策，坚决发动群众的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展公私经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团结各部分军队、各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内部政策，以求逐步地克服内外困难。

(五) 你们应与晋冀鲁豫中央局（不日成立）及鄂豫皖区党委建立密切联络，将各种活动通知他们，同时告知我们。

中央
午删

河南回党。一、(一) 兵军入豫后，在对敌作战方面^{如对原国民党}，^三在党政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你们的成绩是正确的。^(二)你们今后作战方针，应是向西防豫，向南^①向南进攻(即移项区区防豫方针，对豫桂巴^②取直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行、^③东与淮河、^④新黄河、^⑤冀鲁豫部队，^⑥南与立脚部队^⑦完全打成一个整体，^⑧壮大人民解放军的主力^⑨。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⑩并用一切条件，在一年之后，对陕甘宁南大举进攻。如果^⑪

能利用时间完成上述任务，我军在河南就将^⑫失掉地位。^⑬三、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要希望中央及太行军委再给你们以^⑭兵力及军械之援助。向一方负责，^⑮豫鄂明確地说明，^⑯上至淮河及依靠你们自己协同河南人民解决一切问题，不靠任何外援，是必要的而有益的。(一)完成上述任务，虽然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⑰必然会遇到种种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对于这些，你们应有充分的预见和精神准备。

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的坚决的适合情况的步骤，执行各项正确的军事政策。坚决贯彻群众的政策，以^⑲诚恳诚意，^⑳尊重公私经济，^㉑革除不正的财政政策，团结各部，^㉒平息各部，^㉓特别是加强豫部的内部政策，以求逐步地克服对外国影响。(二)你们应布告冀鲁豫中央局(不日成立)及鄂豫皖区党委，建立密切联络，将各种活动通知他们，同时告知我们。中央手书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入豫部队的作战方针》的手稿。

在《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上 加写的一段话

(1945年7月19日)

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原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

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王震部会合

(1945年7月22日)

启龙、年生^[1]同志：

(一) 你们现达何处，在太岳、中条^[2]境内准备休息几天（应完全恢复疲劳），部队情绪如何，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如何？

(二) 渡汾战役虽有损失，但已胜利通过，此次经验对于以后行军作战将有帮助。

(三) 已令王震首道^[3]率部南开，直达粤北。在湖南中部不可久留，在此等地方不可能建立稳固根据地，日寇失败后蒋介石一定要用全力驱走我们，故应直往湘南粤北，依五岭^[4]建立永久根据地。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

[1] 启龙、年生，即张启龙、文年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和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

[2] 太岳，即太岳山，在山西省中部、汾河东岸，长200余公里。中条，即中条山，在山西省西南部，黄河和涑水河、沁河间，长约160公里，宽10至15公里。

[3] 王震，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首道，即王首道，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委员。

[4] 五岭，是位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4省边境的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

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阳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1]会合。

(四) 河南解放区新创，经济极端困难，你们到时应备价购买，不要当地供给。

(五) 你们电台应与王震首道台经常联络。

毛泽东
午养

[1] 二王，指王震、王首道。

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

(1945年7月22日)

王震、首道^[1]:

(一) 巧电悉。桃花山、金家坪^[2]在何处，沿途情况如何，估计多少时间到达五岭山脉？

(二) 日寇为对付盟军在山东登陆，由湘桂抽调五个师〔团〕北开，并非放弃华南。但为缩短防线，已放弃南宁、柳州、赣州等处，还可能放弃若干地点。但至少他要固守广州及整个粤汉路。吉安、袁州^[3]并未被占，商人所传不确。

(三) 三巨头在柏林开会^[4]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5]赴苏会谈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

[1] 王震，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首道，即王首道，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委员。

[2] 桃花山、金家坪，均位于湖南省平江县西南。

[3] 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县。

[4] 三巨头，指苏、美、英3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3国首脑（会议后期英国首脑为继任首相艾德礼）和外长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着重讨论战后对德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等问题。会议期间，中、美、英3国于7月26日发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5] 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

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四) 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醴衡宝^[1]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2]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五)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

(六) 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例如严重的敌情，打败仗，无饭吃，部队不但无扩大而且很大缩小，内部意见分歧，不团结等等。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
午养

[1] 浏醴衡宝，指湖南浏阳、醴陵、衡阳和宝庆（今邵阳）。

[2] 1943年12月2日，活动于广东东江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

评国民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1]

(1945年7月22日)

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新华社记者说：参政会决议的第二条也是极其含糊的，反动派很可以利用这一条。这一条说：“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各参政员提案，衡酌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尽使国民大会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这里所说的“政府”，是独裁派的政府，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独裁派的法律，现在写上了决议案，将来他们“衡酌”一番的结果，依然不外强迫人民承认十年前的那一批国大“代表”依然有效。独裁派也会“衡酌”“事实”，其结果不外加“选”或加派一批人。这样他们就会说：已经“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了。但是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事实”是十年前的所谓国大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评论稿时加写的文字。

代表，是由国民党一手伪造的，必须全部否定它；在敌人未完全消灭、国土未完全解放、人民无完全自由的全部时间内，不许可办理国大代表的选举。只有全部否定旧代表，并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下重新选举新代表，才能称之为“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我们完全赞成“极完满之代表性”这几个字。从今以后，谁要召开什么绝无代表性及代表性不完满的“国民”大会，必将受到坚决的反对。第三条：“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这一条表现了国民党独裁派的反动计划，依然坚持着。历来只唱“制颁”宪法、反对“实施”宪法的，现在他们唱起“即予实施”的好听的调子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举”大总统，仿效袁世凯做皇帝。今天中国的独裁派即帝制派很需要这一条，他们急于要以帝制（一名大总统）来镇压人民、发动内战，以维持其自己的反动统治。第四条列举了几项要求。“采取可能之政治步骤”，这一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第二项，保障人民自由，加了“合法”二字，第三项，承认各政治党派，加了“依法”二字，在独裁派看来，一切都好办了。第四项，“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竞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综合第四条各项，对于独裁派，并不会损失什么东西。仅有一点稍有意义，就是规定这些措施，应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做到，表示国民大会今年或者不会开。新华社记者结语说：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的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

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新华社记者说，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争取目前时间创立五岭根据地^[1]

(1945年7月22日)

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今邵阳）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军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一切困难有了充分精神准备，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1] 这是毛泽东致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1]

(1945年7月22日)

渡汾河战役虽有损失，但已胜利通过，此次经验对于以后行军将有帮助。已令王震、王首道率部南开，直达粤北。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阳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

[1] 这是毛泽东致张启龙、文年生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扩大反内战宣传 及建立云、贵、川农村据点的指示^[1]

(1945年7月22日)

徐、张^[2]:

蒋一切布置都是准备反共的，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要求：（一）望将延安反内战新闻在大后方设法传播。这些新闻的措辞将使中间派认为太尖锐，但日后将证明我们意见之正确性。（二）望用最大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不使我党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处于完全挨打与束手无策的地位，现在就应派人去领导贵州等处的民变。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二日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扩大反内战宣传及建立云、贵、川农村据点给徐冰、张明的指示电。

[2] 徐，指徐冰（1903—1972），河北南宫人；张，指张明，即刘少文（1905—1987），河南信阳人。他们均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7月23日)

胡宗南他们已经展开战役，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就是打爷台山。要准备他们大打大闹。大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如何打退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的进攻讲话的一部分。

爷台山战事扩大^[1]

(1945年7月25日)

【新华社延安二十五日电】关中息：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三十六军之暂五十九师外，增加了一个师。据我侦察员报告：增加上来的是从河南前线调来之十六军部队。据三十六军逃来我方之士兵说：他们有许多新式武器，是美国送来的，其中有一种叫火箭炮，你们要注意。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入，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兵，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所属的暂编第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突向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发起进攻，23日又以预备第三师加入进攻。毛泽东在写这条揭露蒋介石集团挑动内战的消息时，还加了副标题“蒋军使用美国的火箭炮”。

爺台山戰事擴大——
我軍擊退美軍的空襲
(新華社電稿) 告中廣，命公報
軍隊
爺台山戰事擴大
敵軍空襲也停止了。
⑤

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消息《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手稿。

坚决将入侵之胡军打出去^[1]

(1945年7月27日)

二十一日至今七天侵入边区之胡宗南部，计有第三十六军之暂十五师、暂五十九师和第十六军之预备第三师，战线长达百余里。我们决将入侵之胡军打出去。

[1] 这是毛泽东致徐冰、刘少文电的主要内容。

致福斯特电

(1945年7月29日)

福斯特同志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1]，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1] 白劳德（1891—1973），曾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共产党内以白劳德为代表的右倾思想，曾经形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并于1944年4月出版了作为他的纲领性的著作《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白劳德“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保持着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特点”，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益”，主张保护托拉斯制度，经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危机。白劳德于1944年5月，主持解散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美国共产党，而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的这一错误路线一开始就遭到以福斯特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员的反对。1945年6月，在福斯特领导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通过了批判白劳德路线的决议。同年7月，又举行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重建美国共产党。白劳德后来仍然坚持其错误主张，公开拥护杜鲁门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并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因此在1946年2月被开除出党。

路线（这条路线充分表现于白劳德所著《德黑兰》一书中），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

关于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电报

(1945年7月30日)

徐、张^[1]:

(一) 美大使馆前曾劝告我们不要批评蒋介石，这一点现在他们不说了，却来劝告我们不要批评赫尔利^[2]。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去年曾激烈批评蒋介石，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来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以上意见，请向有关方面给予解释。

(二) 给美共福斯特电^[3]，除在《新华日报》发表（可去掉国民党三字）外，请翻成英文用快邮发寄美共。

毛泽东
午三十

[1] 徐，指徐冰（1903—1972），河北南宫人；张，指张明，即刘少文（1905—1987），河南信阳人。他们均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2] 赫尔利，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3] 即《致福斯特电》。

批转太行区党委关于 检讨统一领导问题的报告^[1]

(1945年7月30日)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转发各区委仿照办理。

毛
午三十

[1] 这是毛泽东在批转报告上的批语。太行区党委在报告中称：“（一）在上下级关系上，重要的有两个：认为历来军队欺压地方，地方上许多意见未能伸张。区党委患“软骨病”，不与撑腰。认为过去自我批评与批评风气不开展，党内干部不敢大胆活跃，上级即使有检讨，一则提不到思想观点上，二则又不敢公开揭露，开展群众性的检讨与批评，对下面呼声不注意。（二）在同级关系上，重要的反映是：党委会如何领导部队、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如何成为党委一个部门，有的嫌地委会讨论问题多，有的嫌讨论少，地方说军队不服从决议，军队说地方强调人民困难，不解决实际问题。其次是军队兼书记的，不懂如何领导党委会，有首长作风，书记兼政委的，是不懂如何做政委，成为形式，引起不尊重。”

胡军侵占边区问题及我军对策^[1]

(1945年7月30日)

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将上述情况在报上公布，并向各方交涉。

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

[1] 这是毛泽东致徐冰、刘少文电的主要内容。

对留守兵团工作的分析^[1]

(1945年7月)

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是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是有缺点错误，但性质是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给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高干会前后调动了许多留守兵团干部的工作，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方法上是不对的。

[1] 毛泽东在枣园和萧劲光就留守兵团的工作进行了一番长谈。这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1945年，摄影师吴印咸在为毛泽东照相。



1945年，毛泽东和苏联、美国医生在一起。

准备应付必然到来的内战局面

(1945年8月4日)

郑、李、陈^[1]:

午马电未支收阅。你们已估计到将来问题是很对的。

(一) 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至临事张皇，遭受挫折。

(二) 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你们应有几个根据地，其中鄂东、鄂南、鄂西、襄北，可就现根据地逐步发展之，大别、桐柏两处，现亦有相当基础，将来可集中主力夺取其一部或大部，作为主要根据地，而以其他各处为卫星。目前极力发展豫南力量，迅速与王、戴^[2]打成一片，甚为必要。是否可将师部及区党委移至豫南，请加考虑。

[1] 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少敏，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

[2] 王，指王树声；戴，指戴季英，当时分别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三) 加强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加强军训，加强财经工作及准备干部，此五项，望在扩大大会上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此五项中，有几项是你们不甚擅长的，应加强调。军队不只是打仗一项任务，还有做群众工作及从事生产自给两项任务。这个问题，你们必须着重解决。军队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亦须于军训中很好解决。不是缺少做地方工作干部问题，而是军队帮助地方做群众工作一项任务强调不足之故，对此加以强调，转变军队作风，地方工作干部就会多起来。

(四) 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中央
未支

准备与王震王首道部会合 开创湘粤边根据地^[1]

(1945年8月4日)

广东区党委：

午陷电^[2]悉。

(一) 王震、王首道^[3]率三千人七月从鄂南出发，现到湘潭衡山间，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4]率六千人现到河南，四个月内可到湘粤边。

(二) 你们应立即加强北江^[5]及小北江各部之兵力及领导，并从东纵^[6]派出一有力支队由一个得力同志率领附电台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三) 现到广宁四会间并向怀集、连县、连山、阳山地区推进之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区委的电报。

[2] 指1945年7月30日中共广东区委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广东解放区现状的电报。

[3] 王震、王首道，当时分别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文年生，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张启龙，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5] 北江，珠江北支，在广东北部，到三水与西江相通。

[6] 东纵，指东江纵队。

珠江纵队^[1]主力，与你们有无电台联络，领导人是谁，兵力多少，该地区敌顽分布情形，均望即告。这一地区（小北江）极端重要，你们对之应加强领导。

（四）盟军登陆日寇北撤后，你们所处平原地区将处于极端困难地位，目前即应充分考虑此种情况，在精神上与部署上作周密而适当的准备。整个广东力量应就各部现在活动地区及其附近，选择适当地点，深入群众工作，训练干部，准备将来长期奋斗，方不至临时张皇失措，遭受挫折。这些地区为小北江地区、乐昌地区、南始地区、北江地区、东江地区、珠江地区、西江地区、中路地区^[2]、高雷钦廉^[3]地区、琼崖地区、潮汕地区等。每区均应有主力军、游击队、民兵之组织，极力和民众打成一片，坚决减租减息，解除民生痛苦，准备长期奋斗，不怕内战，对国民党绝不让步。每区均应有电台联络并多备无线电器材。上述各区中应有一区为中心根据地，作为建立广东军区机构及区党委所在地。此区以在何处为宜，望考虑电告。

（五）中央除给你们干部二百人（由伍晋南^[4]率领随文年生部队南下）及派王震等至湘粤边建立根据地和你们配合作战外，一切依靠你们及各区同志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独立奋斗，发扬创造力，

[1] 珠江纵队，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1945年1月，由珠江指挥部所属武装改编成立，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任。

[2] 中路地区，指广东台山、鹤山、开平、新会、恩平、高明、新兴、阳江、阳春等县。

[3] 高雷钦廉，指高州、雷州、钦州、廉州，均为旧府名，今分别为广东高州县、海康县和广西钦州市、合浦县驻地。

[4] 伍晋南，参加南下支队前，曾任陕甘宁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副主任。

绝对不要依赖外援，即王震部亦是配合作用，不可存依赖心理。

（六）你们必须将上述方针在半年内部署完毕。尤其注重精神准备，要有不怕一切困难之精神。

中央

未支



1945年，毛泽东和林彪在延安。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复王震、王首道电^[1]

(1945年8月4日)

已达湘潭南部，行军顺利，甚为欣慰。今后南进究竟走何路，由你们根据情况决定，总以出敌不意，走“之”字路，如你们最近二十余天所取办法为有利。

[1] 这是毛泽东复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中央关于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条件 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

(1945年8月6日)

山东分局：

美军登陆期近，国民党必用全力争夺山东。我为准备条件，以利在美军登陆后获得迅速发展，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力量起见，你们应注意：（一）训练军队；（二）训练干部；（三）加强武工队；（四）加强群众工作（彻底减租，但防止过左）；（五）尽可能彻底消灭顽伪；（六）加强城市工作（可能被我夺取之城市及要道）。如你们能在半年内加强这些条件，一遇美军登陆，敌军集中对美，我党即可乘机发展，控制广大地区，而不怕国民党的争夺，否则我党将处于不利地位。上述任务，在冀鲁豫及华中是相同的。山东及华中的某些沿海地区，敌将于美军登陆前加强对我的扫荡，自应加以注意。

中央
未鱼

并告冀鲁豫及华中局。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6日，系毛泽东起草本文日期，正式发出日期为8月10日。

山东分局：美军登陆期间，国民党必用全力争夺山东。我华东得条件，以利在美军登陆后取得迅速进展，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力量基础，你们应注意：（一）川陕军政；（二）川陕苏区；（三）加强武工队；（四）加强群众工作（反奸除奸、但防上过左），（五）适时解放青岛、烟台；（六）加强城市建设（不能被敌占领之城市及交通）。如你们能在半年内加强这些条件，一旦美军登陆，敌军集中对美，我华东可乘机发展，控制广大地区，而不怕国民党称霸华东，否则你将陷于不利地位。上述任务，在冀鲁豫及华东是相同的。山东及华东中的某些沿海地区，敌将对美登陆加集对华东扰局，自应加以注意。中央未鱼，亟告冀鲁豫及华东局。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分局的指示的手稿。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

(1945年8月9日)

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

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增 張

新華日報

蘇聯今日對日宣戰

莫洛託夫昨天正式發表聲明

蘇聯已參加中美英三國宣言

（中央社華人日報電）蘇聯新任外長莫洛託夫九日起與日本
進入戰爭狀態。蘇聯外長莫洛託夫昨日在大場兒（大前原）大使館，拜
見下列署名：同盟國蘇聯駐日本大使鮑羅申、內閣總理東條英機和對日本
之侵略作戰、以期擊潰敵軍、減少生靈之犧牲、極力迅速恢復全國
和平。蘇聯政府實行其對德國之責任起見，乃接受同盟國之生存
，並已參照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蘇聯之宣言。蘇聯政府發電是項說
明，以資本主權，乃早日實現和平，使人民有可打仗的機會並中止
再戰，並將日本人民聯合一項機會，作無條件投降，以免蘇聯所受
之侵略者被擊敗。蘇聯政府有此，蘇聯自明日即八月九日起，繼續
第幾為本身與日本人民聯合抗敵，中國大使傅漢蒼，通知他們以為蘇聯
見英大使卡特，英大使哈爾頓，中國大使傅漢蒼，通知他們以為蘇聯
日本大使佐藤，印西總領事大佐馬立克，將以蘇聯政府之聲明，送達東京日本政府。日本大使佐藤已允以政
府之聲明，即送日本政府。

（中央社華人日報電）蘇聯新任外長莫洛託夫已於表哥伊凡諾夫之宣佈，莫氏已接見日本
大使佐藤，並交換蘇聯對日本之聲明。

日九月八日六時十三
隨報附送
不另加價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图为当时《新华日报》刊发的号外。

劉日戰爭進入最後階段

毛澤東同士元帥將以全力致電斯大林元帥將以全力

配合紅軍及盟軍作戰。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關於蘇聯對日宣戰所引起的變化，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聲，加強民兵工作，加強京杭的紀律，堅持各界人民表示熱烈的歡迎。由於蘇聯這一行動，對日戰爭的時間將大大縮短。對日戰爭已處在最後的一插曲。凡此一切，都是為着加強對敵人的防衛，最後地擊潰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勝利進攻。全國人民必須注意制止內戰危險，努力促進已經到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成民主的聯合政府之建立。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已經到來了，全國人民應該加強團結，為抗日力抗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宏効而有效地聯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敵人，採取最猛烈而鬥爭。

斯大林元帥：

我們代表中國人民，對蘇聯政府的對日宣戰，表示熱烈的歡迎。中國解放區的一萬萬人民及八路軍，將以全力配合紅軍及其他同盟國軍隊消滅萬惡的日本侵略者。

新四軍的鞏固工作仍應注意。今冬明春，應在現有一萬萬人民及一切新解放的人民中普遍地實

一九三五年八月九日
朱德

《解放日報》关于毛泽东发表声明的报道。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广泛的进攻。图为八路军收复山海关。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致斯大林电^[1]

(1945年8月9日)

斯大林元帅：

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为欢迎苏联对日宣战给斯大林的电报。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8月9日)

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防御的问题在解放区一般地是不存在了，只有局部还有敌人的“扫荡”，因此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制止的，中间是蒋，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了地方，扩大了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大城市内中央

[1]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会议通过分别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的讨论意见修改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讲话的一部分。

管。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争取一切条件准备对付内战^[1]

(1945年8月10日)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并告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郑位三，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书记。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陈少敏，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副书记。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1]

(1945年8月11日)

一、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2]。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二、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

(甲) 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在此阶段内，陕甘宁、晋绥、太岳、河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对日作战的中、美、英、苏4国政府，要求投降。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4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南、湖北、皖中、浙西、湘粤等地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其余均用于解决敌伪。某些有特殊情況的地方，中央已另发个别指示。

(乙) 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1]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三、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兵力使用与干部使用应有重心，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攻破据点、占领城市应有统一的指挥与严格的纪律。迅速训练干部，迅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五、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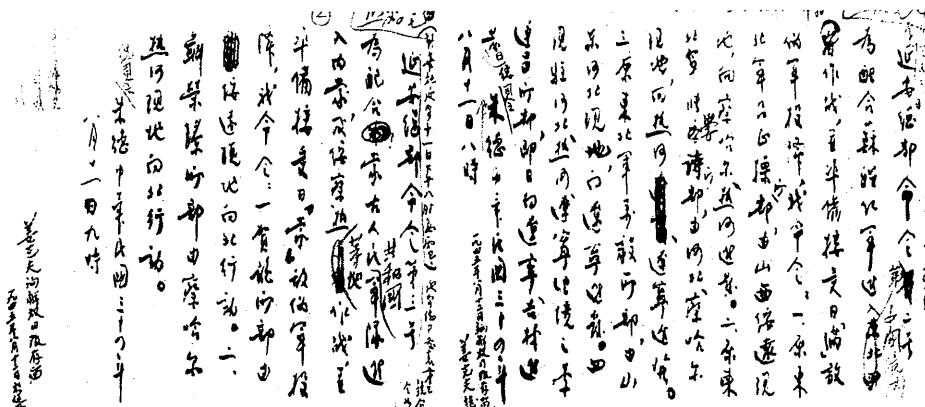
六、今冬明春，必须在一千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

[1] 绥，指绥远，即绥远省，1954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

七、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八、望各地本此方针，参酌地方情况，考虑执行之。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八路军总部连发7道反攻命令。图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朱德发布的第二号、第三号反攻命令。

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1]

(1945年8月11日)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八路军游击第一支队（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华中准备对付内战的部署^[1]

(1945年8月12日)

华中局：

真电^[2]悉。在国共力量对比下，华中部署改变如下：（一）江南^[3]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内战失利时准备转到浙南。（二）江南在内战胜利（打几个大胜仗）后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此种可能很大。但如在内战中失利，不可能在现地坚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

[2] 指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集中兵力占领南京，彻底消灭苏中地区伪军的部署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1）由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占领南京，并准备迎击来犯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部队。（2）由新四军第七师抽3个团南渡长江夺取芜湖。（3）以新四军苏浙军区浙东部队主力控制上海、杭州段铁路线，阻止国民党顽军进占上海，并以浦东部队开入上海。（4）对上海、杭州2城，除派去部分主力部队外，主要采取发动群众的方式夺占之。（5）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控制浦口，第八旅协同苏浙军区等部彻底解决苏中一带伪军，第十旅协助地方收复淮阴、涟水，并向淮北机动。（6）以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夺取徐州以南至浦口段铁路线。电报还建议由八路军担任收复徐州的任务。

[3] 指位于长江以南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未到职）。

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此点使少数领导人作精神准备，决不退回江北，或在内战发生后，先派小部开入闽浙赣起钳制作用。（三）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1]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2]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中央
十二日

[1]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2] 李品仙、何柱国，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

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城市^[1]

(1945年8月12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

依据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确定我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如下：（一）太原（含）以北之同蒲路，（二）归绥^[2]（含）以东之平绥路^[3]，（三）北宁路^[4]，（四）正太路^[5]，（五）道清路^[6]，（六）白晋路^[7]，（七）德石路，（八）郑州以北之平汉路^[8]，（九）郑州以东之陇海路，（十）津浦路^[9]，（十一）胶济路（美军如在青岛登陆，将占去其东段），以上应力争占领之。平绥路西端（包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的电报。

[2]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3] 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4] 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5]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6] 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清化镇的铁路。

[7] 白晋路，指当时山西祁县的白圭至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

[8]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9]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乡村，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之进攻。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
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

中央
八月十二日

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 迎接外蒙军及红军^[1]

(1945年8月12日)

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2]，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绥、晋察冀两分局电的部分内容。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他率领自五原东进部队中的4个军，在占领归绥后继续向张家口东进。

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1]

(1945年8月12日)

万毅东北军^[2]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山东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2] 万毅，原东北军第一一一师旅长，中共秘密党员。后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军，接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领导，万毅任第一一一师师长。1943年第一一一师改称滨海支队。万毅当时任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队长。

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1]

(1945年8月12日)

鄂豫皖中央局成立后，河南区党委受鄂豫皖中央局之领导。

[1] 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10月30日改称为中原局），郑位三为代理书记。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的部分内容。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

(1945年8月13日)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和还是一个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败的斗争，就是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容，这个历史时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再撕毁和平的协议，发动了空前的反革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人民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只经历了4年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打下去了^[1]。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2]，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3]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

[1]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0日，蒙古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从海陆两方面，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迅速击溃了日本的关东军。苏蒙联军越过内蒙古沙漠，进入热河和察哈尔。日本政府被迫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东军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主力，是日本的战略总预备队。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妄图依靠这支军队，凭借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有利战略地位，进行长期的战争。苏联的参战，使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日本政府才不得不承认失败，接受投降。

[2] 关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3次反共高潮的经过，参见《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3] 这里所说的“山”，即峨眉山，实际上是泛指中国西南、西北部的山区。自1938年武汉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挥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就躲在这些山区里，坐观解放区军民在敌后同日本侵略者作艰苦的斗争。

在山上，他在水边^[1]；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2]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那末，“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1] 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多数建立在山区。当时，蒋介石的统治中心是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所以毛泽东说一在“山上”，一在“水边”。

[2] 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军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大后方”。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1]。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

[1] 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所部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突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发起攻击。随后又以预备第三师和暂编第十五师加入进攻。边区部队于7月27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41个村庄。国民党军占领上述地区后，继续向边区腹地进犯。边区部队于8月8日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自卫反击，收复了爷台山地区。

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在皖南事变以后，有一次，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问我们的动向如何。我说，你天天在延安还不清楚？“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1]。那时候还没有提出蒋介石的名字，只提何应钦。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贏。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

[1] 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派到延安做联络工作的人员。“何”，指何应钦。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8日，蒋介石曾经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先后发出“皓”“齐”两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即制造了袭击新四军北移部队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在这里指何应钦为发动反共高潮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实际上就是指蒋介石。

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1]。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1] 参见《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1]，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靠得住落在人民手里的有没有呢？有的，河北、察哈尔、热河^[2]、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乡村和乡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块，七八十个城市一块，四五十个城市一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什么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是靠得住的，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这批胜利果实。得到了这批果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历史上，我们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3]，但是还没有中等城市。二十一个小城市联在

[1] 白晋，指当时山西省东南部由祁县的白圭到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

[2] 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1952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热河，原来也是一个省，1955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3] 这里所说的21个县城，是指江西省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省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

一起，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五十万人口。依靠着这些，中国人民就能奋斗那样久的时间，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粉碎那样大的“围剿”。后来我们打输了，这不能怪蒋介石，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就有了三四五六块大于江西中央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很可观了。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

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1]。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

[1] 保安是当时陕西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即现在的志丹县。中共中央从1936年7月初至1937年1月上旬驻在保安，以后迁往延安。

我不干了。”^[1]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2]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

[1] 这里说的土围子，是指保安县西南的旦八寨。该寨有200余户人家，地形极为险要。当地地主豪绅兼民团团总曹俊章率反动武装百余人，长期盘踞该寨。红军多次围攻未能打下。1936年8月，红军一面用地方武装围困，一面争取寨内基本群众，瓦解寨内敌军。同年12月，曹俊章率少数人员逃跑，旦八寨获得解放。

[2] 参见明末清初人朱柏庐所著《治家格言》。

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1]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2]。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

[1] 这里所说的“美国人”，是指美军在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这个观察组是当时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队在1944年取得中国共产党同意后派往延安的。

[2]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美国和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就此大肆宣传，说什么日本政府所以投降，是因为害怕美国原子弹的缘故。他们想用这种宣传来贬低苏联参战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1]。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1] 蒙巴顿（1900—1979），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1945年8月9日，他发表谈话，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说：“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部分）。



1945年，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研究作战方针。



《毛主席对弈图》(中国画)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1]

(1945年8月13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2]，是一种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2] 1945年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本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全文如下：“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接着，在8月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6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内蒙古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解放区的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这些命令，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1]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难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难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2]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3]）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

[1] 指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3国在波茨坦会议过程中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的公告。其主要内容为：盟军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肃清；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的军事工业必须拆除；日本的战犯必须交付审判；开罗宣言必须实施，即日本必须放弃前所掠取的土地，如朝鲜，中国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地，日本的领土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其他小岛之内；同盟国军队占领日本直到日本民主政府建立以后为止。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亦签字于该公告。

[2] “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3] 戴笠系特务，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戴笠为首的特务系统。“军统”成立于1938年8月，其前身是1932年4月成立的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军统”是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之一，它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破坏人民革命，同时也对国民党军队、警察及行政机关等进行监视和控制。

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他们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正是坚决地执行波茨坦公告第二项的规定：“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而蒋介石的所谓“命令”，正是违反了他自己签字的波茨坦公告。只要拿这一比，就知道谁是不“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了。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其实，国民党反动派是蠢得可怜的。他们找了朱德总司令命令敌伪投降缴械当作借口。这难道也算得一个聪明的借口吗？不，这样来找借口，只足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伪看得比同胞还可亲些，把同胞看得比敌伪还可恨些。淳化事件^[1]，明明是胡宗南军队攻入陕甘宁边区，挑拨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却说是中共的“谣言攻势”。淳化事件这个借口，好容易被国民党反动派找着了，却被中外舆论界一下子识破，于是又说八路军、新四军不该要敌伪缴枪了。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受尽了蒋介石和日本人夹击围攻的苦楚，现在抗战瞬将结束，蒋介石又在暗示日本人（加上他亲爱的伪军），叫他们不要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枪，说是只能缴给我蒋介石。蒋介石剩下一句话没有说，这一句就是：好使我拿了这些枪杀共产党，并破坏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不是吗？叫日本人缴枪给蒋介石，叫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以宁渝合

[1] 淳化事件，即1945年7月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等地的事件。

流^[1]、蒋伪合作，去代替“中日提携”、日伪合作；以蒋介石的反共建国，去代替日本人、汪精卫的反共建国。这难道还不是违背波茨坦公告吗？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究竟谁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多以上的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

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1] “宁”指当时南京汉奸集团的伪政权，“渝”指当时重庆的蒋介石政权。“宁渝合流”，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方面以及重庆蒋介石方面共同策动的一个政治阴谋。

在战役上须占绝对优势不可浪打^[1]

(1945年8月13日)

华中局：

十二日电^[2]悉。同意你们集中主力打李品仙何柱国^[3]，只以若干可能的力量协助八路夺取陇海^[4]与徐州。在打李、何时，不可浪打，不可打得过早，致打成对峙，或仅击溃之。必须有充分兵力，在战役上占绝对优势，并有充分动员准备，待敌进至有利于我之地点，以包围歼灭其一路，再打其余。

中央

十三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

[2] 指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集中新四军第二、第三和第四师全部主力，同国民党军第十战区李品仙、何柱国部在津浦路西作战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3] 李品仙、何柱国，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

[4] 陇海，这里指陇海铁路的连云港至徐州段。

河南部队目前的任务^[1]

(1945年8月13日)

河南区党委，文、张^[2]，并告郑、李^[3]：

同意文张建议，在河南收复失地，归王、戴^[4]统一指挥。整个河南部队任务，除韩钧^[5]部在原地区发动群众坚持外，其余应展开行动，东与水东^[6]联系，南与五师联系，将嵩山^[7]、水东、五师迅速打成一片。目前作战仍是着重于歼灭伪顽薄弱部，广占乡村与中小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河南区委等的电报。

[2] 文、张，指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和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3] 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代理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政治委员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4]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 韩钧，当时任八路军河南军区第二支队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6] 水东，指1938年黄河改道后陇海铁路以南、新黄河以东的河南省东部地区。中国共产党曾在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的水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水东军分区。1945年1月，水东军分区改为冀鲁豫军区第十二军分区。

[7] 嵩山，位于河南登封县北部。当时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在这一带活动，并成立河南军区第一军分区，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治委员。

城镇，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包围大城及要道，设法劝令敌伪投降。具体部署望告。冀鲁豫已派一万二千人南下至水东，连水东原有八千人共二万人，为夺取新乡、开封及其附近广大地区而斗争，望你们速与他们配合行动。

中央军委

十三日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

(1945年8月)

八月十三日的电报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

[1] 这两个电报是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并且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写第一个电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第二个电报里，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6项主张。为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两篇评论，即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这种决不被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的坚定的果断的立场，使解放区和解放军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并且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八月十六日的电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二亿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解放了过一千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个省区内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1]，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亿六千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虽受尽了敌伪和你的军队两方面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他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你和你的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纷争，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都被你和你的政府所拒绝。凡此一切，我们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和你的政府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并且于八月十一日下了一个非常无理的命令给我，又命令你的军队以收缴敌人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凡此种种，使得我们不得不向你和你的政府提出下列的要求：

[1] 19个大块的解放区，指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

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1]，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我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给中国解放区军队，叫他们努力进击敌军，并准备接受敌人投降。八月十五日，我已下令给敌军统帅冈村宁次^[2]，叫他率部投降，但这只限于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干涉其他区域。我的这些命令，我认为是非常合理、非常符合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五、请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

[1]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4国请降。11日，4国政府复文规定，“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必须“停止积极活动，缴出武器”。

[2] 冈村宁次当时是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此外，我在八月十三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你，回答你在八月十一日给我的命令，谅你已经收到了。我这里重复声言，你那个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打敌人了。但是不但在八月十一日，就是在今天（八月十六日），日本政府还只在口头上宣布投降，并没有在事实上投降，投降协定尚未签字，投降事实尚未发生。我的这个意见，和英美苏各同盟国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就在你下命令给我的那一天（八月十一日），缅甸前线英军当局宣布：“对日战争仍在进行中。”美军统帅尼米兹^[1]宣布：“不仅战争状态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毁灭结果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苏联远东红军宣布：“敌人必须粉碎，不要留情。”八月十五日，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作了下列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日本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发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

[1] 尼米兹（1885—1966），美国海军上将。当时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兼太平洋战区总司令。

军队停止敌对行为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上述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由此看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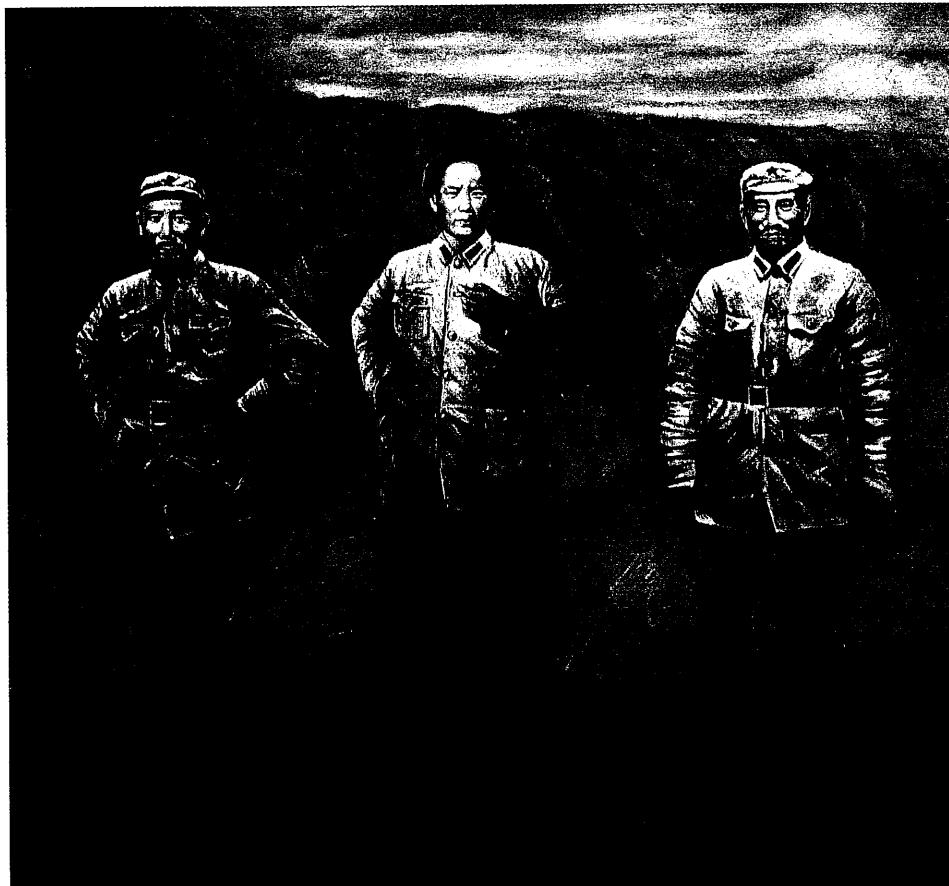
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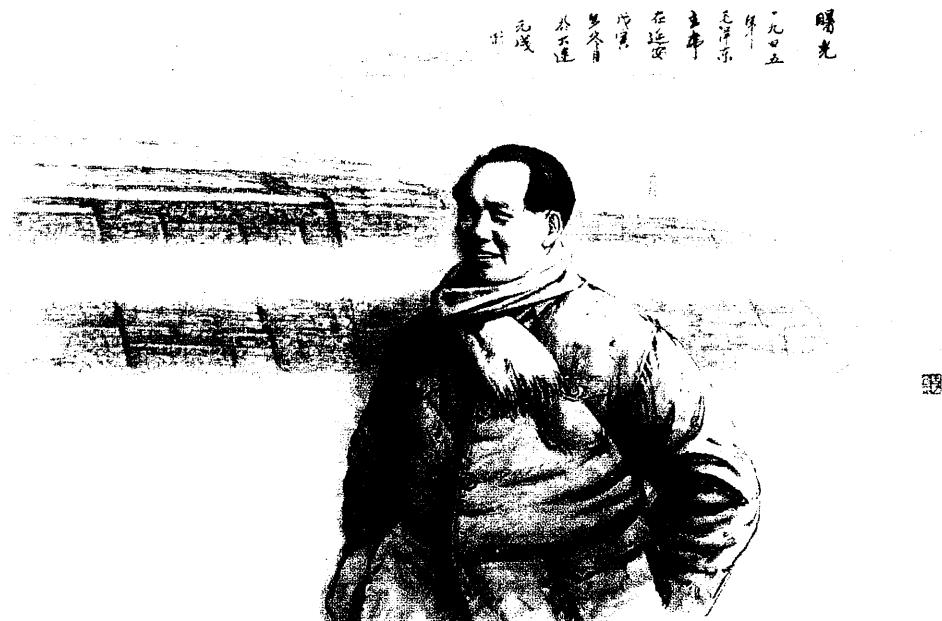
《延安曙光》（宣传画）



《延安的曙光》(油画)



《曙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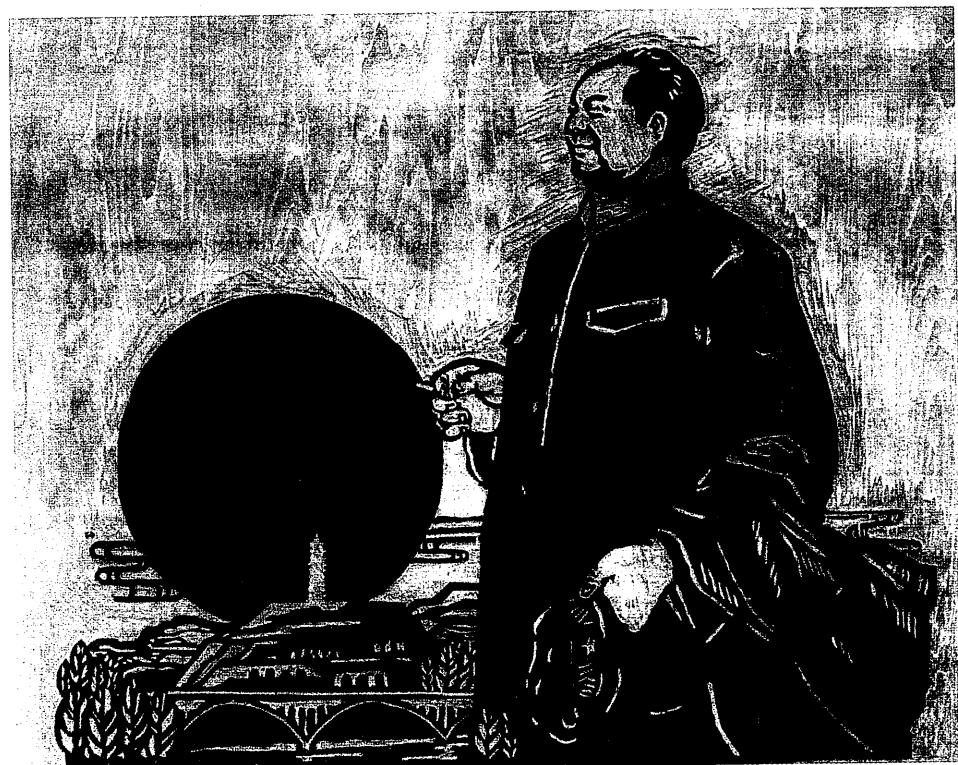
《曙光——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画)



《东方欲晓》(中国画)



《东方欲晓》（油画）



《延安红日升》(木刻版画)

广占乡村不打大城市

(1945年8月15日)

文、张^[1]，并告王、戴，郑、李^[2]：

(一) 你们可恢复原番号。(二) 工作地区在郑州、五师、水东间，不是打大城市而是广占乡村。(三) 孙连仲^[3]十一战区军开始东进，抢郑、洛^[4]、许昌线，你们及王戴均须在东面展开，俟顽军确占郑、洛、许线后方空虚之时，再西进至陕豫边，吸引顽军不能东进。(四) 派赴洪湖之一个营仍须南进。(五) 三十八军^[5]尚未与中央取得联络，他们能否经得起严重局面，留豫去晋何者有利，望征

[1] 文、张，指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和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2]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代理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政治委员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3]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4] 洛，指河南洛阳。

[5] 指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该军原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受中共影响较深，在抗日战争中一直与中共保持统一战线关系，坚持对日作战，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1945年7月和1946年5月该军所属第十七、第五十五师先后在河南起义，1946年9月正式改编组建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周，政治委员汪锋。

询电告。(六) 赴粤干部二百除化装南行者外，集中太行，准备绕道南进。

毛泽东

未删

关于警察问题致华中局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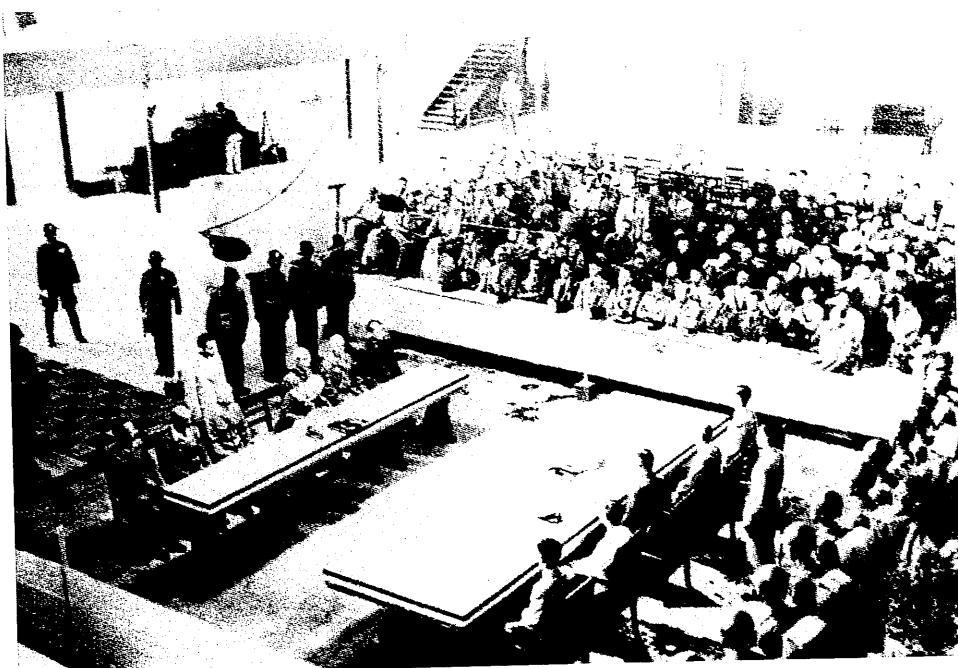
(1945年8月15日)

关于各城市的警察，我方入城前，即应以军事机关命令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入城后不可将警察拘捕起来，以免秩序无人维持，更易引起混乱，所有警察局长，在能服从我们军事管制命令的条件下，亦可暂时不加调换。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警察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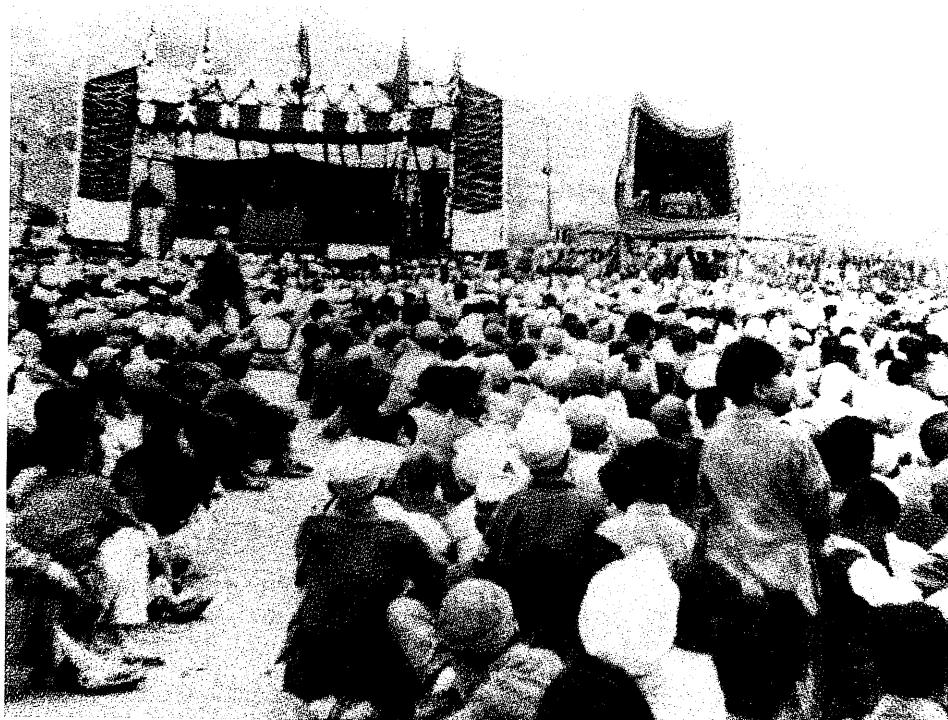
1945年8月，八路军和苏联红军在山海关会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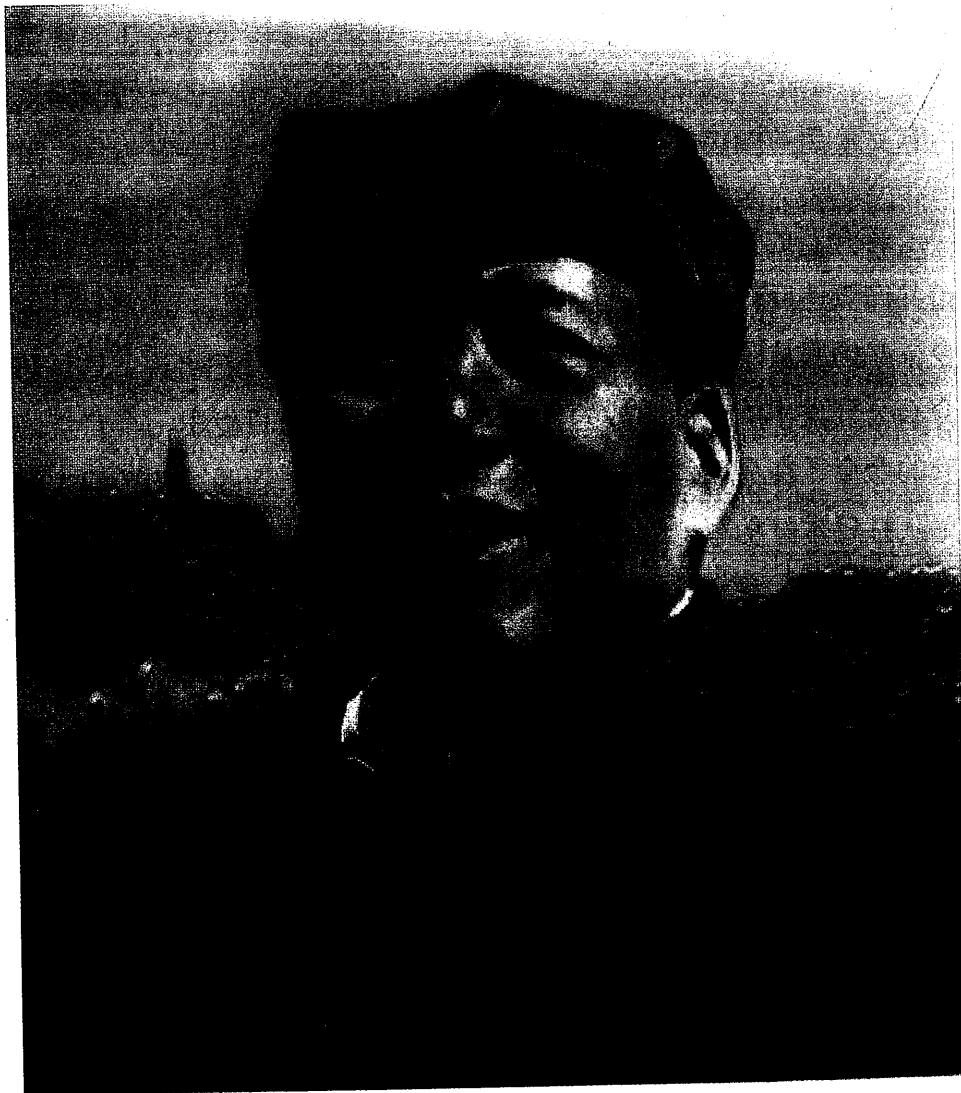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北平人民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延安人民在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油画）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

(1945年8月16日)

蒋介石的发言人，于十五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讲关于所谓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蒋介石于十一日发出一个背叛民族的命令，在最后消灭日寇的关头，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军队打日本打伪军。这个命令，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和绝对不应接受的。随后，蒋介石经过他的发言人，就把中国人民的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这样就表示：蒋介石向中国人民宣布了内战。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然不是从十一日的命令开始的，这是他在抗战八年中的一贯计划。在这八年中，蒋介石曾于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2]，每一次都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由于中国人民和盟邦人士的反对，才未实现，使蒋介石引为恨事。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把全国内战改期到抗战结束的时候，这样就来了本月十一日的命令和十五日的谈话。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

[2] 蒋介石发动3次大规模反共高潮的经过，参见《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为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里，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人民怎么办呢？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以惊人的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因而实现了抗日战争。在抗日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从没有一次放松了提醒人民，制止内战的危险。去年以来，共产党更以蒋介石所准备好了的在抗战结束时发动全国内战的大阴谋，再三再四地唤起人们的注意。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关心中国和平的人士一样，认为新的内战将是一个灾难。但是共产党认为，内战仍然是可以制止和必须制止的。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现在蒋介石

拒绝了这个主张，致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制止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新华社记者唤起全中国和全世界来反对这样一种最虚伪和最无耻的谎言。这些谎言是说：蒋介石禁止中国人民去解放敌占大城市，禁止他们去解除敌伪武装和建立民主政治，而由他自己到这些大城市去“世袭”（而不是破坏）敌伪的统治，中国的内战反而可以避免。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谎言，这种谎言不但显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主利益，而且直接违反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事实。必须永远记得：蒋介石所进行的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内战，并不是因为大城市在共产党手中而不在蒋介石手中，恰恰相反，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大城市都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在蒋介石或蒋介石所让与的日本和汉奸手中，正是这样，内战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十年，并局部地继续到现在。必须永远记得：十年内战之所以被停止，抗战中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直到最近陕甘宁边区南部蒋介石入犯事件^[1]）之所以被制止，并不是由于蒋介石的力量强大，恰恰相反，都是由于蒋介石力量相对地不够强大，由于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相对地强大。十年内战，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例如过去的“废止内战大同盟”^[2]之类的呼吁）而停止，而是

[1] 指1945年7月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等地的事件。

[2] “废止内战大同盟”，1932年8月成立于上海，主要是由一些资产阶级人物组成的。他们发表了主张“消除内战、共御外侮”的宣言。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和张学良杨虎城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如果共产党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又何能让蒋介石辈直到今天还安然活着，在离前线那么远的山坳里发表什么命令谈话呢？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确立内部和平状态”“成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以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这是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说的话^[2]。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1] 参见《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

[2] 这些话引自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3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

华中部队当前任务和作战方法

(1945年8月16日)

张、饶、曾、赖^[1]:

元午电^[2]悉。(一)冀鲁豫区已调十个小团共万人南下水东，位于开封、归德^[3]线以北，新乡以东地区，任务为相机夺取开、归线及新乡。水东原有八千人，河南王树声、戴季英、文年生、张启龙^[4]等部共二万余，李先念部^[5]主力不久亦将转至豫南，均足牵制李何^[6]，故李何不可能全部东进。(二)作战决定于打法，不浪打，非

[1] 张、饶，指张云逸、饶漱石，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副军长和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赖，指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2] 指1945年8月13日午时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要点是：(1)以新四军江北的现有力量，完成占领津浦路东及长江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并击退国民党军第十战区来犯顽军等任务，颇为困难。(2)拟从新四军江南部队调回两个旅，到江北执行上述任务。(3)江南的任务，由留下的另两个旅担任（新四军第七师的江南部队在外），必要时该两旅进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

[3] 归德，旧府名，即今河南商丘。

[4] 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和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5] 李先念部，指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是李先念。

[6] 李何，指李品仙、何柱国，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

确能聚歼不打，养精蓄锐，以多胜少，例如以五六个团打一个团，可能聚歼。（三）以打胜仗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1]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四）江南兵力不调动，有坚持现地，扩展胜利，创建苏浙皖边纵横数百里广大根据地威震江南（江北军亦如此）之极大可能。非至万一时机绝不轻言去闽浙赣，此旨望告粟叶^[2]，动员全党全军全民为此而奋斗。完成此任务亦取决于打胜仗，打法亦如上述。他们过去三仗^[3]打得不错，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与其调两个旅至江北，不如留在江南夹江配合为有利。

毛泽东

十六日五时

[1]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2] 粟叶，指粟裕、叶飞，当时分别任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

[3] 指1945年2月14日至18日、3月1日至27日、5月29日至6月23日，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在浙江西部天目山地区的3次反顽作战。

包围大同和解决太原问题

(1945年8月16日)

贺、吕、林^[1]:

(一) 红军^[2]占领张北、多伦。(二) 我绥远^[3]主力速包围大同，我必须和傅作义^[4]争大同。(三) 运城敌十五日尚未撤退，定十九日北撤。估计太原敌暂不会撤，阎^[5]亦暂不能公开占太原。我主力必须切断汾阳、孝义与太原间，占领据点，构筑工事，准备与阎决战。(四) 我太岳部队在棉上^[6]集中向平介^[7]进，望派人带电台去平介联络。我太行部队十九日集中武乡后向太原进，为时太迟，你们须用自己的及太岳的力量解决太原问题。

毛泽东
十六日

[1] 贺，指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吕、林，指吕正操、林枫，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红军，指苏联红军。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5]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6] 棉上，村名，位于山西沁源县北部。

[7] 平介，指山西平遥和介休。

就去重庆会见问题复蒋介石电^[1]

(1945年8月16日)

【新华社延安十七日电】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十四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请他去重庆讨论国事，没有提出讨论的范围与内容。十六日毛主席答复蒋氏一电，要求蒋氏对朱总司令给蒋氏电中所提关于国事的具体意见表示他的意见，然后考虑会见问题。毛主席电文如下：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2]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3]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2] 指蒋介石1945年8月14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一个电报。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3] 指毛泽东起草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1945年8月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

关于赴重庆谈判问题复蒋介石电

(1945年8月16日、22日、24日)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1]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2]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1] 指蒋介石1945年8月14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一个电报。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2] 指毛泽东起草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1945年8月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

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1]，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延安

三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2]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1] 指蒋介石1945年8月20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二个电报。该电一方面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成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为借口，拒绝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8月16日电报中提出的有关对日受降问题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再次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电报中说，“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以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特再驰电奉邀，务恩惠诺为感”。

[2] 指蒋介石8月23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三个电报。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中工65号 3/6

1945.8.14. 渝政台

蒋要求找重阳谈判

明码 人急

毛泽东先生懿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
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
请先生刻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
大计，幸勿吝驾。伫电不勝迫切盼之至。

蔣中正八月十四日

电台 八月十六日四时收
申快 四时收译场
(王治)

件于一毫

中央社渝廿四日电 第二次还往

②蒋电毛泽东致答：

悉悉悉悉，来电甚快，而文甚整，甚周，不可谓不善
一部，似予甚得其理，未尽所晓，兹以后更设办法，以为望而善解
所晓矣，分述如后：对于水陆为略，中国或甚为然，但以从速令之
一定取及我同盟某片局之信使，处理全对于此，令余念念不忘者，然
乎诚如内防恐犯乱，今于匪和所，晚是急，于得莫议，则机固良妙。
第八人称将行而起，方能行之，若用意行之，尚有质与地
律，倘用公金，究非此抗此匪之体，念此成将，全国则能照此禁
八九山半，一丘一壑，必须有以立脚之，而整肃之，不可耽延过期，大肆宣
告，时局，战争，小，原有，弊病，足下体念而致此，倘添人民疾苦，
甚无以为，以身垂范，如何以身垂范，此抗此，吾闻于斯也，虽然，一切，共为大计，用以益得志，甚得同人而心服，特此电复奉悉，特
此电复为属。

蔣中正 十日

步接蒋委员长致答： 谢开
特此转出，并即转达得悉，甚为感谢，特此转商
遵奉，特此转达，特此转达，特此转达，特此转达。

毛澤東代表
(24)

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图为其中的两个电文。

109

毛泽东答蒋介石

已抄付

特急蒋介石先生勋鉴：捷電謹悉，甚感。①盛意鄙人極願與先生共商商討和平建設國大計。俟飛机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會晤。并請隨即赴渝。勝喜有期。特此覆。即玉潔敬

毛泽东

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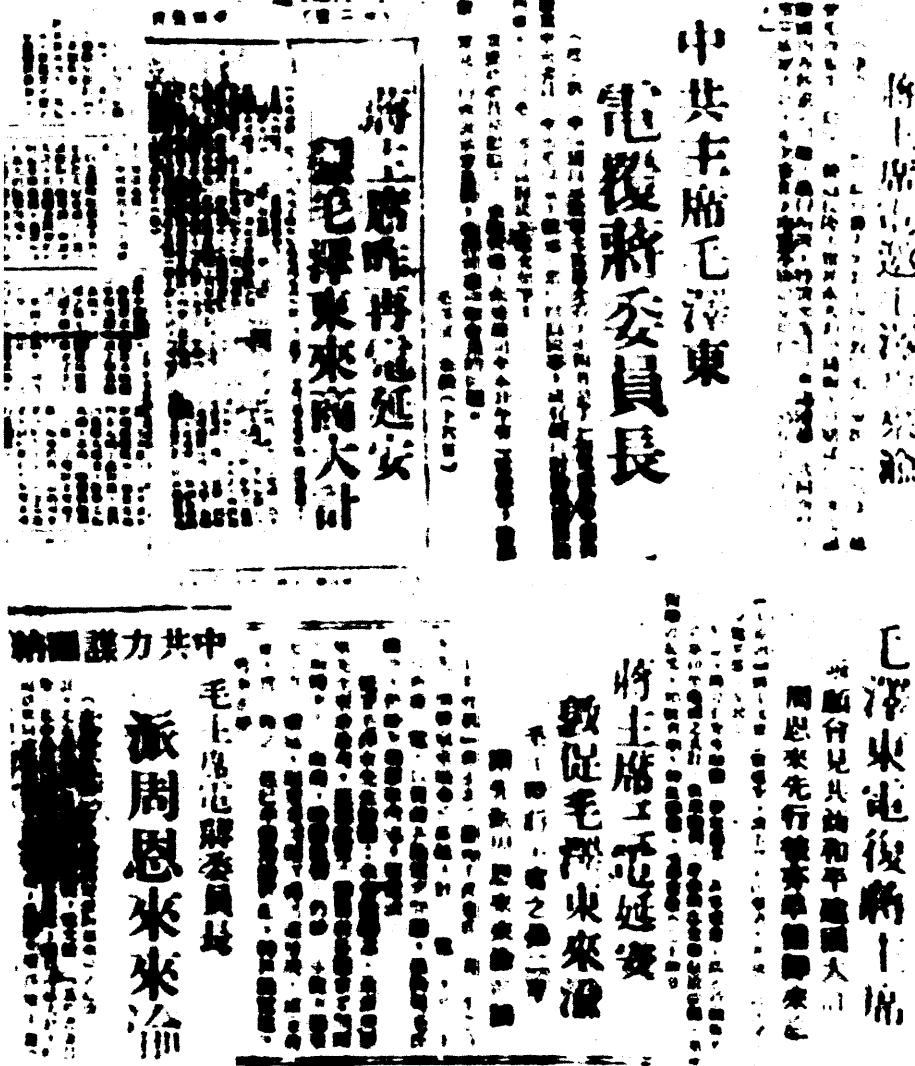
毛澤東
毛澤東用
毛澤東
毛澤東

毛

毛澤東

毛澤東

毛泽东复蒋介石电的手稿。



蒋介石和毛泽东相互往来的6次电报内容。

学会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 避免无把握的硬仗^[1]

(1945年8月18日)

你们及整个河南我军必须学会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无把握的硬仗应避免。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河南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文年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张启龙并告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戴季英电的主要内容。

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 尽可能调至万毅部^[1]

(1945年8月18日)

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二千五百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一千五百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萧华电的主要内容。

山西国民党军部署及我军作战任务^[1]

(1945年8月19日)

贺、林，并告程、耿^[2]：

十六、十七两电悉。(一) 胡宗南调其主力第一军、十六军、九十军入晋，先头一个师已渡河，其余大部集中潼关至韩城线，准备渡河。九十军从河南调来，须月底集中潼关。阎锡山^[3]除集中孝义区域之八个师准备入太原外，一部在运城、洪洞线准备接防，另一部（两个师）由浮山东进，争夺长治、长子区域。但日寇从永济至太原仍在原地未动，交防缴械非易，长治、长子区域亦然。(二) 谢富治^[4]率太岳六千人十六日集中棉上^[5]，日内当可至平遥附近，请派人去联络并指挥之，其任务为协助晋西北打击孝义北进之阎军。(三) 李达^[6]率太行九千人本日可集结武乡以东蟠龙洪水^[7]地区，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的电报。

[2] 程、耿，指程子华、耿飚，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参谋长。

[3]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4] 谢富治，当时任八路军太岳军区副司令员。

[5] 棉上，村名，位于山西沁源县北部。

[6] 李达，当时任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员兼参谋长。

[7] 蟠龙、洪水，均为村名，位于山西武乡县东部。

部原定开平遥地区协助夺取太原，现因胡宗南大军入晋，该师似宜用以对胡，同时对付侵入长子区域之阎军。（四）赵尔陆^[1]率三个大团位于榆次、寿阳地区夺取正太^[2]，并协助夺取太原。（五）传说阎部九千人已入太原，徐沟^[3]亦被阎占，请查是否确实。（六）李井泉^[4]已动身来你处任副政委。张宗逊^[5]率两团不日到延^[6]来你处，张任副司令。林枫准备去东北，以张秀山为分局副书记，帮助张稼夫^[7]。去东北干部一千二百人一星期后由延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请林先作准备。（七）包围大同由冀察晋担任，你处北方任务仍是阻止傅作义。

中央军委

十九日

[1] 赵尔陆，当时任八路军冀晋军区司令员。

[2] 正太，即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

[3] 徐沟，旧县名，1952年与清源县合并为山西清徐县。

[4] 李井泉，当时任八路军晋绥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5] 张宗逊，当时任八路军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

[6] 延，指陕西延安。

[7] 张稼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抽九个团赴东三省^[1]

(1945年8月20日)

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

红军^[2]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3]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4]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5]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分局并告晋察冀分局的电报。

[2] 红军，指苏联红军。

[3] 李运昌，当时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5] 万毅支队，指八路军滨海军区滨海支队，万毅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

枫^[1]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

中央军委

未号

[1] 吕正操、林枫，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彻底执行上海起义的方针^[1]

(1945年8月20日)

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华中局8月19日报告说：“上海我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有20万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水电工人、邮政工人、电车工人、电话工人、铁路工人。日本厂10万失业工人可动员，沪东、沪西各可动员数万。沪西大部分巡捕我可控制。伪方只有税警团、保安队维持秩序，甚恐慌。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但暂不向驻守不动的日军攻击。”“即使将来万一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到农村发展游击战争取得胜利。”

动员城内人民起义， 配合我军夺取城市^[1]

(1945年8月20日)

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分局并告各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1]

(1945年8月21日)

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困难时可退浙南。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宜改为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建立政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审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关于改变占领大城市方针的 指示稿^[1]时加写的一段话

(1945年8月22日)

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1]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

(1945年8月23日)

—

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是肯定的。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我们曾力争在进入和平阶段前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2]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中苏条约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签字的，内容现在还未公布，大概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热、察是临时性质。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大战就可能爆发，和平不能取得。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本篇一）和结论（本篇二）。

[2] 指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26日，这个条约正式公布。

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虽然现在我们对国民党还要提出受降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没有希望了。由于这两点，我们想力争的那一批胜利果实就得不到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这不是不力争的结果，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蒋介石的地位。他的有利方面是，有合法地位和大城市。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的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

第三，关于我们的地位。我们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这是蒋介石不能抹煞的，我们党目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是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的；广大解放区的存在，蒋介石无法进行封锁；我们党有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第四，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大城市和没有机械化的军队，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外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对伪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做好。当然，即使工作做好了，我们得到了北平、天津，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是事实，所以不能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大城市的行动。

第五，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胡宗南^[1]现在只

[1] 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其他的三个军去了山西，三个军在河南，一个军不知所在），我们伸出拳头去，他就没有办法。同时，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这次他们缴了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枪，可能引起新的矛盾。中央军、杂牌军共二百万，加上收编的伪军八十万，共二百八十万，它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而我们的军队还可以扩大。国民党本身有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

第六，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

第七，我们要求的条件，就是《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1]，如果大家同意就通过，由书记处进行修改。十四条中除第三、四、五条外都是老的要求，着重于民主、民生问题。现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第三、四、五条要求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和接受日军投降等是不得不提的，其中除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一项或许有旧金山式的希望外，其余都是没有希望的。关于第一条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着他让步，他总之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编十二个师，就是为的等得到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

[1] 《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

日本人走了，国共双方面对面了，问题拖不下去了。

第八，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的，但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所以不得不再批评它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就可以取得我们的地位。

第九，最近两个星期的进军^[1]是必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我们控制的县城已增至一百三四十个。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整训军队。解放区的人口和军队都扩大了，财政困难，穿衣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以后要缩编和搞生产。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气不能松，松下来就谈不好。

第十，和平时期的两项重要工作——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没有做好，今后要下全力认真地去做。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

[1] 指8月11日至23日近两个星期内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对日军进行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限令日伪军投降的命令。8月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6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内蒙古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坚决执行这些命令，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差不多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者不是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我们要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如外国不帮助，军队可能因谈判而缩小，内部不一致等等。现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的情况非常危险。但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自己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第十二，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1]，以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2]。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第十三，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这回军队集中很好，但不便于过多集中的地方，应该根据吃饭、穿衣、有枪等条件加以改变。解放区可能要再来一个精兵简政。打仗一定要有利，没有把握的仗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不要增加人民负担，今冬要搞大减租，明春要搞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

[1] 即后来在1945年8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

[2] 这里所说的周恩来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安排，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改变，决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于同日复电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他和周恩来可以偕赫同机飞重庆。

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二

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进攻还是退却？主要的当然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的进攻，但部分的会有退却。解放区一千万人口、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和北伐、内战、抗日三个时期都不同，因为这是和平时期。我们很需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学会了做许多工作，才有能力去搞全国、搞大城市工作。

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苏联红军不入关，这不是我们主观上的问题，日军不缴枪给我们，我们曾经力争过了。至于我们扩大地方是否是“左”倾机会主义？那也不是。有些地方我们占领了又退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种想法不对，退出了的地方，群众也得到了教育。插草为标时要搞大一点，到安居乐业时就搞小一点。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我们要准备做城市工作。

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

谈判如果不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我们是否要打？应该打，

但必须打胜仗。

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召开？如果实现了和平，就开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会议。

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所以回赫尔利的电报^[1]是说先派恩来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2]来请，我就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姿态比较好。

我去重庆，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3]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与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个人可以开会。

划定区域的问题，我们不提，因为我们要求承认一切解放区，但蒋介石是要提的。博古^[4]同志提议把十四条归纳为六条，这个意见很好，交书记处再去考虑决定^[5]。

[1] 指毛泽东1945年8月23日复魏德迈的电报。电报说：“来电奉悉，极表欢迎。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兹先派周恩来将军前来接洽，请转达赫尔利大使并给交通便利为盼。”

[2] 邵力子（1882—1966），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是国民党参加重庆谈判的代表。

[3]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均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4] 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

[5]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央书记处把原拟的《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归纳成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写入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

目前党的方针及新四军的工作部署

(1945年8月24日)

饶、张、赖^[1]，并转粟、叶^[2]：

各电悉。

- (一) 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
- (二) 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 (三) 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
- (四) 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
- (五) 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 (六) 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
- (七) 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

[1] 饶，指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1892—1974），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赖，指赖传珠（1910—1965），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2] 粟，指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当时任中共苏浙区委书记、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指叶飞（1914—1999），福建南安人，当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

(八) 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九) 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

毛泽东

二十四日

力求占领许多中小城市^[1]

(1945年8月25日)

平原分局：

敬电^[2]的意思是因为中小城市的敌伪能歼灭者则歼灭之，不能歼灭者如有可能则让其集中大城市，以便我们能占领许多的中小城市，应付即将到来的新局面。

中央
未有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的电报。

[2] 指194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给晋察冀区、冀鲁豫区、平原区和山东区的电报。要点是：敌受投降条约限制，不许向我投降，因此决定了华北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暂时不易为我夺取与占领。为围困大城市，夺取小城市，增加国民党军与我争夺胜利果实的困难，应彻底破坏所有铁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

(1945年8月25日)

全国同胞们！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

执行波茨顿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在中国的走狗们——中国的吉斯林们，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 (一) 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 (二) 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 (三) 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 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 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 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

卷之三

由于日本的投降，中国军民八年抗战所打下的基础和经验，已胜利地和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是同样的结束了！在全国人民的鼓舞下，一个全新的局面，已经展开了。中共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党派，大机智地团结起来，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在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上，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是势所必然的。

对日本军的猛烈抵抗，之后又购买了美国的武器，就地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斗争的战争。这是美英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自己一定会胜利，如果能以自己那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斗争，和用之于外所作的贡献，来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那就再好不过了。在国际解放区的二万五千里军民，在抗日前线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而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已将要作为全民族民主政权的支柱和平面团结的中枢，而从其本身大大的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同胞们！
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
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民民主文藝團之於蘇聯地帶，則被認為是蘇聯的殖民地。中國人民民主文藝團在蘇聯的殖民地，是大大的有損中國的威信。民主民主文藝團之於蘇聯地帶，則被認為是蘇聯的殖民地。中國人民民主文藝團在蘇聯的殖民地，是大大的有損中國的威信。民主民主文藝團之於蘇聯地帶，則被認為是蘇聯的殖民地。中國人民民主文藝團在蘇聯的殖民地，是大大的有損中國的威信。民主民主文藝團之於蘇聯地帶，則被認為是蘇聯的殖民地。中國人民民主文藝團在蘇聯的殖民地，是大大的有損中國的威信。

中西合璧，其制一新。我們對於中國固有之民族精神，務為充分發揮，以期永遠流傳於世界。此即吾所希望者也。特此佈聞于中華全國同胞。

就這樣說了一般的對話，然後就分手了。我們是彼此告別，民主、團結、為社會、為國家的統一而鬥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阐明中共中央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

复王震、王首道电^[1]

(1945年8月25日)

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
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复魏德迈电^[1]

(1945年8月25日)

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1] 这是毛泽东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电的主要内容。

和刘伯承、邓小平的谈话^[1]

(1945年8月25日)

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1] 这是毛泽东和即将乘美军观察组飞机返回太行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的一部分。同机飞抵太行的还有：陈毅、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林彪等。9月9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搭乘自延安去晋察冀接回被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飞机返部。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未曾通知中共中央，参加中共七大的几个大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在大反攻开始时尚未离开延安。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



1945年8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前往太行根据地前在机场的合影。

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国民党进攻^[1]

(1945年8月26日)

河南区委：

来电悉。对国民党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之，但须打得好，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中央
未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河南区委的电报。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45年8月26日)

根据各地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因为我们不能进入大城市，何应钦^[1]不分配给我们受降缴械的地点，苏联红军不入关，情绪有些波动，需要安定一下。其实这一向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胜利，察热^[2]没有蒋介石的足迹，江淮、山东、河北、山西、绥远^[3]的大部分，都可以在我们手中。同志们现在的愤激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仔细地计算一下。我们这个电报^[4]发出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位同志同若飞^[5]同志商谈，决定答复魏德迈的电报^[6]，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

[1]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

[2] 察，指察哈尔省；热，指热河省。

[3] 绥远，指绥远省，1954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

[4] 指毛泽东1945年8月2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5] 若飞，即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8月28日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赴重庆谈判。

[6] 指毛泽东1945年8月25日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电报。

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1]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2]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3]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4]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我可以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我要去，明天报上要发消息^[5]。党的领导中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更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只要有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

[1] 中共中央当时考虑可以让出的地区，指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8个抗日根据地。

[2] 何鸣事件，指1937年7月，当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的何鸣，由于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致使所率独立第三团近千人被包围缴械。

[3] 指苏、美、英3国。

[4] 指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5] 1945年8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决定赴重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的消息。

将来召开国民大会时，共产党员可否投票选蒋介石当大总统，这要看情况才能决定。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 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

(1945年8月26日)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

[1] 这是毛泽东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坚定地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也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当时还顾忌世界民主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还在8月27日为此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所起草的这个通知，分析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以及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的对策，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的指示，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毛泽东等在8月28日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43天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虽然只发表了一个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政治上却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因而是成功的。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在重庆继续谈判。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参见《关于重庆谈判》一文。

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1]，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2]，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

[1] 在日本投降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美、英3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但是不久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所谓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声明，只不过是它用来作为积极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准备反革命内战的掩护而已。

[2] 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1]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

[1] 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当时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致林枫等电^[1]

(1945年8月26日)

(一) 赴东北四省工作之干部团一千二百人及赵副旅长^[2]所率一个团不日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开至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四省工作；(二) 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目前晋绥争夺战极其重要，故正操^[3]及其所部暂时仍在现地执行原任务。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枫并转吕正操及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2] 赵副旅长，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副旅长赵承金。

[3] 正操，即吕正操，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 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1945年8月27日)

各局、各区党委：

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1]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中央
未感

[1] 周，指周恩来。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专程到延安来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和赫尔利乘专机到延安，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和赫尔利等交谈。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赫尔利在延安合影。



1945年8月，毛泽东、朱德和张治中在延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延安的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赫尔利、张治中在延安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



1945年8月28日，邓颖超等在延安机场为毛泽东送行。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前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前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赫尔利在飞机前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赫尔利在飞机前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张治中、赫尔利在飞机前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赫尔利等在飞机前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1]

(1945年8月28日)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1] 毛泽东在赫尔利、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于下午4时5分飞抵重庆。这是毛泽东在重庆机场接见记者时发表的谈话。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途中。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的飞机上。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图为毛泽东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飞抵重庆机场，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抵达重庆，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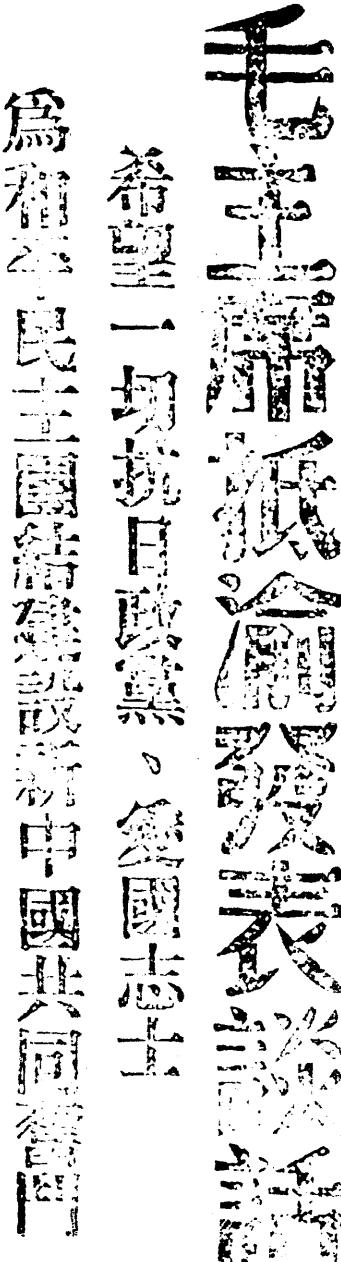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机场。



重庆各界人士欢迎毛泽东到重庆。



毛泽东抵渝当晚和第二天以及离渝前夜下榻的重庆歌乐山林园“中正楼”。



【新華社延安卅日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於二十八日抵達下機後，曾發表談話如後：

「本人此次來渝，係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聯合抗敵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跨入和平建設時期，當時時機已為重要，目前最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護忠士下統一起來，共同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

【新華社延安卅日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蔣介石八月共進後，當地平橋林園。廿九日上午，毛澤東與張治中晤談，下午蔣介石先生晤談，晚間有兩場演說，王共平、張羣、鄧力群等作長時間談話。

毛澤東在開羅會見美國志士

抗日政府附近新谷太行區救民助墮

毛澤東在開羅會見美國志士

毛澤東在開羅會見美國志士

毛泽东抵达重庆时在机场发表的讲话。

新华日报
外號
毛澤東抵渝

毛澤東抵渝

毛澤東抵渝

毛將主席邀請商談開建國大計
毛澤東抵渝

林伯渠、周恩來、王若飛偕來

八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王若飛、董必武、張聞天、朱德、彭真、任弼時、高崗、胡錦濤、鄧子恢、郭沫若、沈鈞儒、左舜生、宋任窮、陳毅、譚平山、黃琪玉、劉少奇、鄧子恢、胡耀邦及中外記者數十人，由重慶乘飛機到延安，與毛澤東晤面。毛澤東為毛澤東同毛澤東。

詳情看明日本報

《新华日报》关于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号外。

新華日報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華國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
要求政府立即實行民主措施

（電）華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要求政府立即實行民主措施，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

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

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

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

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

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

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

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為此而奮鬥。

美艦進入日本海
日代表團到美輪米蘇里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電）美艦進入日本海，日代表團到美輪米蘇里號。

（電）美艦進入日本海，日代表團到美輪米蘇里號。

（電）美艦進入日本海，日代表團到美輪米蘇里號。

應蔣主席之邀商團晤大計

毛澤東同志將來渝
（延安二十六日新華社訊）應蔣主席之邀商團晤大計，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決定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同赴商談，只待國民政府派飛機來迎，三人即可啓程。

（延安二十六日新華社訊）應蔣主席之邀商團晤大計，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決定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同赴商談，只待國民政府派飛機來迎，三人即可啓程。

鬼子在這兒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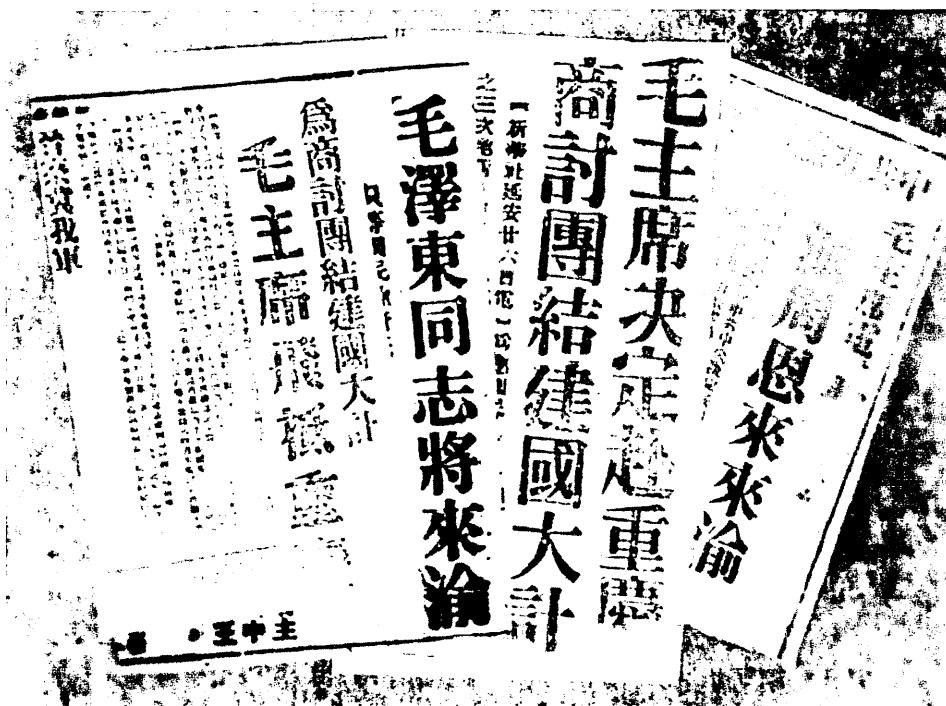
本報特稿

佔領東京前奏曲

相機得地因襲舉手

降魔長安到白老漢家

《新华日报》有关毛泽东到达重庆谈判的报道。



重庆各大报刊有关毛泽东抵渝谈判的社论和报道。

和张澜的谈话^[1]

(1945年8月28日至9月11日)

—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您是张表老吧？您好！

张澜（以下简称张）：不敢！不敢！润之先生好！欢迎您光临重庆！

毛：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不敢当，不敢当！

张：应该的嘛，您奔走国事，才真是辛苦了！

毛：哪里，哪里！

毛：改日长谈。

[1]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资助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10月继黄炎培之后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至1955年2月9日逝世，享年83岁。这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和张澜的几次谈话。本篇一是毛泽东到达九龙坡机场时同前来迎接的张澜的谈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周恩来到特园拜访张澜时的谈话。本篇三是9月15日，毛泽东同张澜、鲜英会晤时的谈话。本篇四是毛泽东返回延安时在机场和张澜等的谈话。

—

毛：民主之家，民主之家，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冯将军行伍出身，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不简单啊！既武既文，亦俗亦雅，不虚儒将风范。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张：是啊，冯将军也是民盟的知己。

鲜英^[1]（以下简称鲜）：毛先生，因为表老住在这里，民盟总部亦在这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聚会、宴请也常在这里，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曾来做客，听到这名称后，欣然提笔写了这块匾。郭沫若先生还为之题诗呢。

毛：原来这是董老题的名，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诗，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也堪称三绝了。

毛：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执掌天下事，长集此民主之家。谁的手笔？

鲜：表老所作。

[1] 鲜英（1885—1968），字特生，四川西充人。民盟创始人之一，著名民主人士。军人出身，1925年出任江巴卫戍司令驻防重庆，1933年春，与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络反蒋抗日，为后来的红桂川协定的签订奠定了基础。1937年在成都与张澜、钟体乾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签订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1939年后开始拒绝仕途。鲜宅名“特园”，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聚会共商国是之场所，董必武、冯玉祥分别以“民主之家”的尊号赠予特园。毛泽东称他为“当代孟尝君”。1968年，鲜英夫妇先后逝于北京。

毛：意义好，词好。

张：斯是陋室。

毛：惟吾德馨，何陋之有！

张：润之先生，此次您竟会来重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您现在来了，我们又不能不为您的个人安危而忧虑啊！

毛：多谢关怀！多谢你们各位的关怀！此次单刀赴会，来之前，我们是作了充分研究和估计的，按目前形势看来，可以说是有惊无险，或者是有险不危，我现在不是甚好吗？毫发无损，我一下飞机，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啊！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啊！

张：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周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毛：表老，这次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我，做得颇有诚意，我如不来，必大放其谣言，说我们不要和平，不要团结，这种调子已经在唱了，不得了，罪名一大堆往你头上浇下来，现在我来了，他们哑口了，谣言不攻自破，统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造不出来了。

张：润之先生，前几年我曾当面告诉蒋介石：“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邀您来谈判，我看他演的是民主的假戏。

毛：哼，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明是非，这场戏不也就大有价值了？

张：润之先生，您看此次谈判前途将如何？

毛：国民党一方面要同我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我们进攻，包

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仅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已经有八十万。

张：哦？

毛：所以说蒋的主意是老早定了，他要消灭我们，而且是越快越彻底越好，不如此，他是不舒服的。

张：足见此人根本无诚意谈判，他在骗人！

毛：是啊！他总是骗人，他没有诚意，他是靠不住的，积多年之经验，我们深知是这么一回事。不说别的，此次他们三请四邀，诚意惊人，可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看来，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岂非笑话？

张：这就足证其假了，我看他们本来就没有想到您真会来的，故而，我认为谈判很难有什么真正结果。内战危机重重啊！

毛：表老，您说的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但是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表老，蒋氏要打内战有三大顾虑：一、我们解放区现放着人民一千万、军队一百万、民兵两百万，这个力量，他是不敢小看的。二、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今天，民盟在广大人民中已有很大影响，民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为民主团结、统一、建国，为反对内战，起着重大作用。现在，民盟在您的领导下，正和我们共同奋斗。蒋氏对此岂敢轻视？三、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不满意中国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有此三条，蒋氏要实现其妄想，决非易事，这迫使他不能不讲点现实主义。他邀请我，我就来谈判。至于谈判结果如何，到时再看，但我们还是要力争，以成其好事。他来两手政策，我们也早有准备，谈则谈之，以此求和平；打则打之，消灭他个干干净净。他要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当然我们不先动手，后

发制人，还要怎么样呢？

张：现在既然国共谈判了，蒋氏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承认了的也会赖掉，为了不让他赖，我说应该有第三者参加。

毛：这恐怕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毛：我看这样吧，以后我叫恩来他们随时向您和诸公报告谈判的情况如何？

张：那也好。

（毛泽东将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加以概括，向张澜作了介绍，并对此作了详尽的解释。）

张：很公道，很公道！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了大片土地和人口。不给几个受降区是不公平的。这六项，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全部采纳施行。你刚才说假戏真演，看来，这场戏倒是很看头哩！

（毛泽东又给张澜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以及人民福利等情况。）

张：上个月，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等几位参议员从延安回来对我讲了一些，真是“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啊！

警卫员：主席，今晚宴会的时间快到了。

毛：我们谈话忘了时间，晚上张治中先生邀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要告辞了。

张：他也邀了我。

毛：那好极了，我们晚上再见。

三

张：润之先生，展望谈判，终将如何？

毛：表老，目前谈判是有所收获的，已有部分达成协议。首先，他们同意避免内战和两党和平建设新中国。其次，他们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自由权利。另外，蒋氏已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会议。

张：召开政治会议，也即党派会议，这我们从年初喊到现在，斗到今天了，蒋是迫于时势，总算同意召开这个曾被他们视为分赃会议的会议了，不容易啊！那么联合政府呢？

毛：我们提出在政治会议上讨论决定之。当然其他问题如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等等，都将在会议上讨论决定之。上述这些您也已有所闻，目前，大体上都有了眉目。

张：这些看来都是确定的了？

毛：口头是确定了，也记录在卷，问题是要看今后实现得如何。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的东西，还得加一大把力呢。

毛：这次我们为了换得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是作了一些让步的，我们让出了南方八个解放区。

张：这是为什么？

毛：人家要回南京，我们的这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在他的过道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宋太祖是困着觉的。他硬要争，还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我们考虑到这还不至于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作了这个让步。抗战时我们自动取消工农革命政府名称，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所作

让步比现在还大呢。现在我们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其内战阴谋，使他们的谣言制造厂破产关门，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张：您所见在大处，甚是，甚是。

毛：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大问题是目前的症结所在。

张：至今还谈不出一个圆满办法来？

毛：是啊。

毛：表老，关于军队问题，我们提出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为四十三个师，国民党他们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他们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很好，照比例减下去，我们可以缩到二十四个师，甚至二十个师。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我看，蒋氏本意是要以“统一军令”为借口取消我们的军队，这就是问题实际上今天没有、也不大可能真正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毛：关于解放区的问题，我们先后提出了四个解决方案，但逐一给他们否定了，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提均不合其“政令统一”的口味，被认为与“政令统一”背道而驰，看来蒋氏这个“政令统一”非取消解放区不可。

张：润之先生，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百姓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毛：表老，蒋氏在抗战之初，打仗还像个样子，一上峨眉，就基本上躲在山上观战了。对他来说，胜利是等来的，他的方针也是早已定了的：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对内战，尽最大努力，委婉忍让以制止内战。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如果蒋氏置一切于不顾，决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起刀来，那么人民被迫也只能拿起刀来。我们这个没有合法地位

的“武化团体”^[1]也就只能回敬他一个“无法无天”了。表老，对此我们是有估计的，也是作了精神准备的。

张：如果时局真的发展到不可逆转之境地而被迫一战，敢问，前途如何？有几分把握？

毛：广大人民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这是我们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有坚强的党，有从事人民战争的军队，有具有威力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藉以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当然困难是有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张：润之先生，内战到了不可避免之日，四川该怎么办？

毛：表老，我今天主要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四川支持八年抗战，蒋氏在这里有一定势力，他还都南京后，对此岂肯放手？他是会另有打算的。表老，如内战不可避免，我谨代表我党中央郑重拜托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请您以您之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我党通力合作；第二件大事，请您协助我地下党发展武装，组织游击队。目前，我和恩来商量决定，派贾子群等在南充组织川北民主联军，打通华蓥山、大巴山、伏牛山至五台山，成就连接四川与华北解放区的地下通道。表老，这要请您大力协助了。

张：我当尽力为之，不负君命！

毛：表老，如果国共谈判成功而建立联合政府，视情况许可，川康问题可由地方自己解决；如果谈判失败，内战打起来，川康力量够，就早起义，力量不够，可等我军进川时协同作战。

毛：表老，恩来和我都有一个想法，也有一个要求，我们希望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

[1] 抗战时期，共产党被规定以文化团体资格参加国民参议会，因共产党有军队，故毛泽东作此戏语。

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未知尊意以为如何？

张：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蒋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双方必须建立此种密切合作关系。

毛：表老，我们刚才谈的是准备战争的事，当然话得说回来，打仗，只是到了被逼至无可奈何的地步，出此下策，才走的一着棋子，我们总还是要用一切办法，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实现和平！

张：是啊，是啊。这更是我素所主张的！润之先生，我们民盟不日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决心与中共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共同奋斗到底！

张：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就应该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

张：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国人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和推动。

毛：好，好，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

毛：今日畅谈甚快！

四

毛：有劳相送，甚不敢当！

张：应该的，应该的！您总算平安归去了！

毛：多谢关心！

张：二天^[1]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您哟！

毛：欢迎欢迎，欢迎您来延安，延安川人多，会做川菜招待您！

毛（向鲜英）：再见了！我们的孟尝君。

[1] 四川方言，意即日。

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谈话

(1945年8月29日)

一、对中苏订约之观感：苏联此次与中国订约目的有四：（一）防止日本法西斯之复活与英美反动派之阴谋。（二）确定中苏边界，避免将来中国为边界问题而作反苏之根据。（三）苏联对中国友好实属必要，如条约不立，将来中国必为反苏之重要根据地。（四）苏联今后中共之希望与援助，在条约内虽明定苏联今后之援助为国民政府，似对共党为不利，其实苏联今后将更积极支持中共，扶持建立民主之新中国。此次本人^[1]来渝与国民党商讨，亦为苏联之暗示，盖苏联希望国共能有合作机会，此种政府固不甚合于苏联理想，但较发生剧烈之内战为佳。

二、与国民党谈判之预测：此次谈判两方面均确相当诚意，谈判前途比较乐观，但各位不可理想太高。观测蒋主席此次之谈判目的有二：（一）希望本党^[2]能接纳其条件，彼以全国领袖自居，俟国内安定逐渐趋独裁之路。（二）如谈判无结果，内战不免发生，此时两方面牺牲必相当重大。此次本人与蒋主席商讨：一方面可以说受苏之暗示；一方面为打破蒋之企图争取国际国内之舆论。但此次本党所拟条件愿作相当让步，如联合政府之提议，可以取消，但其他

[1] 本人即毛泽东，下同。

[2] 本党即中国共产党，下同。

重要谈判原则将不予以更改。

三、本党今后之新动向以鼓动全国之“民主”潮流为原则，故应由农村工作，而转向都市活动，各地下活动同志将来可以半公开活动，以争取群众对中共之同情。

四、此次谈判所取策略：此次谈判希望有所结果，故所取方式：一方面与蒋直接谈判；一方面拉拢与联络国民党之左派，如孙科等及民主同盟张澜等，又美大使赫尔利亦可作侧面帮忙，故预料谈判前途当有相当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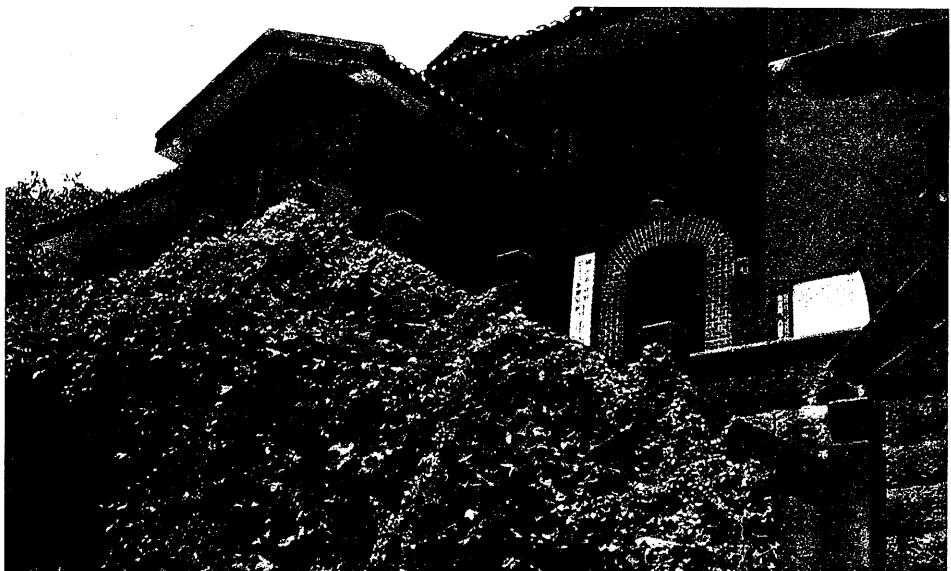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办公室。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住所红岩村十三号。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办公和休息的地方——中山四路桂园张治中公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送别来访客人。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和中外记者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斯诺、龚澎等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斯诺、龚澎合影。



《毛泽东在重庆曾家岩50号接见中外记者》（油画）

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

(1945年8月30日)

刘^[1]转中央：

兹将支日由周口头向国方代表张、张、王、邵四人提出的十一点意见^[2]电告如下：

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3]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

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1] 刘，指刘少奇。

[2] 这个谈判意见是周恩来起草的，原拟于1945年9月4日（支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后提前于9月3日提出。张、张、王、邵分别指张群（1889—1991），四川华阳（今属双流）人，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

[3] 蒋，指蒋介石。

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

甲、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是，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及抗战后复员善后等项问题。

乙、确立省制，信任地方，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1]、河北、山东、山西五省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组织省政府，其他绥远^[2]、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各省与平、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副主席、副市长及委员。

丙、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丁、全国大赦。

戊、实行紧急救济。

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

甲、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部队已达一百二十万人，亦拟逐步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

乙、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上条十六个军的驻防地区应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丙、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上述整编后部队的各级官位。

[1] 热河，即热河省；察哈尔，即察哈尔省。

[2] 绥远，即绥远省。

- 丁、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
 - 戊、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 己、编余官位，实行分区训练。
 - 庚、解放区民兵，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
 - 辛、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
 - 壬、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 十一、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
- 甲、释放政治犯。
 - 乙、保证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 丙、取消特务。

毛
陷

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 八项原则性意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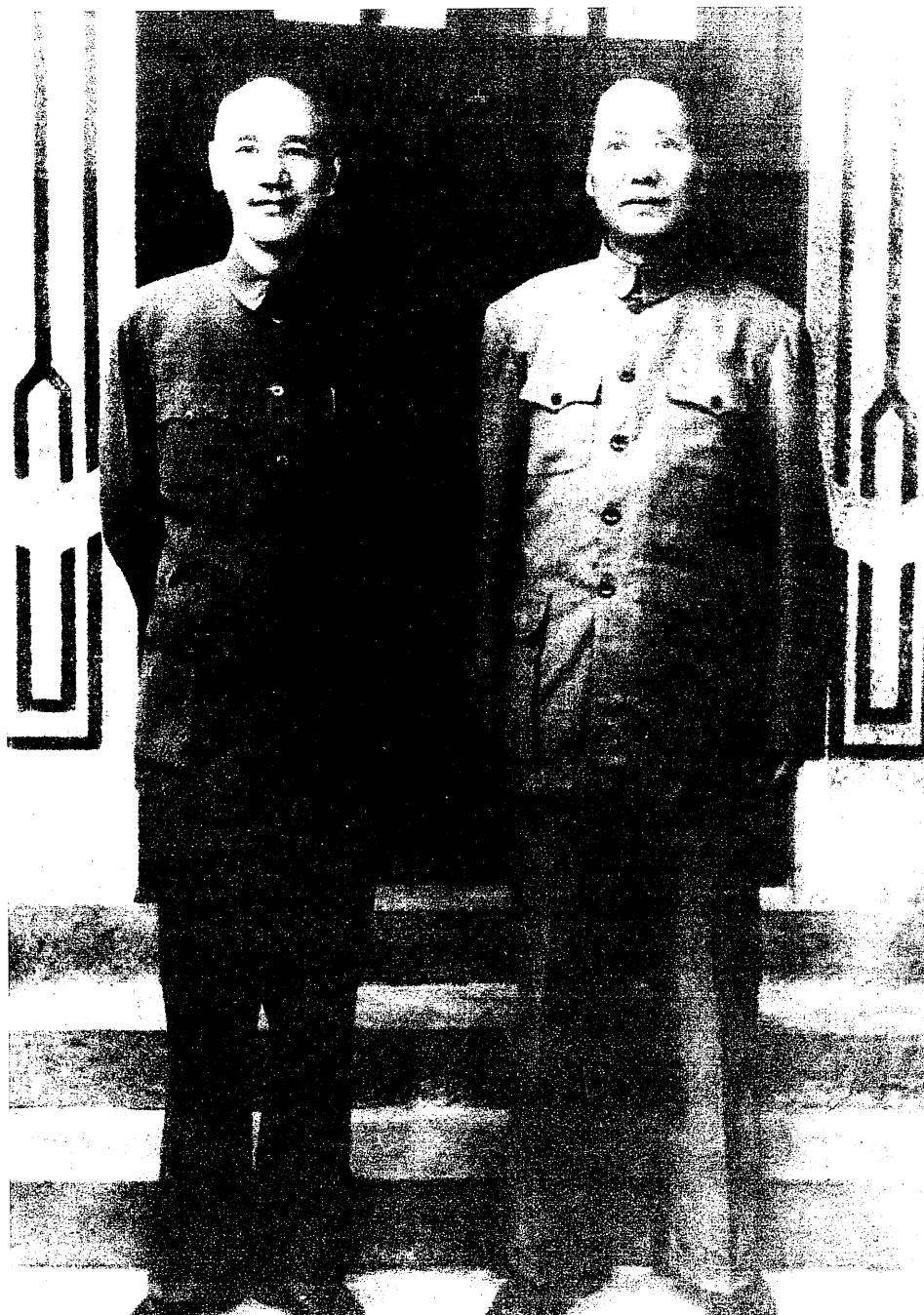
(1945年9月2日)

-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 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
- 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 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 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 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 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 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1] 毛泽东于9月2日上午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在座。这是在商谈过程中，毛泽东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八项原则性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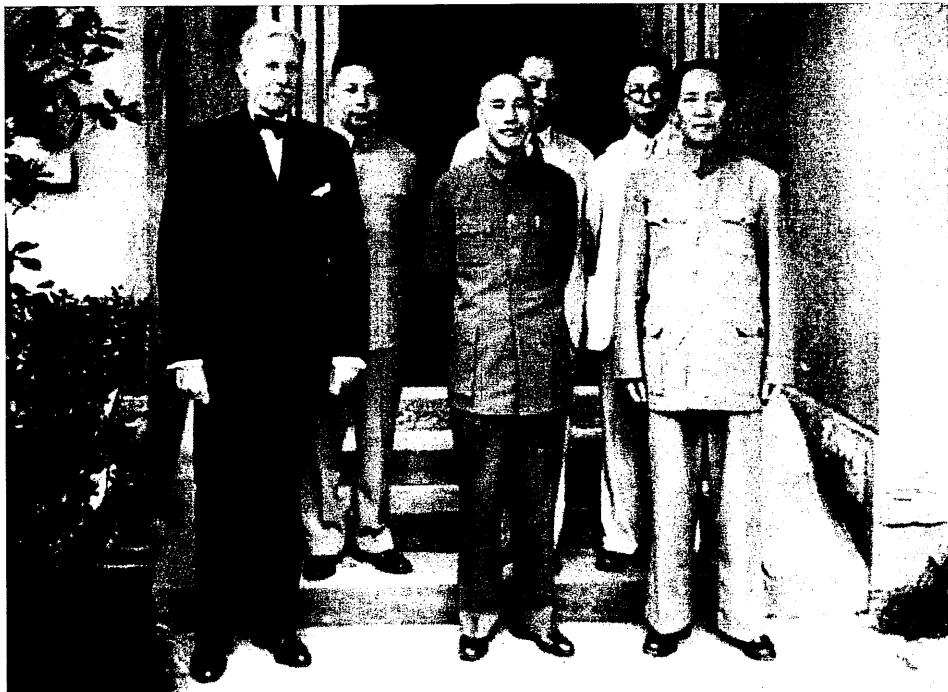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赫尔利、蒋介石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代表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赫尔利、张治中等在一起谈话。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相互敬酒。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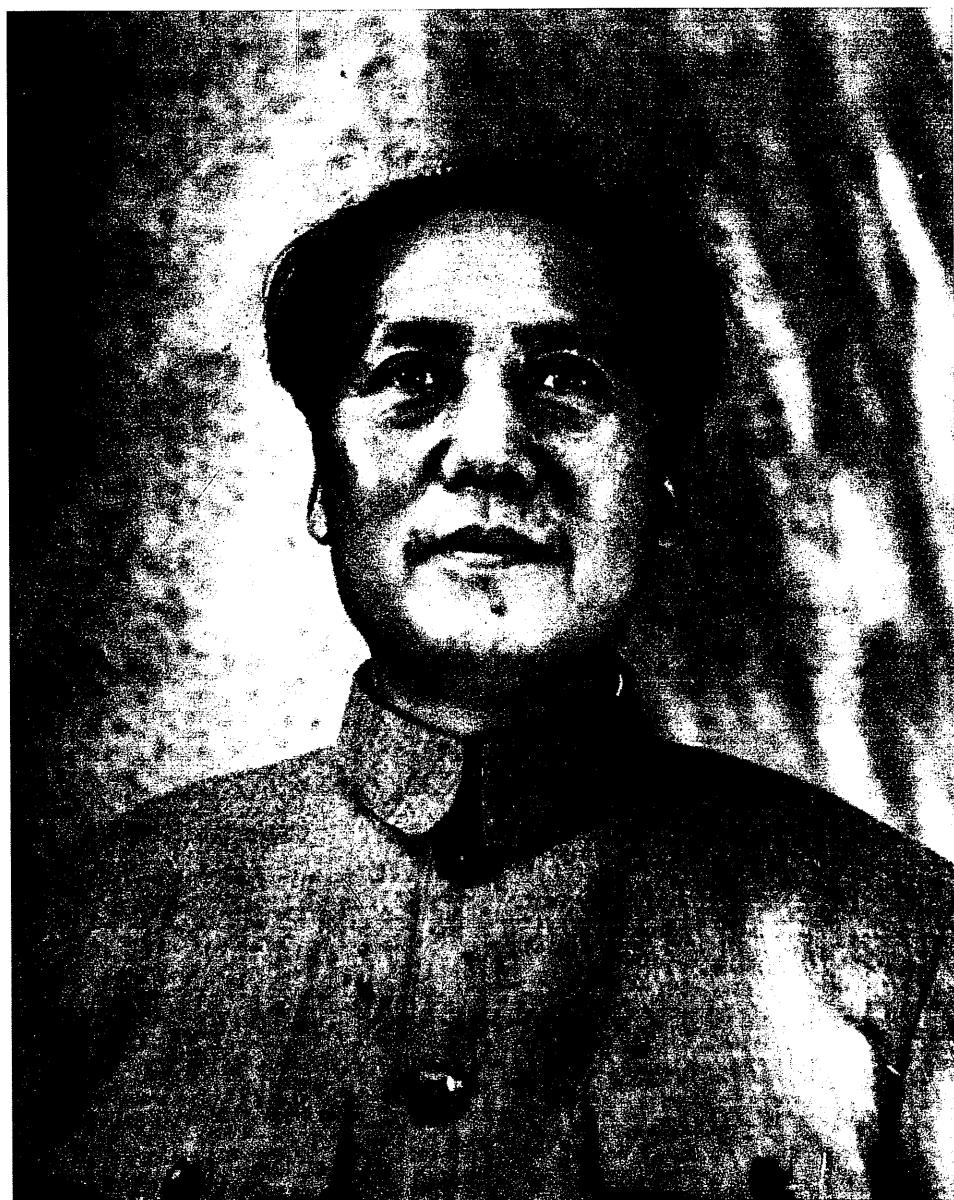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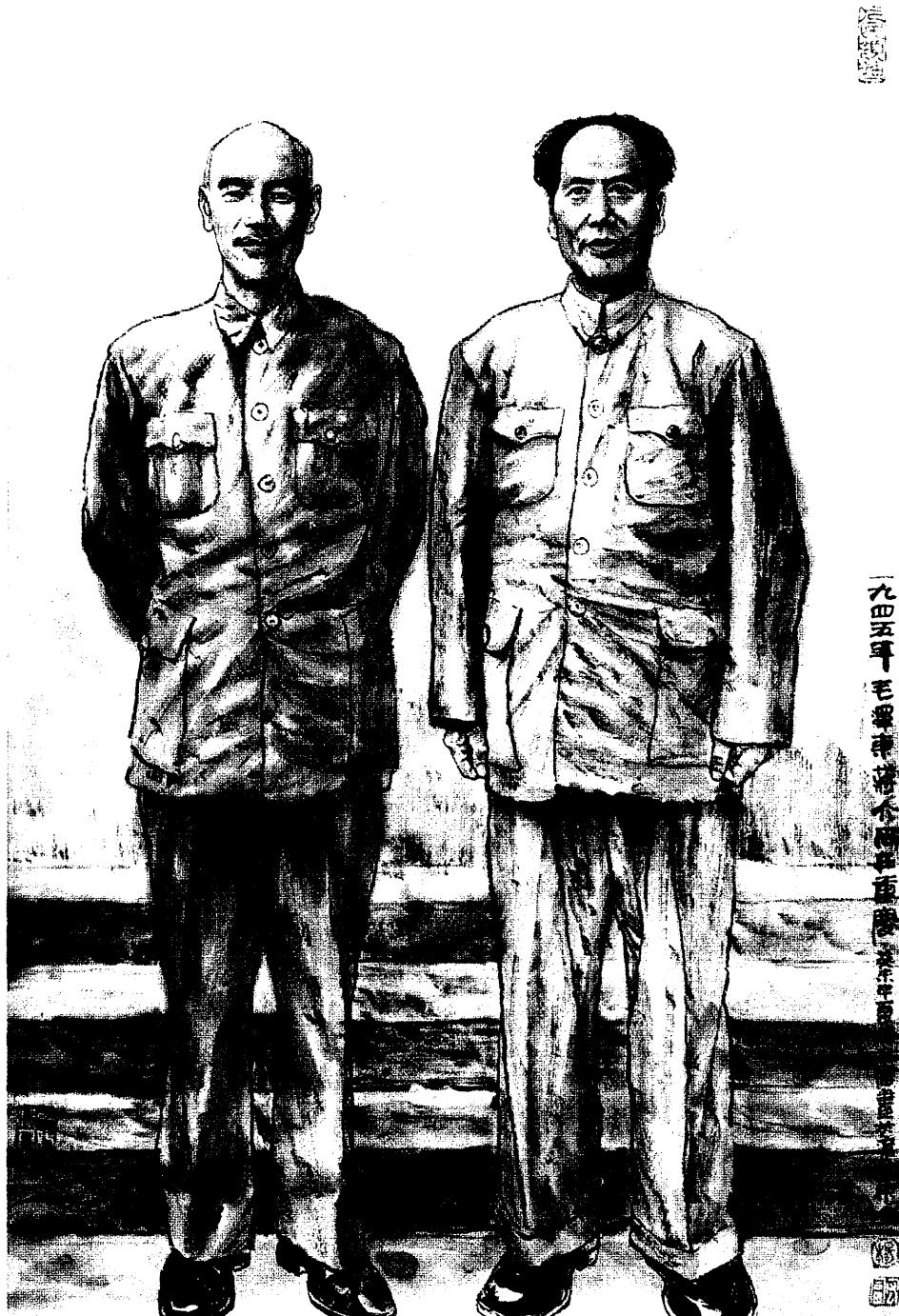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赠送给毛泽东的欧米茄手表。



重庆谈判期间，中苏文协召开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图为大会会场和相关报道。



《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画)

为民主人士题词^[1]

(1945年9月2日)

光明在望。

[1] 1945年毛泽东参加国共谈判时“三访特园”。二访特园在9月2日，张澜与鲜英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与王若飞。毛泽东在纪念册上题词“光明在望”四字。

为庆祝抗战胜利题词

(1945年9月2日)

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毛泽东

庆祝抗战胜利
中華民族解放
萬歲
蔣介石
毛澤東

毛泽东为庆祝抗战胜利的题词。

和大公报记者的谈话

(1945年9月5日)

毛泽东接见大公报记者称：

来渝五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须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边区解放区情形与其他地区不同，有民选政府，有自卫军，无保甲长；保甲长为统治人民者，最要不得。协商之另一结果为国民大会将延缓举行，对代表问题则双方意见犹未能一致。中共方面不主张维持旧代表，原则上主张实行普选。

毛泽东评论《中苏条约》称：

该条约为远东和平之保障物，有人认为对我国之民主运动不利，实则相反，可拭目待之。又有人因苏联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而惊讶，实则除国民政府而外自无可为对象者。然条约亦并未束缚苏联对中国政治批评之权，舆论仍可说话，前数日苏联红星报撰文谓中国应走向民主政治，对我两党团结寄以殷切之期望。中国获得强有力之盟邦，可勿疑心于被其他国家侵略。

为中学生卢国琦题词^[1]

(1945年9月6日)

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

毛泽东

[1] 1945年9月6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走访柳亚子，柳亚子邻居的小孩卢国琦——一个中学生，人小胆却不小。他拿着纪念册，闯进柳亚子家，请求毛泽东为其题词。毛泽东就接过纪念册和钢笔为其题写：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接着，周恩来、王若飞也都题了字。最后柳亚子为其和诗一首。

为和平而团结
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学生卢国琦的题词。

在重庆的公开声明^[1]

(1945年9月13日)

【合众社重庆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日下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所以来重庆。按照两党协议，毛氏说不能评论与国民党领袖之间的谈判进行的情形，他说：“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平。”毛氏说：共产党希望达到良好的结果，“这样，中国能够从抗日战争阶段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是整个世界的希望。毛氏称，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达到上述目的。

【路透社重庆十三日电】自国共会谈于两周前开始以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将军今天发表他第一次的公开声明说：全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毛氏说：目前双方保证不向外公布会谈的情形，但他希望会谈会成功。他又说：希望当谈判正在进行中，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共产党宁愿撤退，而不愿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但他们仍然将继续与敌伪军作战。

[1] 这是毛泽东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报道。

尽快派人到上海等地办报^[1]

(1945年9月14日)

中央，并转张、饶、李，林平^[2]：

(一) 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二) 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3]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发出的电报。

[2] 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林平，即尹林平（1908—1984），江西兴国人，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3] 范长江（1909—1970），四川内江人，当时任华中新华社、华中《新华日报》社社长。钱俊瑞（1908—1985），江苏无锡人，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阿英，即钱杏邨（1900—1977），安徽芜湖人，作家，当时任华中文协常委。梅雨，即梅益（1913—2003），广东潮安（今潮州）人，当时任中共上海文委书记。

(三) 工作进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以便配合。

毛 周

寒

复中共中央电^[1]

(1945年9月15日)

浙东、苏南、皖南三地部队须立即开始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障北上安全，并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请通知华中拟具体意见。

[1] 中共中央9月14日电告：苏军在东北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我冀热辽十六分区司令曾克林（当时任沈阳卫戍司令）乘飞机于本日同来延安，该中校向朱德总司令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口头通知，请命令八路军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的各部退出。朱德表示，热河、辽宁各一部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中共中央9月15日电告：已决定迅速地坚决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已去东北；决定组织东北局，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同日，毛泽东还接到中央转来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9月14日的电报，黄建议山东应调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至6万人去山东，江南的第一师应调江北。这是毛泽东关于答复中共中央9月14日和15日来电致中共中央电的主要内容。

在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

(1945年9月18日)

今日是九一八纪念日，首先应该庆祝胜利。八年抗战，胜利终于到来，尤其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已沦陷十四年，今日也得到胜利解放，身临此日，倍觉兴奋。所最感光荣的，是能够在这个时期和诸先生朋友和各老前辈见面。回忆抗战期间，虽极艰苦，但因全国一致的努力，现已平安渡过，蒋主席特邀来渝共商国是，意至可感。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之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

复中共中央电^[1]

(1945年9月19日)

(一) 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饶计划^[2]，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二) 同意陈、饶^[3]去山东，罗及萧^[4]去东北，林彪去热河^[5]，亦以快为好。华中由谭、邓^[6]组织分局。

[1] 刘少奇9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全国战略方针是自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这是毛泽东复中共中央电的主要内容。此电并决定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

[2] 中共中央9月19日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提出长江以南部队北撤计划，并告知张云逸、饶漱石的建议，其内容是将江南主力迅速北调，越快越好，浙东和皖南部队及党政干部全部转移，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一个让步。

[3]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

[4] 罗，指罗荣桓。萧，指萧华。

[5] 林彪和萧劲光当时分别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8月25日飞抵太行后，即前往山东，途中得知中央调令后，转道出山海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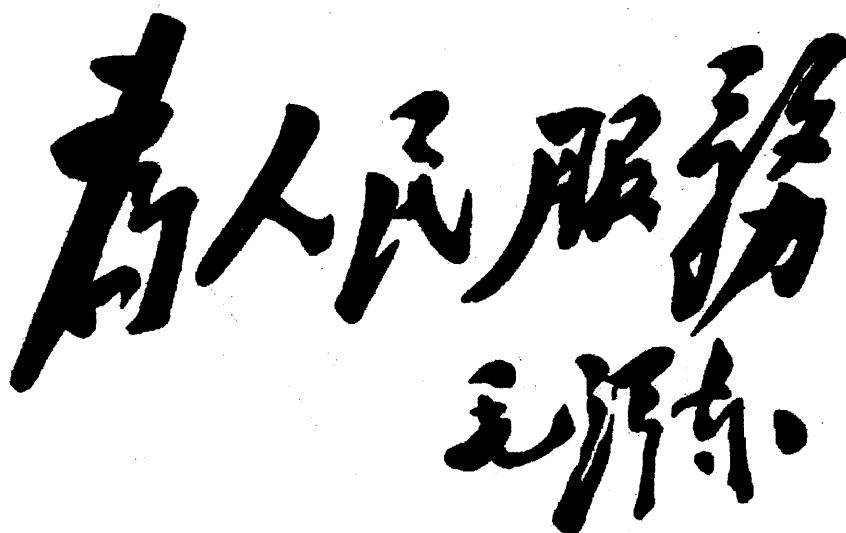
[6] 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淮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淮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

为《大公报》题词^[1]

(1945年9月20日)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A large, bold, black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op line reads '为人民服务' (For the People's Service) in a cursive script. Below it, the bottom line reads '毛泽东' (Mao Zedong) in a similar style.

毛泽东为《大公报》的题词。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其间曾宴请《大公报》总编王芸生。王芸生跟毛泽东谈，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然后，毛泽东诙谐地回答了一句：“不是我们共产党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还特地为《大公报》写下5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为徐迟题词^[1]

(1945年9月22日)

诗言志。

毛泽东

[1] 这是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为诗人徐迟所写的题词。

徐迟
毛泽东

毛泽东为徐迟的题词。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

(1945年9月27日)

(一) 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 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三) 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2]，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 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

[1] 这是毛泽东对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12个问题的答复。

[2] 指1945年8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

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 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 问：中共对中苏条约^[1]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 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

(八) 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 问：A. 你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 他

[1] 中苏条约，指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 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千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 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1]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2]。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 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1] 林肯（1809—1865），曾任美国总统。

[2] 指美国总统罗斯福（1882—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十二) 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给柳亚子^[1]的信

(1945年10月4日、7日)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2]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3]，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

[1]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民主主义者、诗人。当时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

[2] 柳夫人，即郑佩宜（1888—1962），江苏吴江人。当时正患盲肠炎，在重庆市立医院作手术治疗。

[3] 陆游（1125—1210），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陈亮（1143—1194），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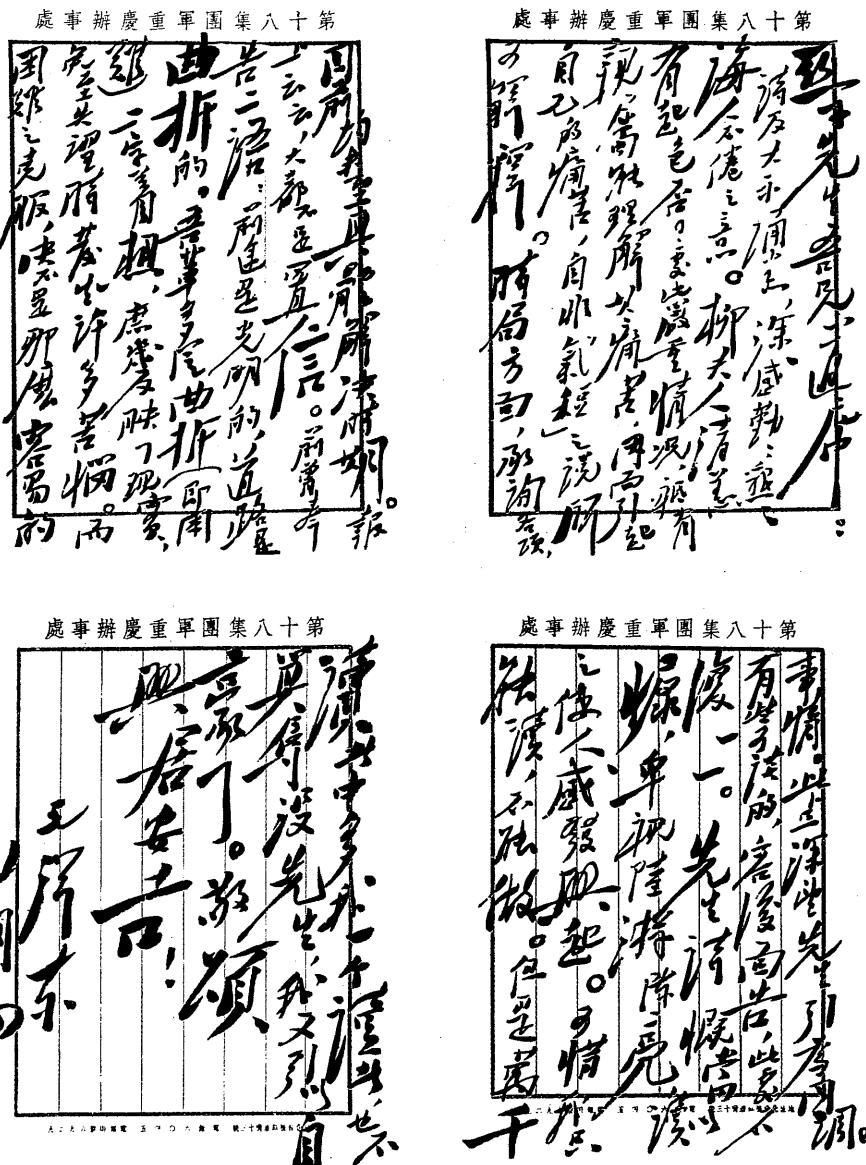
—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1]，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敬颂道安！

毛泽东
十月七日

[1] 指毛泽东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



毛泽东致柳亚子信的手稿。

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1]

(1945年10月8日)

这次来渝，首先感谢蒋^[2]先生的邀请与四十多天的很好的招待，感谢今晚的主人张文白^[3]先生设了这样盛大的宴会，也感谢所有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

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在东、西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

[1] 这是毛泽东离开重庆前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的演说。

[2] 蒋，指蒋介石。

[3] 张文白，即张治中，字文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作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945年10月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会上讲话。

七律·重庆谈判

(1945年)

有田有地皆吾主^[1]，
无法无天是尔民^[2]。
重庆有官皆墨吏^[3]，
延安无土不黄金^[4]。
炸桥挖路^[5]为团结，
夺地争城^[6]是斗争。

[1] 有田有地，指革命根据地。皆吾主，都是我们作主。另有一说，有田有地，指富人。皆吾主，指他们统治着人民。

[2] 无法无天，指共产党不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指挥，不遵蒋介石所谓的“法”。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说，共产党要交出军队，否则就是无法无天。还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尔，你的，指国民党政府。尔民，你的老百姓，这里是讽刺国民党政府的说法。

[3] 重庆，1938年至1946年，国民党政府迁驻陪都重庆。墨，脏污。墨吏，贪官污吏。《佐传·昭公十四年》：“贪以败官为墨。”

[4] 延安，1937年至1947年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黄金，有多重含意，既是说，延安位于秦晋黄土高原，又表现那里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一片大好形势。

[5] 炸桥挖路，指破坏敌人的交通。

[6] 夺地争城，指从敌人手中夺取城市和土地。

遍地哀鸿^[1]遍地血，
无非一念救苍生^[2]。

[1] 哀鸿，鸿雁哀鸣。《诗·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这里比喻流离失所的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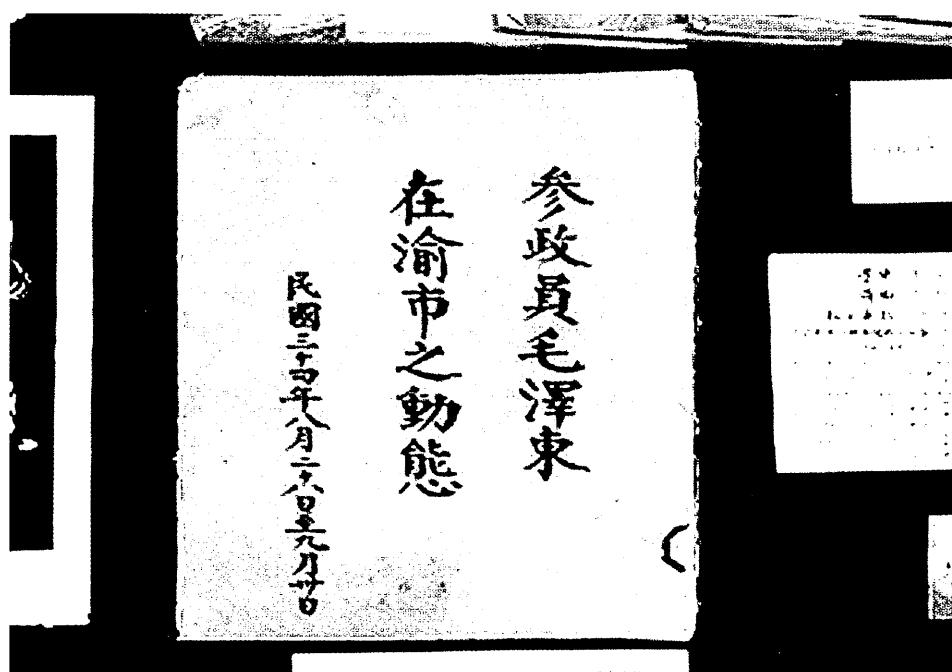
[2] 一念，一个想法。苍生，本指生长草木之处，后多借指百姓。

附件：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的会谈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点	两党代表	会谈内容
1945.9.3	101号	蒋介石、毛泽东	中共军队组编数目、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
1945.9.4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整编和解放区
1945.9.8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组编数目和省区划分
1945.9.10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政治会议、国民大会 (张治中在会上首先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一词)
1945.9.11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叶楚伧、张厉生	国民大会、代表名额
1945.9.12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厉生	国民大会、政治会议、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及承认解放区
1945.9.15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	省区划分、地方政府人选及军队驻地等
1945.9.17	101号	蒋介石、毛泽东、赫尔利	军事问题
1945.9.19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缩编数目、驻地和解放区
1945.9.21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改编军队和解决解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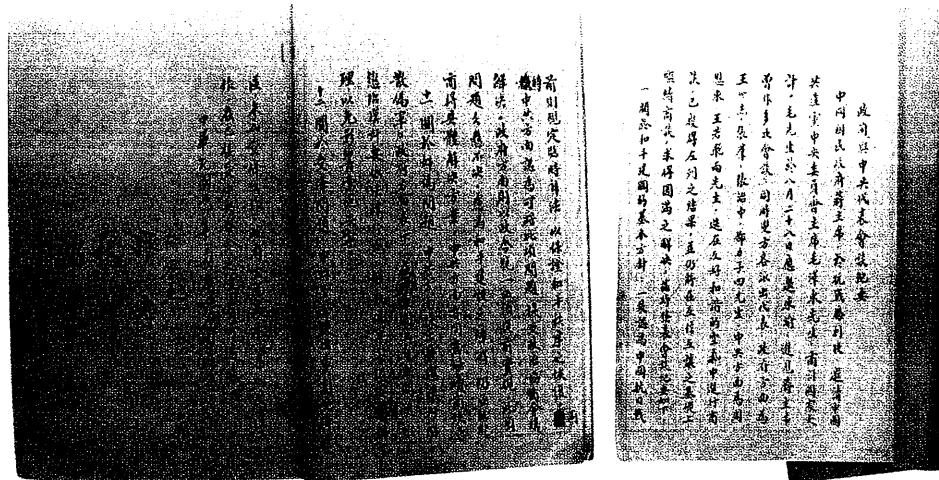
时间	地点	两党代表	会谈内容
1945.9.27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缩编和解放区
1945.9.28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整编技术
1945.10.2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政治协商会议和解放区
1945.10.5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政治协商会议、解放区
1945.10.8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商讨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



记录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主要活动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



国共两党主要谈判地点——中山四路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宋美龄官邸。



1945年10月10日，国共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签订地点。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11日，陈诚代表蒋介石到九龙坡机场为毛泽东送行。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镇将军握手告别。



1945年10月11日，重庆各界人士到机场送行。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机场和前往送行的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告别。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送行的张澜握手。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图为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谈判归来》(中国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10月11日)

重庆会谈纪要是周恩来同志起草的，采纳国民党方面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末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末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本来说解决军队数目之后发公报的，后来又说要解决解放区以后才发公报，从此就停了几天。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这样，我们就开始攻势，周恩来十天之内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小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各界活动。但我们守约，谈判情况可以口头说，不登报。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纪要发表后，我们提出省府民选，可以找出根据来的，因为孙中山说过。还有言论、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重庆谈判的经过讲话的一部分。

集会、出版自由等等。我原准备九号走，蒋介石留我过双十节。张治中讲，不发表这个会谈纪要不行，你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我对王芸生^[1]说：“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了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陈立夫表明是他首先主张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许多人说CC派破坏谈判，我看很多CC派人物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

[1] 王芸生，当时任《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

《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1]

(1945年10月12日)

各局，并转区党委：

双十节国共协定^[2]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此次谈判的重要成就。但有下列各点望加注意：

(一) 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3]、同蒲、正太^[4]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电报。

[2] 指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双方确定将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国民党拒不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国民大会问题也未达成协议，中共领导的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3]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4] 正太，即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

夺北宁^[1]、胶济、平绥^[2]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

(二) 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

(三) 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四十三个师，是对彼方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的七分之一。后来彼方提出编整国防军计划，拟编一百二十个师，故我方答应到那时可以编为二十个师，也是七分之一^[3]。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编整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四) 为表示让步，取得全国同情起见，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八地，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之解释及适当之处置。但在鄂豫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广东则执行分散长期坚持计划不变。

(五) 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中央
十月十二日

[1] 北宁，即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2] 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3] 原文如此，似应为六分之一。

今日公布于下是
和谈正棘手复杂，双方都希望速定
和谈周密，亟待全国人民了解。许多民主友
利（常指正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当然都是以达
成和平主要成就。但有下列各点须特别加
①：（一）和平基本方针已肯定，但具体的许
多局部问题仍不解决。如苏南、皖南、浙
赣、湘江及苏南等地，我军正在向前进逼，
淮海、津浦、同浦、卫太等路，我军正在向北进
攻，北京、南京、上海三路的战斗亦已
到来，我方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制胜。
(二)由於上述原因，解放区问题未能在
此次谈判中解决，必须在以后的斗争中方
可解决。(三)这个根本问题，问题不解

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三）
解决三阶段一阶段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
变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的十三个师，
是对彼方原有二百六十三个师的七分之一而来的
彼方准备整训的计划，在编一百二十个师，
敌方应到那时可以编有二十个师，也是七
分之一。目前仍需求解放军休整，而国民党
则甚为活跃。③该不列编整训部队，而该即
将实行编整训练，方能有力量打到全国一
统一战线，如这样子，（2）东北、华东、华
中取得全国同情，各方应退出华东、苏南、
豫湘鄂八块地，以求和平和大局，而不让这些地
区不为我所有，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妨碍，须作
妥善之处理及逐步之安置。

但在④新阶段目前仍照中共方针办理。
广东和苏浙两省坚持
不变。(四)东北问题未在
此次谈判中提出，我方整训计划正按
执行。中央十月十二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的手稿。

关于迟滞国民党军北进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5年10月12日)

刘、邓：

(一) 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个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习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为着争取时间，目前以中心区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向交通要道沿线集结，配合小部分主力于铁道、公路，对顽军阻击、侧击、扭击，广泛地雷爆炸，破路拆碉，平毁城寨，迟滞、疲惫、消耗顽伪，以便利我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顽军每路一师或数师。你们主力将来是否应到冀东决战，看上述成效及时局再行决定。

(二) 沿同蒲北进之十六军，已集中榆次、太谷线，在敌掩护下，通过正太路，难以寻求机会歼灭其一师或一团。我对第三军之三十二师及七师，尚未消失歼灭其部分机会，似以太岳区^[2]近五万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

[2] 指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一个军区，地处山西省南部太岳山、中条山一带。

主力与地方军对付即够，集中一万五千至二万主力，每次消灭其一两个团，有两三次这样战斗，第三军即不能前进，十六军亦可能牵制于正太路给以部分的打击。我太行及冀鲁豫区^[1]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沿平汉路北进的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以上意见请你们斟酌电复。

军委

酉文午

[1] 指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两个军区。太行军区地处山西祁县、虒亭和河北石家庄、邯郸之间的太行山北段地区。冀鲁豫军区地处平汉铁路以东，河北、山东、河南3省相接的各一部分地方。

夺取平绥战役^[1]的胜利意义重大

(1945年10月16日)

晋察冀、晋绥两局诸同志，并告东北及晋冀鲁豫两局：

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蒋介石令傅作义^[2]集结五万余人于归绥、集宁、大同之线，一俟陆运、空运、海运兵力集中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即将配合傅部进攻张垣^[3]，并进攻沈阳、承德。而绥远^[4]之毕克齐、归绥、武川、集宁、丰镇、陶林^[5]、凉城、清水河等地或为我原有之解放区，或为我不久前所收复，均被傅部在日寇援助下，协

[1] 平绥战役，也称绥远战役。日本投降后，驻绥远西部的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调集所辖主力和收编的伪军共6万余人，进占被八路军包围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已被解放的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城镇，企图夺占张家口，控制北平至归绥的铁路。1945年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部队对进犯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解放凉城、陶林、集宁等地后围攻归绥、包头未克，于12月中旬结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2万余人。

[2] 傅作义（1859—1974），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张垣，即张家口市。

[4] 绥远，即绥远省。

[5] 陶林，即陶林县，1954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后旗和察哈尔右翼中旗。

同伪军王英、李守信^[1]等所强占，并曾进占我兴和、尚义，迫近张垣。现兴和、尚义虽被我收复，其余各地仍在顽伪手中，并积极准备攻击张垣，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故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完成你们的神圣任务。至平绥战役胜利后，主力应迅速准备转移冀东、平西地区，执行严重的新任务。而以必要数量之得力部队，由大同南下，肃清阎^[2]逆势力，直至太原附近，再依情势，考虑夺取太原问题。因阎逆不但长期勾结日寇，近更大举进攻我上党解放区，虽受到我上党战役^[3]的严重打击，歼灭其主力三万余人，但其残部尚有六万以上，阎逆并丧心病狂，组织日寇数千人准备进攻自己的同胞，因此在不妨碍速援东北条件下，尽可能彻底歼灭阎逆残余，是完全必要与有理由的。

中央
酉銖

[1] 王英（1894—1950），河北邢台人，原任伪绥西联军司令，抗日战争结束后所部被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收编，任暂编骑兵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守信（1892—1970），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属包头市）人，原任伪蒙古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

[2] 阎，指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3] 1945年8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13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展开自卫反击，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3.5万余人，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因山西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故这次战役称上党战役。



1945年10月，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和李讷在一起。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5年10月16日)

刘、邓，并告陈：

因上党与阎顽作战（这是必要的），胡顽之十六军得以顺利通过，第三军亦在积极北进中。如该两军均能到达石家庄集中，即将力图南北打通平汉路（高邑汤阴段），配合空运、海运进入平津，我向东北、冀热辽转移兵力，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除请严令赵尔陆等积极歼灭阻击十六军外，请你们务必采取一切办法，阻止敌第三军北进，消灭其大部以至全部。提议太岳所有地方兵团及大部县区干队，一刻不停地、有计划地向同蒲分段集结，控制同蒲一段至数段（并尽量动员民兵协助），在不能消灭该军时，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抗击，争取我主力转移与必需恢复疲劳的时间。在主力中，伤亡疲劳较轻者，抽一两个团为先遣队，协同地方兵团进行上述动作。

军委

酉铣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的电报。

东北应坚决阻止蒋军登陆^[1]

(1945年10月16日)

大连为自由港，苏方已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旅顺亦不许登陆，故蒋方从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还可能从安东等处试探。

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1] 这是毛泽东致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致聂荣臻电^[1]

(1945年10月16日)

蒋系十六军主力已达石家庄^[2]，可能迅到北平，九十二军从武汉、九十四军从上海均于酉东^[3]开始空运至平、津，现已半月，月底运完，故本月底蒋系至少有三个军到平、津，望注意平、津蒋军动向之侦察。

[1] 这是毛泽东致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2] 第十六军属胡宗南建制，是由山西运城沿同蒲路、正太路运至石家庄的。邯郸战役（平汉战役）中，该军由石家庄南下，以配合孙连仲部北上，企图南北夹击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因刘邓部队在邯郸战役中迅速取胜，该军缩回石家庄。

[3] 酉东，即10月1日。

关于重庆谈判^[1]

(1945年10月17日)

讲一讲目前的时局问题。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2]。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多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

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③。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既然是两个想不开，为什么又谈判，又成立《双十协定》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④，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我们党在国

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5]。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

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6]？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

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四十八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四十三个师，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照比例减下来，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到二十四个师，还可以少到二十个师，还是占七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上面就是我向同志们讲的时局问题。目前时局的发展，有许多矛盾现象。为什么国共谈判中有些问题可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又不能达成协议？为什么《会谈纪要》上说要和平团结，而实际上又在打仗？这种矛盾现象，有些同志想不开。我的讲话就是答复这些问题。有的同志不能了解，蒋介石历来反共反人民，为什么我们又愿意同他谈判呢？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所转变，我们就愿意同他们谈判，这对不对呢？这是完全对的。中国

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还讲一点我们的工作。在座的有些同志要往前方去。许多同志满腔热忱，争着出去工作，这种积极性和热情，是很可贵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同志抱着错误的想法，不是想到那里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而是认为那里的一切都很顺利，比延安舒服。有没有人这样想呢？我看是有的。我劝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想法。去，是为了工作去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有许多本地的干部，现在要离乡背井，到前方去。还有许多出生在南方的干部，从前从南方到了延安，现在也要到前方去。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7]，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

斗。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了^[8]，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9]。反苏反共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都坚决反对。在最近的三十年内，打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之间，间隔了二十几年。人类历史五十万年，只有在这三十年内才打过世界战争。第一次大战以后，世界有很大进步。这一次大战以后，世界一定会进步得更快。第一次大战以后，产生了苏联，全世界产生了几十个共产党，这是从前没有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更强盛了，欧洲的面貌改观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更团结了。我们中国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间。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

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1] 这是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

[2] 这里是指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同时，国民党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下面是《会谈纪要》上关于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问题谈判经过的记载，里面的所谓“政府方面”是说国民党政府。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

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

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3] 上党区，指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这一带的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1945年8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13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9月10日至10月12日，解放区军民展开自卫反击，举行了上党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3.5万余人，生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

[4] “积十八年之经验”，指自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起到1945年止中国共产党同它作斗争的经验。

[5] 参见《论联合政府》。

[6] 指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8个省区内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根据地。

[7] 参见《两个中国之命运》《愚公移山》两文。

[8] 苏、中、美、英、法5国外长会议是根据1945年8月波茨坦协定而设立的，自1945年至1949年共举行6次会议。这里所说的伦敦5国外长会议是指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5国外长会议。会议讨论了同曾参与法西斯德国侵略战争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签订和平条约以及处理意大利的殖民地等问题。在讨论对罗、保、匈3国和约草案时，美英无理要求罗、保、匈3国民主政府辞职或改组；美英还违背波茨坦协定，给予法国参加讨论和约的权利，遭到苏联拒绝；苏联提议讨论成立对日本的管制委员会问题这一合理主张，也被美国拒绝。由于上述分歧，这次会议没有达成协议。

[9] 参见《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致王震电^[1]

(1945年10月17日)

南支在王、王^[2]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目前五师及王、戴^[3]处境较为困难，南支既加入五师野战兵团序列，望在郑、李^[4]领导下，协助五师及王、戴争取一个至几个战役的胜利。南支尔后行动当与五师及王、戴的整个行动加以考虑。目前鄂豫我军的胜利行动，对于争取华北及东北的胜利有重大帮助。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2] 南支，指南下支队。王、王，指王震、王首道。10月上旬该部北返到达大悟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3]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

[4]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

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1]

(1945年10月17日)

在反对顽军向解放区进攻争取和平局面的战斗中，望各地注意收集顽军反共反解放区的证件，不论是文字的或俘虏官佐的口供，都甚重要。文字证件及俘虏官佐均加拍照，送来延安。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的主要内容。

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 争取平汉战役^[1]的胜利

(1945年10月17日、27日、29日)

—

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

[1] 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1945年10月，自新乡沿平汉铁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城市邯郸进犯，企图迅速打通平汉铁路。10月24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邯郸以南包围国民党军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30日，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约万人起义。战役至11月2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

力，由刘邓^[1]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八万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急于求胜，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中央
西篠

二

刘、邓、薄、张、李^[2]：

西宥电^[3]悉。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疲惫，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石家庄胡部^[4]西宥致胡电，着一个师配合侯如墉^[5]向高邑推进，

[1] 刘，指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2] 薄，指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指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指李达（1905—1994），陕西眉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

[3] 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1945年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4] 胡部，指当时进至石家庄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三军和第十六军。

[5] 侯如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先遣军总司令。

接应安阳北上部队。其战力亦不如当面之敌，可用地方部队迟滞其行动。石家庄、新乡两处之顽共八个师，你们当面之顽共六个师，总计不过十四个师。在你们歼当面之顽一两个师时，可能引起南北增援，你们须准备在连续多次战斗中总共歼灭四五个师，即能转变局势。绥远^[1]方面，聂、贺^[2]两军五万余，十八日打起，敌甚顽强，开始仅歼灭一个团，击溃一骑兵团一步兵师及若干杂部，苦战一星期，占领丰镇、凉城，至二十四日攻克集宁，局势即起变化。何文鼎^[3]二十六师（蒋系）被我歼灭于卓资山，傅作义^[4]主力百〇一师、三十二师西窜，我正向归绥^[5]追击中。鄂豫方面，我五师野战纵队业已组成，占领桐柏，与王戴、王震^[6]会合，已令其放手行动，配合你们作战。望你们注意动员人民参战，对敌坚壁清野，集中一切可能力量战胜当面之敌。粮食筹划，须作持久打算。

军委

酉感

[1] 绥远，即绥远省。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

[3] 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5] 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6] 王，指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戴，指戴季英（1906—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河南军区政治委员。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

三

刘、邓：

十六军三个师南援，进至高邑后，估计将以一个师位于临城、柏乡、高邑各点，掩护后路及侧翼，两个师向南推进。如我以地方兵团及民兵地雷战作有力之打击，使彼误认为我有主力部队在该地区，必能迟滞多日不敢放手前进，我则争取时间歼灭当面之敌，然后再歼援敌，仍甚有利。你们当面六个师，再增十六军两个师，共计不过八个师，只要我取各个歼灭政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次歼灭一个师，则在两三次作战歼灭两三个师之后，整个局势必起变化。

军委
二十九日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
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取得下一次更大的
胜利。在你们领导之下的一支力量，除以太行主力展
开同南路的作战外，应有顺利外，必须集中、
太行与冀鲁豫主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
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关系反对国民党主要
力量的进攻，这个阶段的胜利，關係全局極為
重大。（后着平汉和平局面的实现，你们领导

借以一个半月时间的時間，在連續多次的作战
中，全歼或消灭八万顽军，一半或被击伤的，另
一方能解围而逃。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經驗，動
員太行冀鲁豫三軍力，由刘鄧邓小平指挥，
精誠團結各个歼灭，而保第二线上方前线的勝利。
八万顽军中有成年青年若干，不可輕視。
但该军新到，地狹民情不熟，補充困难，又
有輕視我軍的心理。（系統不一）（急於求勝，

使我有隙可乘，希望致電勸軍民团结一致，
以上党战役的精神，爭取平汉战役的勝利。
不失时机，中央軍委 策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晋冀鲁豫中央
局诸同志电的手稿。

给续范亭^[1]的信

(1945年10月18日)

范亭兄：

示悉。大势所迫，使当局不能不签订双十协定，但其实现却尚是大问题。私利所囿，他们尚不愿承认解放区，并正向解放区进军，此问题之解决，麻烦尚多。看你写字，精神甚好，尚望研究休养办法，多活许多年，看见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敬祝健康！

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

百合果敬收，至谢！

江青致候。

[1] 续范亭（1893—1947），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人，著名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国民党任职，曾经隐退一段时间，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7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应抽调地方军补充野战军^[1]

(1945年10月19日)

郑、李：

- (一) 阅西寒电^[2]，你们野战军太少，地方军太多，望从各分区再抽调至少一万兵力补充野战军，使九个团每团充实到二千人以上，方能打大仗。这是第一批野战军，总数须达二万四千左右。
- (二) 将来还须编第二批野战军，估计到沿河平原地区在国民党集中摧毁政策下不能生存，现在就须在高级人员中有精神准备，先作必要准备工作，到了那时，使当地变为合法斗争（配合当地的非法斗争），而将那里的主要力量编成第二批野战军（每分区一个旅），随第一批野战军到新地区行动。此事须精密考虑，不使步骤零乱。
- (三) 鄂南及九江附近之力量须立即北移。(四) 你们意见盼告。

军委
西皓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鄂豫皖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和中共中央鄂豫皖局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政治委员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李先念的电报。

[2] 指1945年10月14日新四军鄂豫皖军区（即鄂豫皖湘赣军区）关于军区部队整编人员统计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目前东北发展方针^[1]

(1945年10月19日)

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2]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3]，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时加写的一段话。

[2] 安东，旧市名，即今辽宁丹东。

[3] 这里的安东，指当时国民党政府新划定的安东省，在今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西南部，省会通化，1949年撤销。

组织一支野战军进行津浦战役^[1]

(1945年10月19日)

罗、李，即转陈、黎，并告华中局：

山东除竭尽全力组织渡海^[2]外，陈黎组织津浦战役^[3]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望陈黎精心计划，组织一支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开始的好胜仗。再连续各个击破顽军，准备歼灭顽四五万人，方能解决问题。此外，再责令渤海军区负责协同冀中占领德州、天津间一段铁路，坚决歼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处长李作鹏即转新四军军长陈毅、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并告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

[2] 指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渡渤海开赴东北的行动。

[3]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乘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开赴东北和新四军入鲁部队尚未到达山东之际，由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在日伪军的掩护下进占济南，并与伪军一道占领铁路沿线及鲁南解放区的一些城镇，企图首先控制津浦路南京、济南段，尔后向北平、天津及东北推进。为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并力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中共中央军委令新四军北上山东主力和山东军区部分主力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津浦铁路徐州、济南间组织战役。10月18日战役正式发起，至1946年1月13日，共歼灭国民党军2.8万余人，控制铁路200余公里，截断国民党军向天津及东北开进的陆上道路。

灭北上蒋军，是为作战的辅助方向。

中央
酉皓

致陈赓等电^[1]

(1945年10月19日)

陈赓，并告刘、邓、聂、萧：

(一) 胡顽之十六军已顺利通过正太路，到达石家庄，胡令该军积极准备向北平前进。第三军之三十二师十一日晚宿霍县城，翌日续北进，估计已抵榆次；第七师十二日宿临汾以南之赵曲，以后该师行动不明；其军部十四日宿赵城，估计已抵榆次。十六日胡令第一军之一六七师集中侯马待令，有继续北进模样，该师十六日以前，在闻喜、安邑、虞乡线。

(二) 太岳纵队应向洪洞、灵石、介休段东侧地区隐蔽集结，积极准备战场，坚决歼灭第七师或一六七师。如该师不北上时，则占领临汾至介休段同蒲路，发动群众，创造战场。

(三) 正太路南北各军分区之地方兵团及民兵，仍继续向正太路破袭。赵尔陆部主力立即转向平汉路，集中力量攻占石家庄、保定段的几个车站、县城，控制铁道一段，各个歼灭顽军。

军委
十月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陈赓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萧克的电报。

目前时局及今后六个月的任务

(1945年10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各兵团首长：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1]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其中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息，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府，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明年全体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保证各解放区军民的粮食、被服及日用品的供给，关系

[1] 热河，即热河省。

于争取胜利特别重大。和过去几个月一样，今后六个月中，是全党工作特别紧张时期，希望各地领导同志及中心骨干善于掌握自己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最后结果如何，要看我们今后六个月的努力。估计到顽方和我争夺华北、东北虽有其便利条件（美国人、日本人及伪军的援助），但有其不便利条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地理人情不熟，孤军深入，脱离群众，补充困难，系统不一等），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1]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

[1] 指国共双方代表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的《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全文十二条。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同时，国民党却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纪要公布后不久，国民党即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因此各解放区应以多年来组织起来的力量，并继续迅速组织我们的力量，全部使用到今后六个月的斗争中去，争取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中央
西号

关于山东华中作战问题的指示

(1945年10月22日)

张、饶、赖^[1]，并告罗、李，陈、黎^[2]：

(一) 接陈黎哿^[3]电，我山东第八师占领邹县，控制铁路四十余里，歼灭顽伪二千余，并准备歼灭续进之顽。此外，我山东第三第四两师占领大汶口，控制铁路二十里。

(二) 希望我新四野战军在蚌埠、徐州间扩展铁路占领区，集中主力歼灭顽军。

(三) 只要我控制铁路一段，顽方是一定要进攻的，战斗将愈打愈大。因此我军第一，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第二，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

[1] 张、饶、赖，指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罗，指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原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准备赴东北工作。李，指李作鹏，1914年生，江西吉安人，原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参谋处长，这时准备赴东北工作。陈，指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黎，指黎玉（1906—1986），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3] 耶，即20日。

充，动员民兵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我山东、华中均须以连续战斗各歼灭四万至五万顽军为目标；第三，为了集中歼灭顽军之目的，山东、华中两地只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其他都是辅助作战方向，不要分散兵力。

(四) 山西上党战役我以三万一千主力，五万助战民兵，四十天时间，连续举行几个战斗，结果阎^[1]顽三万八千人，除逃去四千余外，被歼三万三千余人，缴获山积，可为范例。现刘邓^[2]集中六万野战军，准备歼灭新乡北进八万顽军至少四万左右，聂贺^[3]集中五万野战军正在歼灭绥东顽军五万之大部或全部。如你们能在山东、华中打几个好的歼灭战，则对整个局势将起大影响。

军委
酉养

[1]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

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区创造战场

(1945年10月22日)

郑、李^[1]:

(一) 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豫鄂活动，三部^[2]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也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二) 目前你们野战军会合王戴、二王^[3]，以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东面之豫东南（大别山）、豫东北（新黄河^[4]），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作几个月后之预备机

[1] 郑，指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代理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2] 三部，指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即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五师。

[3]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二王，指王震、王首道。王震，当时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首道，1906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南下支队政治委员。

[4]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河南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洪水阻止日军进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贾鲁河再流入颍河，在安徽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1940年，改道的黄河又流入涡河、西淝河、黄河、北淝河，并分别注入淮河。黄河改道后流经的这些河道统称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修复，黄河复归故道。

动地区，不宜提在目前的计划上。（三）只要打胜仗，财政就有办法，几个胜仗之后，占领大块地区（至少七八个县），不怕不能解决财政问题，各解放区军队都是如此解决，你们自亦能解决。目前你们即应有坚定决心在桐柏山区域（铁路以西，南阳以东，叶县以南，随、枣^[1]以北）创造战场，歼灭顽军，解决财政。这本是你们原定计划，希望坚决执行。

中央
酉养

[1] 随、枣，指湖北随县（今随州）和枣阳。

归绥包头大同等地必须占领^[1]

(1945年10月22日)

聂、萧、罗、刘，并告贺、李：

(一) 二十一日二十二时电悉。你们取得初步胜利，甚为欣慰。
(二) 傅^[2]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粮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三) 二局情报，归绥城内混乱恐慌，陶林^[3]被姚喆^[4]占领。(四) 速令冀晋、冀中、平北各组第二批野战军，每处至少一万，共三万，候令开至平北作战。

军委

二十二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并告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

[2]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陶林，旧县名，1954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和察哈尔右翼中旗。原县治陶林镇为察哈尔右翼中旗旗府。

[4] 姚喆，当时任绥蒙军区司令员。

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 歼灭向承德进攻之敌^[1]

(1945年10月23日)

聂、萧、罗、刘，并告彭、程，林、萧^[2]：

关于组织冀察晋第二野战军：（一）至下月上旬，顽方即将有三个军八个师（空运第九十二军三个师，现到石家庄之第十六军三个师，第三军两个师）集中北平，判断除以一部保护北平及平津线外，主力将向承德进攻，并威胁张家口。（二）决定迅速组织冀察晋第二野战军，由晋冀、冀中、平北现有精干地方兵团抽调至少三万人，编成十二个至十五个大团，限于两星期至多三星期内集中平北军区^[3]，完成作战准备，其任务为协同热河^[4]、冀东部队，坚决歼灭向承德进攻之顽军，巩固热河及平北，并充当这一战斗任务中的主力。（三）第二野战军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望萧罗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的电报。

[2] 彭、程，指彭真、程子华，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林，指林彪，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当时正赴东北途中。萧，指萧劲光，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当时正赴东北途中。

[3] 平北军区，应为平北军分区，属晋察冀军区。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一星期内到达平北军区布置一切，立即建立与中央及聂刘的电台联络，不得迟误。（四）林萧野战军以歼灭由天津、秦皇岛线向东北进攻之顽军为目的，位于沈阳、山海关线，该军负有与萧罗野战军及热河、冀东我军配合作战之任务。（五）萧罗野战军之组成及作战不影响现在绥远^[1]作战之聂刘野战军，只在聂刘坚决完成绥远作战任务后，应以主力迅速东调，援助萧罗。（六）赵尔陆^[2]兵团如何使用，请你们提出意见。（七）原定冀察晋出二万人去东北，现改为编入萧罗野战军。

中央
酉漾

[1]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2] 赵尔陆，当时任冀晋军区司令员。

孤立傅作义部于集宁后再歼灭之^[1]

(1945年10月24日)

聂、贺：

如傅^[2]部主力固守集宁，一时不能攻克，望集中主力歼灭十八台、卓资山、三道营、旗下营、白塔^[3]之敌，占领集宁、归绥^[4]间二百余里铁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收集粮食，使集宁傅部陷于孤立，然后歼灭之。此办法是否可行，望考虑电告。如集宁可能攻克，歼灭傅部主力，则不必变更部署。

军委

酉敬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的电报。

[2]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均为平绥线上集宁与归绥间的村镇。十八台、三道营、旗下营属卓资县。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白塔，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4]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攻占打成一片的几个城市以利野战^[1]

(1945年10月24日)

陈、黎：

你们占领铁路地段还太短，要攻占打成一片的几个城市，如像刘邓^[2]占领高邑、内丘、邢台、邯郸、磁县等城那样，方利野战。徐蚌^[3]间及津济^[4]间亦宜如此。

军委

酉敬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4] 津济，指天津和济南。

东北我军力量的布置

(1945年10月24日)

彭真^[1]:

酉齐电^[2]告我军发展分布情形，酉养收阅，甚慰。俟大批干部及军队到后，除仍以旧辽宁省^[3]及热河^[4]为第一位布置力量外，对旧吉黑二省首先是吉林省各重要城市迅速布置相当力量，甚为必要。洮南^[5]方面亦望注意。报告大连情况电已收到。

毛泽东

酉敬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政治委员。

[2] 指1945年10月8日彭真、陈云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汇报了国民党利用东北地区伪警察、土匪进行反共，以及新到东北的我军发展与分布等情况。

[3]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原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及兴安九省，这里指原东北三省中的辽宁省。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5] 淳南，旧县名，1958年与白城县合并为吉林淳安县。

致郑位三、李先念电^[1]

(1945年10月24日)

庆祝你们占领桐柏^[2]。望努力扩大战果，大批歼灭顽军，占领多数县城，创造新局面。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电的主要内容。

[2] 桐柏战役，于1945年10月20日发起。中原军区主力经过一个半月连续作战，相继攻克豫鄂边境平汉路以西的桐柏、枣阳、新野、唐河四座县城，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

迅速组织热河野战军和冀东纵队^[1]

(1945年10月25日)

彭真、子华，即转李运昌^[2]：

关于组织冀东野战军。(一) 蒋介石正由陆海空运兵至平津、唐山、秦皇岛线，其数达二十万。其中十万将位于唐山、秦皇岛线，是进攻东北的，运输及到达期均尚未定；十万位于北平、天津线，除一部守备该线外，主力将向热河^[3]进攻，此部正在空运及陆运，十一月中旬可到齐。(二) 我已决定组织冀察晋第二野战军，由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于三星期内组成，五个旅十五个大团（每团二千人）位于平北地区，任务为由西向东歼灭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我黄永胜^[4]两团，文年生^[5]两团，共约六千（均老兵）到承德，作为热河野战兵团骨干，请运昌速令热河所部抽调较有战斗力者八千至一万人左右，与黄文两部合编为热河野战军，由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军区政治委员彭真和司令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李运昌，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黄永胜，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正率部护送延安干部团赴东北。

[5] 文年生，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正率部开赴热河。

程子华指挥，迅速巩固古北口地区，配合萧罗作战。（三）我运昌所部冀东部队，迅速区分为野战军地方军两部，即从现有全部队伍中抽调较有战斗力者一万五千至二万左右，编为七个至十个大团，每三团编为一旅，共编为两旅至三旅，总称为冀东纵队，由运昌亲率位于机动地区，依将来情况决定，或者配合我辽宁野战军打击由关内向关外进攻之顽军，或者配合萧罗及程子华野战军打击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四）中央对冀东热河两区我军数量、质量、分布位置均不明了，望运昌接此电后一面按照上项方针实行编组部队，一面将两区实况经彭真电告我们，愈快愈好。

军委
酉有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

(1945年10月25日)

同志们：

抗大七分校的学员同志都是从边区、从华北来的，在各地做过工作，有许多人还打过仗，在抗日中有功劳。你们到七分校来学习已经很久了，现在就要到前方去了，所以我们在里开大会欢迎你们，又欢送你们。

大家知道，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日军大部分还没有缴枪，伪军有几十万也没有缴枪，还有许多日伪军在打我们。我们的解放区，华北、华中、东北、陕甘宁边区，已经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有一百三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以上的民兵。现在国民党顽固派也要打我们，在八年抗战中他们躲在后方，仗打得很少，有很多军队根本没有打过仗，日本投降了，他们出来了，还要吃掉我们的解放区，要打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这次我到重庆，见了蒋介石，我们的代表和他们的代表谈了四十多天，谈出了一点东西。有两条，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我们提出来，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在双十节签订了协定^[1]。但同时他们又准备了很多军队进攻解放区，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要算进去就有一百万以上。已经

[1] 即《双十协定》。

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如果我们打赢了，可能会得到和平，那时候我们派代表同他说：“蒋委员长，我们从前谈判过，我们还是和平吧！”我们是不要打的，那时候就可能和平了。如果是他们打赢了，我们解放区就要变成黑暗的地方，我们的党校办不成了，七分校也办不成了，边区让他们占了，边区政府也没有了，减租减息也取消了。所以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政府、共产党要一致团结起来，把顽固派的进攻打垮，要坚决消灭他们。哪个敢来，就消灭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

最近打了两个胜仗^[1]。第一仗是在太行山附近长治、长子那一带打的。阎锡山军队有三万八千人进攻我们，我们只有三万一千正规军，其他是民兵，有五万民兵帮助抬伤兵、搞运输，结果是消灭了他们三万五千人，只有三千人跑掉了，还缴了他们很多步枪、机关枪和大炮。第二仗是在绥远^[2]打的。顽伪军有六万多人打我们，打到张家口附近。头一次，被我们打回去了，第二次他们打到集宁（平地泉）、丰镇、浑源，占了二百五十里铁路线，现在还在打。其余在平汉线、津浦线、河北、江苏、安徽各地，仗也开始打起来了。这些仗我们是有把握打胜的，因为广大地方在我们手中，人民拥护我们，地方部队、游击队已发展成为野战军。一个地方有几万、十几万野战军，又有几十万民兵，就能很好对付他们了。

将来怎么样呢？将来总是要和平的。今后的几个月我们要做很多工作，要实行双十协定，要求实现和平，民主这一条也要实行。双十协定没有解决解放区问题，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解放区。几个月

[1] 指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进行的上党战役和1945年10月18日开始，当时正在进行的绥远战役。

[2] 绥远，即绥远省。

后，我们还要要求他们承认解放区，不承认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的大势。这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任务，解放区人民的任务。

讲到人民，我在大后方见到很多人，他们都非常热心，愿意帮助我们，赞成我们解放区。我又见到许多外国人，比如美国人，他们政府的政策是不好的、反共的，可是他们的飞行员、士兵很友好，一群群地来找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我。我在重庆也见到了英国人、法国人，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不好，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的政府是不好的，和美国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会分析，少数人不好，多数人是好的。我们在全中国和全世界是有朋友的，我们不是孤立的。

你们上前方是很好的。去前方，希望你们注意，我们总的任务是为全国和平奋斗，把敢于进攻我们的反动派打垮，要取得和平，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希望你们扩大自己的队伍，巩固自己的队伍。官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要像朋友、同志、兄弟一样地对待战士们。你们当了官长，就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要学国民党军队官长对弟兄们不好。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一条线上为人民服务，都准备牺牲性命为全国人民谋利益，为什么要对战士不好呢？一定要好。今后，无论你们到哪一个部队，一定要把官兵关系搞好。你们对战士好，战士一定会以很好的态度对待你们，这样的队伍，是什么敌人也打不散的。我们党中央也是一样，我们党内要有民主，就是对同志要有同志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全党团结一致，一百多万党员团结一致，什么敌人我们也不怕。

第三条是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我们的队伍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关心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吃东西、

住房子、穿衣服，都要靠老百姓帮助解决，如果关系搞不好，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就没有办法打仗了。我们一定要把军民关系搞好，但有许多地方还没有搞好。当然总的说起来，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对老百姓是好的。你们七分校也是好的。你们七分校在陕甘宁边区也搞生产，不搞生产人民负担就太重了。现在华北、东北等许多地方打起来了，我们更要注意把军民关系搞好。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每出去一批人，我们就讲一次，现在你们出去我们又讲，你们到了前方也要去讲。所有我们的军队都要和人民团结起来。

你们学得不少了，我就讲这几条。有了这几条，也就是坚决反对反动派的进攻，为全国和平而奋斗，改善官兵关系，全体人民和全体军队团结起来，中国的事情就好解决了。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老百姓来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行和平，实行民主，实行团结，实行统一。和平、民主、团结是我们党已经定下来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而奋斗。中央同你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我和朱总司令做的工作同你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除了解放中国人民以外，没有别的工作。同志们！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尽快抽调部队海运东北

(1945年10月25日)

陈、黎，罗、李^[1]：

(一) 渡海与野战^[2]并重，而渡海最急，请陈黎衡量新四到达情况及当面顽情，如新四到达增多，而顽情又不甚紧，是否可令应渡海者抽出先去？(二) 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三) 以上两项，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酉有

[1] 陈、黎，指陈毅、黎玉，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罗、李，指罗荣桓、李作鹏，原分别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处长，当时正准备赴东北。

[2] 渡海，指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渡渤海开赴东北的行动。野战，指山东军区部队与入鲁的新四军部队，举行反击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以及歼灭拒降顽抗的日伪军的作战。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程子华速去热河 准备反击蒋军进攻承德^[1]

(1945年10月27日)

彭、程，并告林、萧^[2]：

梗电^[3]悉。黄永胜^[4]所率一个团及赵^[5]副旅长所率一个团均留热河^[6]，另从黄张^[7]所率干部二千人中拨出四百人留热河，张秀山、赵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军区政治委员彭真和司令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萧，指萧劲光，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当时他们正赴东北途中。

[3] 指1945年10月23日彭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林枫、张启龙等干部已抵东北。并告黄永胜、张秀山24日将到承德，昨夜已由锦州去车接干部来，部队尚须徒步走。

[4] 黄永胜，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正率部护送延安干部团赴东北。

[5] 赵，指赵承金，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副旅长，正率部赴东北。

[6]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7] 黄，指黄永胜。张，指张秀山，原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此时正调赴东北。

毅敏^[1]二人亦留热河，刘其人^[2]师又去，热河情况当可好转，请子华速去领导，争取于一个月至两个月内肃清反动，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扩大并整训军队，分别组成野战军与地方军，准备力量反对蒋军从北平向承德的进攻。中央前曾电文年生旅^[3]及伍晋南^[4]所率二百干部去热河，未见回电，如未去，他们可以不去承德，仍随三五九旅^[5]去辽宁，望转知。

中央

酉感

[1] 赵毅敏，当时系从延安派赴热河的干部团负责人，不久任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2] 刘其人，当时任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正率原渤海军区的三个团赴东北。

[3] 文年生旅，指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旅长文年生。该部于1945年6月编为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原拟向湖南挺进，进至河南新安时，逢日本投降，旋奉命转赴东北。

[4] 伍晋南，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此时正调赴东北。

[5] 指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参谋长刘转连率领的第三五九旅一部。该部于1945年6月编为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继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主力之后向湖南挺进，进至河南新安时，逢日本投降，旋奉命转赴东北。

准备集中全力歼灭傅作义部夺取归绥^[1]

(1945年10月27日)

聂、贺：

二局确息，傅作义^[2]二十五日部署，集中一〇一师、三十二师、二十六师于卓资山^[3]以西与我决战，坚决歼灭我之进攻部队，暂十七师为截击我军之用，暂十一师守备归绥。似此情况如确实，我军应在卓资山附近休息数天，完成一切进攻准备，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傅顽，夺取归绥。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并须准备血战多天。

军委

二十七日十八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的电报。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致东北局电^[1]

(1945年10月28日)

蒋已展开八十万军队向我华北、华中进攻及准备进攻东北，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和国民党谈判的补充意见^[1]

(1945年10月29日)

甲乙二十九致丙丁：

- (一) 同意宥电^[2]所述办法。
- (二) 除平、津、青^[3]外，八条铁路（加上热河路、沧石路、白晋路、道清路^[4]为十二条）不得驻国民党军队，平、津、青八路须驻一部。
- (三) 立即停止内战，撤退各区进攻军队。
- (四) 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不得委派人员。
- (五) 同时请向各界说明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

[1] 这是中共中央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2] 指周恩来、王若飞1945年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为坚决避免内战，以实现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我们提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四项临时办法：(一) 立即停止武力进攻。(二) 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解放区进兵。(三) 恢复各铁路一般情形，铁路线上不得驻兵（城市不在内）。(四) 国民党军队在八条铁路（平绥、同蒲、正太、陇海东段、平汉北段、津浦、胶济、北宁）上无运兵必要。

[3] 青，指青岛。

[4] 白晋路，指当时从山西祁县的白圭至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后已全部拆除。道清路，指从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经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极大典。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晋察冀第二野战军 十一月份必须完成三项任务

(1945年10月30日)

聂^[1]转萧、罗^[2]及澜涛^[3]，并告热河分委：

你们一面组织野战军，一面组织运输队，一面则要指挥冀察现成部队迅速肃清北平、古北口间铁路线上之伪军并控制该路（至少北面一段），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准备野战战场。此项任务必须在十一月内争取先机完成之，否则将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巩固热河^[4]，亦不能巩固张家口。故萧、罗下月一个月内必须完成三项任务，第一是组成野战军，第二是组织运输队赴承德接运武器弹药，第三是占领北平、古北口间铁路线，准备野战战场。以上三项任务，澜涛等领导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须尽全力协助完成之。澜涛等同志的主要精力，今后须转向东方战线，西方战线则由聂、耿^[5]独力

[1]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萧，指萧克(1907—2008)，湖北嘉禾人，当时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罗，指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当时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3] 澜涛，即刘澜涛(1910—1997)，陕西米脂人。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4] 热河，即热河省。

[5] 聂，指聂荣臻。耿，指耿飚，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处理之。澜涛电台速与延安联络勿误。关于歼灭石匣^[1]、密云、怀柔地区之敌伪，发动该地区民众创造野战战场一项任务，热河分委负有由古北口向南竭力协助萧、罗之任务，该地区地方工作之管辖划归热河负责，免去过去三不管状态。

中央
酉三十

[1] 石匣，位于北京密云县北部，解放后修建密云水库时成为库区而消失。

赵尔陆即率部兼程至临城地区^[1]

(1945年10月30日)

赵尔陆，并告聂、萧，刘、邓^[2]：

三十、四十、新八等军被我刘邓包围于邯郸地区，正激战中，胡宗南^[3]令石家庄十六军三个师全部南援。我为坚决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援敌之目的，改变对赵部部署，赵尔陆同志接电后，即率六个主力团兼程向南，进至高邑西南临城附近接受刘邓命令，俟任务完毕再移平北。

军委

酉三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的电报。

[2] 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致热河分委等电^[1]

(1945年10月30日)

本年两个月内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望动员热河全党全军紧张工作，一切为着粉碎蒋介石向热河进攻之总目标而努力。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热河分委并告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当面之敌 然后再打援敌^[1]

(1945年10月30日)

刘、邓：

胡^[2]部十六军九十四师（原预一师）、一〇九师，过去任陕西河防，久未作战，二十二师（原预三师）亦久未作战，今年七月淳化事变^[3]时该师一个团守爷台山被我歼灭五个连。三个师人数经此次长途行军后，估计每师实际不超过五千余人。胡宗南二十五日令三十四集团全部南援，至二十九日，李文^[4]始令十六军一个军南援，已是四天之久，命令上又有到高邑后逐次向南进军之语，似不十分积极。该军一部似可日内开动，另一部似须交防给第三军（两个师）后才能南进，到高邑后，又须查明情况才能前进。如北面地方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所属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突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发起攻击。随后又以预备第三师和暂编第十五师加入进攻。边区部队于7月27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41个村庄。国民党军占领上述地区后，继续向边区腹地进犯。边区部队于8月8日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自卫反击，收复了爷台山地区。

[4] 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兵团及民兵能作有力之阻击、困扰，可能迷惑该顽不敢冒进，给我以充分时间，集中优势兵力，放手作战，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每次歼灭一部分），然后再打援敌。

军委

西三十

准备钳制王仲廉可能北援之部队^[1]

(1945年10月30日)

刘、邓：

为集中一切可能力量歼灭当面之敌，再歼援敌之目的，除令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是否调太行七八两分区主力至磁县地区，准备钳制王仲廉^[2]可能北援之部队，沁阳不必打了。

军委
酉三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歼灭霍守义陈大庆李品仙部 即是援助华北东北^[1]

(1945年10月30日)

陈、黎，并告华中局：

(一) 陈黎酉俭布置甚妥。(二) 北面歼灭霍守义^[2]，南面歼灭陈大庆^[3]，即是援助东北，因为这些军队都是要开东北的。除注意邹滕^[4]间战役，不失时机歼陈吴^[5]，并还须准备对付更多北上顽军外，北面歼灭霍守义极端重要，请注意该地作战指导，首先歼霍部二、三个团，顿挫其行动，然后各个歼灭之。(三) 李品仙^[6]亦有开平津之可能，徐蚌^[7]间破路及歼灭李部战役，其意义即是援助华北、东北，此点望华中充分注意。(四) 破路重在掘毁路基及军民兼顾，掘毁路基使缺乏人力之顽方难于修复，公私兼顾使人民获得利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的电报。

[2]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

[3] 陈大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4] 邹滕，指山东邹县和滕县。

[5] 陈，指陈大庆。吴，指吴化文，原任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此时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司令。

[6]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

[7]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益，方能彻底执行破路。

中央
酉三十

准备在邹、滕^[1]地区打大歼灭战

(1945年10月31日)

陈、黎^[2]:

据息，临城^[3]陈大庆^[4]九十七军以护路为任务，若干天内似无强大后续力量。惟邹、滕地区蒋介石在所必争，必将增兵北进，我以主力位于该区，准备打大歼灭战是完全必要的。渤海军区在德州南北占领两段铁路，占领黄河涯、恩县^[5]，歼灭一部敌伪，具有很大意义。望令该军区扩大铁路占领区，发动民众公私兼顾，掘毁路基，并集中注意于歼灭霍守义^[6]十二军。该军似急于赴东北，决不应让其过去。为此目的，请考虑增加该方面兵力，并加强作战指导。

军委
酉世

[1] 邹、滕，指山东邹县和滕县。

[2] 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黎，指黎玉，当时任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3] 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

[4] 陈大庆（1905—1973），江西崇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5] 恩县，1956年撤销，辖区分别划归山东平原、夏津和武城三县。

[6]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



1945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

集中最大兵力歼灭当面之敌^[1]

(1945年10月31日)

刘、邓：

已令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下对付十六军，使你们安心歼灭当面之敌，望速指示赵部行进路线。你们是否还感兵力不足，除陈赓纵队主力外，一切在半月行程内可能调动之部队均可调动，以便集中最大兵力。杨张派赴邹滕地区协助陈黎作战之一个旅可即西调，四军^[2]已陆续入鲁，那边不需要了。

军委

酉世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同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赵尔陆的电报。

[2] 四军，指新四军。

致赵尔陆电^[1]

(1945年10月31日)

赵尔陆：

昨电令你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协同太行部队歼灭由石家庄南进之十六军，谅收到。情况甚紧，该地作战关系全局，望飞速分路出动，取捷径直达临城附近接受刘、邓命令。如何速告。

军委

十月三十一日

[1] 这是1945年10月3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赵尔陆的电报。赵尔陆，当时任冀晋军区司令员。

抵抗由营口葫芦岛 登陆之蒋军迫其缓进^[1]

(1945年10月31日)

彭真：

(一) 三十一日四时电^[2]悉。时间大迫，有军队亦来不及，刘转连杨国夫^[3]才开始到达，就是证明。(二) 请严催已到冀东及山东渡海各部于十一月十二日前务必通过海城、锦州一线。黄克诚^[4]要十一月十日才能到玉田，将来只好绕道赴洮南^[5]。(三) 营口、葫芦岛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同一天，中共中央决定入东北部队组建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罗荣桓分别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治委员。

[2] 指1945年10月31日彭真给林彪、萧劲光并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1) 苏军允许蒋军10月30日在营口登陆，蒋军11月20日将进至沈阳、阜新线，苏军将全部撤走，请林、萧速来沈阳商讨部署。(2) 为对付蒋军登陆，拟编派两个旅担任锦州方面作战，三个旅担任营口方面作战。如同意，请令有关部队星夜赶来沈阳，时间紧迫，不可再缓。

[3] 刘转连，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他们正率部赴东北。

[4] 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5] 洮南，旧县名，1958年与白城县合并为吉林洮安县。

登陆之蒋军必须抵抗，可能迫使蒋军缓进，我可争取时间。（四）蒋^[1]入满只两个军，现方开始由海防^[2]、广州起运，目前拟在葫芦岛登陆者似系天津去的一小部，若能有十万军队能打的，可能用野战歼灭之，并且必须确定此方针，按此方针去部署。（五）刘其人文年生^[3]催其速开沈阳不去热河^[4]。黄克诚不日可通过平津线。

毛

三十一日十八时

[1] 蒋，指蒋介石。

[2] 海防，越南东北部的港口城市。当时国民党军一部接受侵越日军投降后经此海运东北。

[3] 刘其人，当时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正率渤海军区三个团挺进热河。文年生，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正调赴热河。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致周恩来电^[1]

(1945年10月31日)

周：

进入邯郸地区之三个军血战七天，昨（三十日）夜，新八军高树勋起义脱离副长官部，三十军、四十军全体向漳河以南退却，我正追击中。详情后报，暂不发表。

军委

十月三十一日

[1] 这是1945年10月3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周恩来的电报。

致东北局电^[1]

(1945年10月31日)

决定以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 宣传队题词^[1]

(1945年10月)

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 1945年日寇投降后的一天，联政宣传队的乐队奉命去枣园为中央同志的周末晚会伴奏，晚会结束后，毛泽东为他们题词。

为李少石题挽词^[1]

(1945年10月)

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追悼他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误伤牺牲的南方局工作人员李少石题写的挽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毛泽东为李少石的题词。

挽范旭东先生联^[1]

(1945年10月)

工业先导；

功在中华。

[1] 1945年10月范旭东在重庆逝世。当时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闻讯后送了这副挽联。范旭东（1884—1945），名锐，湖南省湘阴县人，中国化学工业开拓者，1914年他在天津渤海塘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精盐厂。1918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碱厂，从此中国有了自己制造的纯碱。1922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研究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七七事变”后，他带领这几个厂的技术管理人员，迁入四川，积极支援抗战。抗战胜利前夕，他亲自拟订新建扩建十厂的宏伟计划，却遭到国民党的拒绝，愤郁成疾，1945年10月在重庆猝然逝世。

书鲁迅《自嘲》摘句^[1]

(1945年10月)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录鲁迅语。

毛泽东

[1] 1945年10月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祭日，毛泽东亲笔书写了鲁迅的这一诗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

毛泽东手书鲁迅《自嘲》摘句。

为柳亚子的诗尹瘦石的画联展题词^[1]

(1945年10月)

柳诗尹画联展特刊。

毛泽东

[1] 1945年10月25日，《柳亚子、尹瘦石诗画联合展览》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展出诗画作品百余件，成为重庆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是日，《新华日报》刊出了毛泽东的题词“柳诗尹画联展特刊”。

柳子厚畫集
毛泽东題

毛泽东为柳亚子的诗尹瘦石的画
联展的题词。

十一月作战部署^[1]

(1945年11月1日)

林、彭，聂、萧、罗，陈、黎，罗、李，刘、邓，张、饶、赖^[2]：

十一月作战部署。(一) 情况：东北方面，我以李运昌^[3]所部五千为基础已扩大至十万人，惟战斗力弱。我各地入东北部队截至目前止，尚只有万毅、沙克、杨国夫、刘转连、曹里怀、萧华、吴克华^[4]等部约三万以上。在路上前进者有山东刘其人^[5]师，山东第一、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战略区负责人的电报。

[2] 林、彭，指林彪、彭真，当时分别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和第一政治委员。聂、萧、罗，指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黎，指陈毅、黎玉，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罗，指罗荣桓，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李，指李作鹏，原任山东军区参谋处长，此时正随罗荣桓赴东北。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饶、赖，指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李运昌，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

[4] 万毅，当时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沙克，当时任冀中军区参谋长。杨国夫，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刘转连，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员。曹里怀，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萧华，当时任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克华，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五师师长。当时他们正率部抵达或即将抵达东北。

[5] 刘其人，当时任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

第二、第三、第七等师，四军黄克诚师^[1]等部约八万人。而蒋军已决定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其数约两个军六万人，按其计划是十一月十二日进至锦州、海城一线，十一月底进至沈阳，苏军则于十一月底从东北撤完。华北方面，蒋军主力由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路^[2]集中平津，经北宁热河两路^[3]入东北之计划，基本上已被我打破。我聂、贺^[4]军已击破平绥路蒋军五万以上，包围归绥^[5]。我刘邓军已开始击破平汉路蒋军六万（高树勋两师起义^[6]投我），并吸引由正太路^[7]窜入石家庄之蒋军三万五千不易北进。我陈黎军及华中已切断津浦路南北中三段，阻滞了蒋军，因此使空运平津之蒋系两个军陷于孤立，亦将使海运入东北之两个军陷于孤立及被南北夹击之地位。

（二）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十一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为此目的部署如下：甲、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

[1] 黄克诚师，指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

[2] 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3] 北宁，即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聂，指聂荣臻。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5]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6] 高树勋，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45年10月率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任该军总司令。

[7]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乙、陈黎、罗李速令山东第一批入东北部队（一、二、三、七等师）兼程北进，第二批部队及四军一部即速起程北上。丙、黄克诚师即速过平津路北上。丁、萧罗野战军限上半月在平北集中编组完毕，待命东进，侧击进入山海关、锦州、沈阳线上之蒋军。戊、刘邓军待当面战役完毕，准备抽出杨苏纵队^[1]配足十个团待命北上，另组新纵队代替杨苏。己、华中叶飞纵队^[2]待穿上棉衣后起程北上。庚、聂、贺军待绥远^[3]作战完毕，即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辛、刘邓、陈黎及华中三处除开东北者外，仍服原任务，准备歼灭必然继续向北进攻之蒋军主力。

（三）各部执行情形随时电告。

中央军委

戌东

[1] 杨苏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2] 叶飞纵队，指新四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叶飞。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冀中地区动员一切力量破坏铁路^[1]

(1945年11月1日)

聂转冀中军区：

冀中黄同志二十日电^[2]悉。动员一切力量破坏定县至石门^[3]铁路甚为重要。我刘邓军在邯郸地区与顽军六万血战兼旬，石门顽军三个师南援，情况紧急，三十日高树勋新八军举行起义站到我们方面，顽三十军、四十军被迫向漳河以南退却，我正追击中。判断石门南进之顽亦必北返，故冀中加紧破路甚为重要。霍守义^[4]第十二军由济南北上，我渤海军区在德州南北占领两段铁路，阻击该顽，望冀中亦于沧州南北地区占领铁路一二段，动员民众，公私兼顾，掘毁路基，配合渤海行动。

军委

戌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并转冀中军区的电报。

[2] 指1945年10月20日16时黄寿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我们目前斗争重点，为稳定十分区，以九、分区主力打击伪顽企图，以巩固对平津的基地。为严防沿正太、平汉路积极北进之顽军，现正以六、七分区主力，动员一切力量，破坏定县至石家庄之铁路。

[3] 石门，即今河北石家庄。

[4]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

在山海关锦州地区坚决歼灭北进之敌^[1]

(1945年11月1日)

李运昌，并告彭真：

(一) 运昌三十一日电^[2]悉。你的决定很对，你即在彭真、林彪^[3]指挥下担任山海关、锦州地区指挥作战，编整部队，运输干部等项任务，而以作战为中心任务。坚决歼灭北进之敌，不要回冀东。詹才芳^[4]编成之野战军及在山海关、锦州地区之一切军队及地方工作统归你指挥，而你则接受彭、林指挥。(二) 杨国夫师^[5]据詹电已到山海关，山东刘其人师前令其去古北口，现令其改开山海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李运昌并告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指1945年10月31日李运昌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要点是：前接军委电，令我回冀东组建野战军。因又接彭真电，令我留锦州主持交涉车辆，运输干部，整编部队，指挥作战，故一时未能抽身回冀东。现美蒋军已在秦皇岛登陆万余，昨与我山海关一部冲突，有向东北前进之势。第三五九旅刘转连部刚到锦州，疲劳，缺武器，尚未整编，人地生疏。因此，又延缓我返冀东时间。刻已请詹才芳先着手组建野战军，配合山海关作战。此役关系重大，须全力打退、消灭顽军。黄克诚、杨国夫部须兼程东进，增援山海关和冀东。

[3] 林彪，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4] 詹才芳，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5] 杨国夫师，指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杨国夫。

关、锦州（请要詹才芳速通知）。黄克诚三万五千现到冀中，十日可到玉田，请令詹才芳催其速进。山东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等师亦已开动，月底可到。

中央
一日

1945年11月1日，江南新四军根据《双十协定》全部撤往长江以北。图为新四军向江南人民发出的《告别民众书》。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0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编辑：《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7 号兴力工业中心 5 楼 09 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 16 开

页 面：520 面

版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次印刷

2013 年 11 月 1 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 套

全集字数：2015 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 卷 港币 \$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